

野中艸書

冒烟集

何家槐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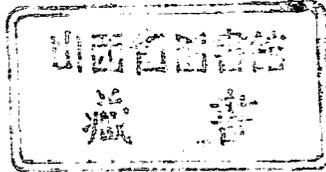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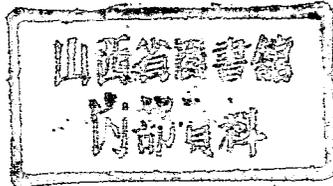
文獻出版社印行

七之書藝草野

集烟會

帶槐家何

06468



行發社版出獻文

明九年十三國民華中

~~0758~~

受熬煎的人只應該「吞嚥他自己的烟」，你若沒有把這烟變成了火，吐它出來有什麼用？——其實，在比喻的意義上說，一切烟都能變成火的。

——嘉萊爾——

重慶市圖書雜誌

目次

老成與幼稚	一
潔癖	五
年資	九
無所適從	一三
始妄言之	二〇
信徒。先知。救世主	二九
嗚呼	三七
開門和闔開	四一
不算客孽	四四
新舊諱	四八

絕路與生路	四九
隱身的帽子	五三
多可愛的老頭	五六
固執與成見	六二
介紹鄧惜華	六五
苦夠了沒有	七二
新談狐說鬼	七四
隨感二則	七六
戰地戲劇談	七五
半風月談	八四
不要拋掉資本	八七
關於士兵文藝	八九
堅韌的戰鬥	九四

無可比擬的損失·····	一〇一
自由說話和自由寫作·····	一〇七
創造新的典型·····	一〇九
「氛圍氣」的創造·····	一一二
「民族文藝」一解·····	一一五
國民文學乎？幫忙文學乎？·····	一二七
文學界的「台墨哥割」·····	一二三
所謂「雜文問題」·····	一二八
軟性。硬性。刺激性·····	一三五
作品與生活·····	一四〇
國難教育我見·····	一四四
關於國防文學·····	一五二
救國何勞遠征·····	一六〇

讀「劉海粟歐游報告」	一七一
談「寓教于樂」	一七五
後記	一七九

老成與幼稚

青年人曾經走過一段好運。機關里紛紛的用起青年人來了，「行新政用新人」的口號也越叫越響了，對於青年政工人員和所謂青年「文化人」，大家都刮目相待，就是有些鬚髮斑白的龍鍾老翁，甚至也極力表示自己已經「返老還童」，以青年人自命。因為，在前一些日子，據說只有青年才是國家的棟樑，社會的中堅，不是青年就不足以表示前進，就不容易在抗戰建國的崗位上插足……總之，青年幹部的確曾經大大地時髦過一時，竟像是「天之驕子」。

可是不知怎樣一來，青年人又不時髦了，又開始走上了倒運的道路，而且被冷落，被歧視，被嘲笑，被輕蔑，被排擠，被制裁，什麼「幼稚」「魯莽」「過火」「危險」之類的咒語，又像符籙一樣的貼到青年們頭上，竟至到處是責備，到處是痛罵，因此，意志較為羸弱的青年就開始動搖了，彷徨歧途了，流離失所

了。別說一批曾經自命爲「老青年」或者「青年之友」和「青年保護者」的人又忽然搖身一變，「返童還老」，恢復本來面目，就是有些本來謹慎持重的中年或者早已學會明哲保身的「本位青年」，也很快地擺出老氣橫秋的面孔，對較有生氣的青年人大大不滿，避之唯恐不及，或者同海涅在「論吉訶德先生」中所寫的那些聰明人似地回過頭來，向本來同輩的青年蔑視地「聳聳肩頭」：

「……他們爲自己資本的利益着想的多，爲人類着想的少；他們讓自己的小船安閑地浮下生的溝渠，不大肯去顧念那在大海上和波浪戰鬥的水手。或者他們歷盡百折不撓的毅力，爬上了高位要津，這才對着那些被大風狂雨從名譽柱上沖下來的英雄人物聳聳肩頭，於是他們或許就會告訴人，說他們自己在青年時代也曾如何地過壁，但是後來他們和那牆壁妥協了，因爲那牆壁是絕對的存在，且因其存在，就卽是合理……」

是的，青年確實是驕子，是硬碰硬的傢伙，既不知享受安閑，也不能爬上高位，竊據要津，更不願苟且妥協；要他們承認什麼絕對的權威，崇拜什麼神聖的

偶像，相信什麼天定的命運，那尤其是萬萬不能；他們只相信真理，只熱愛奮鬥，逢迎阿諛，卑躬屈膝，和他們根本無緣。青年就是青年，在時髦的時候用不到假裝冒充，把招牌掛在額角，到處去招搖撞騙，在倒運的關頭也不願改頭換面。幼稚不要緊，只要有進步，傻勁不要緊，只要是真誠，熱烈不要緊，只要能約束，犧牲不要緊，只要死得其所，不苟活着做一具走肉行屍，甚至爲了肉體的享樂而出賣靈魂，醜顏做奴才……「聰明人」搖頭的他們偏要苦幹，不論是血戰，是苦鬥，「老成人」激賞的他們偏不願做，不論是榮華，是富貴。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還是這樣，這是不容懷疑的。

大凡以前曾經一度自稱最愛護青年，或者混在青年隊伍中冒稱青年，以博一時聲譽的人，雖則會耍點手腕，會順風轉舵，可是不論名譽怎樣大，地位怎樣高，威風怎樣足，身份怎樣闊，如果仔細檢查起來，也不過是些上了油漆的飯桶，鼓脹着的氣泡，只是一批最空虛最無聊的東西，慣於出賣同伴的猶大的子孫。在「英雄與英雄崇拜」中，嘉萊爾曾經說過一段話：

「……你們且觀察那種人，祇因為不能爬過別人發着亮光，就會覺得愁苦起來，就到處去顯現自己，心癢癢地切盼着得到他的報酬和要索，掙扎着強迫大家承認他是個大偉人，奉他做個人類首領，彷彿爲着「神」的緣故在懇求一切人；這種生物，真是光天化日之下最苦痛的東西！能說他是個「大偉人」嗎？祇是一個病態的，貪婪的，空虛的人罷了……」

現在那些目空一切，睥睨一世，罵青年爲幼稚無知的人，爲着增高自己的聲價，提高自己的地位，嘗嘗領袖滋味，一方面固然是在天天搖着尾巴懇求人（却並不是一切人），懇求那些比他更有地位更有權威的人來扶植自己，包庇自己，做盡所謂「向兇獸顯羊相」的媚態以求歡；一方面却也是天天摧殘人，毀謗人，侮罵人，排擠人，攻擊人，用種種卑劣殘酷的手段來掃清自己顯貴騰達的道路，而在這些被摧殘被毀謗被侮罵被排擠被攻擊的人們中，青年無疑的是首當其衝，是得最先拔去的眼中釘。可是青年人並不是羊，始終是倔強的，最不容易收服的，最不可能用爲私人工具的——自然除了少數的例外，決不怕猙獰的兇獸相；因

此這些厚着臉皮斥責所有青年爲幼稚無知的「生物」，也終於只能裝裝耀武揚威的丑角，成爲一個光天化日之下最可憐，最貪婪，最空虛的「廢物」，實在連對青年開口的資格都還沒有，別說不知自量的嘲笑和辱罵了。

本來對這種人用不到費勁理睬，但在有些必要的時候，青年人也得更利害一點，即使他們是兩面派，多面派，喜怒無常，捉摸不定，也不必害怕，只要能嚴密察看，留心防範，加強警惕，隨時暴露其奸計，揭破其面具，顯示其空虛，搗毀其偶像。如果看到岸然的道貌，聽到吞吐閃爍的大言，就信以爲真，就以爲他們真個老練通博，自己真個幼稚愚魯，不禁肅然起敬，而感覺到畏縮猶豫，不敢放胆無情的戰鬥，那才是上當不少啊！

潔癖

如果數罵青年的弱點來，那末我敢武斷的說一句：「潔癖」至少是很嚴重的

一種。

潔癖的妨礙工作，是很顯然的事，因為太愛乾淨，就得限制接觸的範圍，縮小活動的地盤，但有些青年朋友，却偏偏要「明知故犯」，潔身自好，生怕黏上有一點骯髒，因此碰來碰去，都是那末一批熟人，走來走去，都是那末一些地方，生活的圈子愈來愈窄，發展到極端，甚至會只剩下「寡人一個」，在自己劃出來的圍牆中獨來獨往。

可是現實是複雜的，富於變化的，決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末單純，如果不打開自己的大天地，不衝出自己的小世界，那就看不到什麼地方是煙館賭窟，妓院歌樓，認不清什麼人在走私漏稅，貪污舞弊，壟斷操縱，酒食徵逐，……如果我

們不具體了解這些形式五花八門的情形，不能勇敢果決地投入這種惡濁不堪荒淫無恥的環境，深刻地加以觀察，無情地加以解剖，大胆地加以揭露，猛烈地加以攻擊，那就是懦怯，就是對現實的逃避。

舊秩序的維護者，最害怕的就是青年們能夠正視現實，改造環境；而最歡迎

期望的，却就是潔癖。他們往往利用這種青年的通病，以爲打擊青年的武器，這猶如捕捉「銀鼠」的獵人：

「博物學家告訴我們，說銀鼠原是一種白色的小動物，長着一身美麗的毛的。獵人想要捉它，用的是這樣一種計策：他們預先知道它常走的路，或是常到的地方，在所有的口子上放着污穢，這纔用大聲音去嚇唬它，將它趕到那些地方去；銀鼠跑到那些污穢跟前，就站住不動了，因爲它甯可給人家捉住，却不願意從污穢上跑過，以致損壞了它的潔白，原來它覺得身上的潔白是比自由與性命還可寶貴的。」

青年朋友是愛自由如性命的，這和銀鼠當然不可以相提並論，但如果過於潔身自好，孤介高傲，不願接觸任何和自己個性不同的人，不肯承辦任何和自己理想不合的事，看到腐化就逃避，聽說頑固就掉頭，胃口不投就皺眉，面目生疎就厭煩，這就正如銀鼠怕弄髒身體最受獵人的歡迎一樣；對於那些腐化頑固倒退的傢伙，也正是三生有幸，求之不得，只要你遠遠走開，不和他們到處糾纏，不和

他們到處別扭，不使他們老是感到不放心，不舒服，就是要使他們多唸幾聲「阿彌陀佛」也是高興的。

其實潔癖不但限制我們的工作，而且，也妨礙我們的寫作，我自己就深深地感到這種缺憾，極力想補救這種錯誤。記得過去在上海的時候，雖則日子也不算不久，但自己所接觸的人却老是幾個生活差不多，思想差不多，習慣差不多，嗜好興趣差不多的青年朋友，幾個喜歡寫作的文藝工作者；跑來跑去的，也老是只限於幾家書店，幾條馬路，幾個公園，幾座咖啡館，幾個電影院，就連比較像樣的跳舞廳，也沒有去過一次，其他黑暗的腐化的荒唐的然而確是豐富多樣的生活，尤其不會找出機會去理解。因為和廣大社會這樣隔膜，所以雖則身居上海，却並不熟悉這個東方唯一大都市的生活，因此大大地限制了自己的寫作範圍。如果不熟悉都市生活，而要勉強地寫作，那無疑的非得求助於天花板，求助於書本，求助於走馬看花式的訪問調查，道聽塗說，或竟至求助於空虛的頭腦，而這是最不可靠的創作方法。

所以，爲了工作和寫作，都得大胆地接觸任何環境和任何人物，不管和自己的志趣如何違背，如何不合；過份的自愛就等於自絕於人，就等於慢性自殺。我們不是脆弱的舊式女人，無庸怕誘惑，我們也不是易碎的廉價鏡子，無庸怕跌碎；我們應該堅韌強毅，能屈能伸，敢於面對一切，追求一切，摧毀自築的籬籬，跳出愈鑽愈深的牛角尖，深入黑暗的內幕，看清鬼蜮的面目，對準要害，咬定牙根，給以致命的打擊，澈底的掃蕩！

年 資

年齡可以表示資格，資格又可以表示經驗和能力，這大約是不成問題的。可如果是以此爲唯一標準，或者至少看成主要的標準，那就不敢恭維了。

但在機關軍隊里，年資却很重要，凡是「老資格」，總是處處佔便宜，不論怎麼樣，總彷彿高人一等似的。因此想向上爬的公務人員，就自然而然的要把年

資着成生命，視同寶貝。而事實上，有些人雖則沒有一技之長，也從沒有做過一件什麼大事，而由於他們的特殊關係，和深得陸豐暖飯，身寬體胖，清淨無爲，與世無爭的三昧，過了多少年月日，也可以贏得一個「五老」的尊稱，賺取一筆頗爲豐厚的「養老金」。

以前往往有人講笑話，說是在所謂「野雞大學」中，就是去馬或者豬狗吧，祇要在裏面安分守己，循規蹈矩的睡它四年，就可以畢業，畢業之後，油頭滑嘴的混它四年和玩它四年，也可以同樣的掙得一個資格，買一張文憑，換得一個學士的頭銜。這當然是笑話，人究竟要比牛馬呀狗呀豬呀聰明得多，這話的實在是在太侮辱「萬物之靈」，尤其太污蔑「最高學府」了。可是最近我又聽到另一個「並非笑話」……

……食堂里賣的叉燒包，本來賣五角錢一個，過不了幾天，就貴一倍；再過幾天，又是貴一倍，於是一倍，兩倍，三倍……不到兩個月，竟一連升了三級，如果核起一年資計來，那一定是不夠格，要被駁斥的……」。

這是一個殘廢而且幽默的比喻。而事實上，有些年資很高的「元老」，其價值還比不上叉燒包，或者同海涅所形容似的，只是些眩人耳目的「誇耀的風車」，只有像吉訶德先生那樣的傻子，才會把它當成巨人，當成偶像。我們青年人並不需要年資的鍍金，並不想得什麼崇高的階級和地位，我們測量自己和考驗別人的標準，始終是工作，熱情，經驗，學問，才力，犧牲的精神，輝煌的事業，除此以外更沒有別的，所以也用不到羨慕，更不想故意裝老成，拚命造履歷，銜耀什麼老資格。

可是，既然稱為青年，年齡是一定比較輕些的，如果以年資為取材用人惟一的或者至少是主要的標準，那末總是國家社會的一個大損失，因為這樣一來，在年資的重壓下面，一定會纏轉呻吟着一些的確優秀老練的青年，一定難免埋沒大批的確熱情勇敢的幹部。

而且，因為直到如今很多事情還是非常的混亂，非常的矛盾，甚至看起來竟是水火不相容，互相衝突。不論跑到那里，都找不到一貫的指導方針，以致青年

們都覺得餘糧苦悶。這在我不久以前寫的一篇文章「無所適從」上，就專門談到這點，今天偶然翻閱「鏡花緣」，又發現其中一個笑話，覺得比我上次所舉的一個例子更為恰當，更足以說明青年何以大都年資很淺的主要原因：

「……富翁回頭望小廝跟在後面，因發話道：我是你的主人，並非你的頂馬，為何你在我後？小廝聽了，隨即趨行幾步，越過主人，在前引路。未及數步，富翁又發話道：我非你的跟班，為何你在我前？小廝聽了，慌忙退後，與主人並肩而行。行未數步，主人又發話道：你非我的等輩，為何同我並行？小廝因動輒禱答，只得說道：請問主人前行也不好，隨後又不好，並行又不好，究竟怎樣才好哩？……」

試問像這這的主人，誰能伺候？誰能不馬！發蛋？誰能厚着臉皮再戀棧？而現在有些大人先生們，却往往風涼地責怪青年不知禮節，不懂規矩，不善於待人接物，不長於臨機應變，以致動輒禱答，不能長期工作，這只是看到事情的一面，因為事實上，的確有些上司，主管官，或者差等人物，使你無法迎合，漠視高

深，縱使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又謹慎，又謙敏，但所得的結果還是同樣的拮据，不能安心放胆的長期工作，不得不很快的另換工作崗位，另圖報國救民的機會；倒不見得凡是青年都沒有能耐，都愛好浪漫自由，見異思遷，喜新厭舊。

總之，要在機關軍隊裏長期服務，積累年資，就得心平氣和，養性修身，最好裝糊塗，裝傻子，除了「等因奉此」和吃喝睡玩之外，什麼事情都可以不管。如果太顯赫，太過於忙碌，太富於朝氣，那就會遭人猜忌，被人誣陷排擠，滾蛋。言不實，還得裝一層不自之冤，你看——站腳都這樣困難，還那裏談得到什麼年資！

由此可知，年資主義和唯才主義實在是不能並存的，要大胆引用和信任真有經驗才學的青年幹部，就得大胆打破庸俗而不合理的年資觀念。

無所適從

現在有些老成持重的聰明人，往往責備青年人做事沒有一條正確的路，說什麼工作都是亂紛紛，沒頭沒腦的，實在看不慣，因此慷慨激昂，大聲疾呼，說青年們應該趕快走正路，不可再任性而動，胆大妄爲。

勸導青年重理智，走正路，原應該萬分感激，不要說是出于真誠，痛哭流涕的忠告，我們願虛心接受，就是板起臉孔來嚴詞責斥，只要入情入理，我們也何嘗敢不俯首下心，洗耳恭聽？

實際上，我們却是顯然有條路，而且始終是條最正當的路，這就是人人都聽慣了的「抗戰建國」。凡是違反這一個目標，縱然是平坦舒適的終南直徑或康莊大道，我們也不走，反之，即使是荆棘叢生的羊腸小道，我們也不怕任何險阻，要一直走到盡頭。

我們自然不願意掩飾自己的缺點，因為經驗的缺乏和才學的不夠，因為世道的艱險和人事的複雜，我們實在也難免往往誤入歧途，走入迷宮，轉灣抹角，橫衝直撞，弄得筋疲力盡，皮破血流，却還是不易跳出重圍，找到一條光明大道。

如果這時有人大發慈悲，願意帶着火把來指引，甚至用不到費勁兒親自指點，只消表示一點關懷和同情，使初出茅廬入世未深的後生小子，在迷津徘徊時壯點兒胆量，也該使人如何感激和興奮！

叫人遺憾千古的，却是這些責備青年不該瞎摸索，亂衝亂跌的聰明人，始終不會費一舉手一投足之勞，給你一點什麼指點和引導，看到你的狼狽和聽到你的求援，他們只是袖手旁觀，幸災樂禍，甚或露牙咧嘴，乘機毀謗，誣陷，擁擠，壓制，使你捉摸不到，啼哭不得，彷彿他這番對你倒是該受的懲罰。

而且，如果更透澈一點的說，那末造成目前青年這樣迷亂，困惑，痛苦的「罪魁」，實在就是這些聰明人，就是這些百分之百「忠實正經」的份子。他們的居心和用意，他們的眼光和胸襟，他們的作風和手段，有如普式庚在「黑桃皇后」中所描寫的那個伯爵夫人，那個老而不死的惡魔，那個麻木無情的女妖，而倒霉的青年，却也正像那位在她懷客而又殘忍的管束下面受盡痛苦的黎莎、維塔伊凡奴夫娜——請大家看看這位侍女可憐的境遇：

「……她遞上茶嗎？馬上要受到耗費糧食的責備；她高聲讀一本小說嗎？伯爵夫人又會把作者所有短處都推到她的身上；伴着伯爵夫人散步嗎？那末壞的天時和壞的道路都是她的過失。規定的薪水從來沒有全數付給她，然而要她穿得像衆人一樣……在社會上，她的腳色是屬於最可憐的。」

目前的青年，有大部分所感受的痛苦，也和這段描寫所形容的差不多。譬如說：同是你的上司吧，却是甲有甲的意見，乙有乙的主張，丙有丙的立場，甲說是正確，乙說是錯誤，丙呢——也許更會乾脆地稱這爲紛歧錯雜，「亟需糾正」。即使是同一個領導者吧，那也不十分可靠，一會兒這樣說，一會兒又是那樣說，剛剛說是好的，只消裝一雙眼睛，便又被判定是很壞的了；你多做一點工作，他會懷疑你別有用意，另有背景，如果慎重一點，他又會指責你不聽命令，不受指揮，如果你從容鎮靜，他會罵你遲鈍懈怠，但你表現得熱烈奮發，却又不免被目爲思想不純正，行動越規範，需要嚴加約束……他整天不斷的劃手劃腳，指東指西，一個吩咐又是一個吩咐，一道命令又是一道命令，喜笑怒罵，全無定準，

裏叫丈二和尚摸不到一點頭腦，找不到一點門路。如果青年們不是生性剛直（照他們說法却是頭腦簡單行動幼稚），那倒也可以揣摩揣摩他們的心理，迎合迎合他們的胃口，可是既稱年青人，總是硬骨頭（他們却稱之為賤骨頭）的居多，那里願意卑躬屈膝，曲意奉承？即使是個最沒有出息的青年，也斷不至可憐到像在十九世紀俄國貴族地主壓迫下所常見的那些可憐女子一樣；不論受到怎樣厲害的箝制，如果必要，却可以毫不畏懼地站起來的。

青年究竟是青年。雖然他們有的是熱血，是胆量，不甘毫無代價毫無意義的飲泣吞聲，屈膝受辱，但在抗戰建國正極端艱難困苦的前方，爲了顧全大局，大多數青年却也願意受些悶氣，受些委屈，受些痛苦，始終是刻骨銘心念念不忘的忠於國家，忠於民族，除了少數的例外，決不會怨天尤人，自暴自棄，不會隨波逐流，與世浮沈，什麼貪污剝削，走私漏稅，種種害人害己的昧良行爲，自然更與青年人無緣。

近來有一位朋友從粵東游擊區里寄來一封信，其中有很沈痛的一段話：

「……近來許多有志青年，都因不願『吃飯不做事』而跑開，有的進學校讀書，有的幹自由職業，有的做生意，甚至因為不願任人擺佈，任人玩弄，任人利用，仰人鼻息，做一個傀儡式的有名無實的公務人員，而自甘墮落的也有，在這里我就看見了成千成百這樣形形色色的陷在苦悶中的青年，他們實在是感覺得無所適從……我會經努力嘗試着鼓舞他們，安慰他們，勸導他們，可是掛牌一掛『官』的招牌，他們看我彷彿總是以『官』的資格說話，因此都不理睬，只是冷笑，彷彿是在說，『你們嗎？……太不可靠！在你們手下做事真比做黃香地還要嘔氣……』所以，我們以『官』的地位已經很難接近他們，我想不再要這等份子，馬上掛冠退回文化崗位來工作。這樣對民族國家也許更有貢獻些。」

這些都是百分之百的老實話，很多青年人的確在感到無所適從徬徨歧途的痛苦，而煩悶着，甚至有少數的確願意以茫無目標的開濶來消磨自己的青春，虛度自己的年華。他們不知做什麼事才合正軌，向什麼方向才算正確，就是原來大膽走路的也難免感到縹緲渺渺，空空虛虛，顛顛倒倒，混混亂亂，糊糊塗塗……動

搖失望，以致連自己也把握不定，站腳不住，而慢慢的墮落下去；衰頹下去，萎老下去，在麻木的迷亂中混着日子，只剩下一副青年的骸骨，這實在是可悲的。

這是民族國家的一件大不幸，一個大損失。因為這些在混沌中被浪費了精力，被消磨了精神，很快地踏上老朽之路的人，又會儼然轉過身來，以人家責備過他的話來責斥朝氣勃勃，正在望着光明大道勇取地直追的後一輩青年，指摘他們太熱狂，太放任，太好動，要他們馬上回頭是岸，循規蹈矩，於是——什麼都台于中庸，什麼都上了正軌；大家彷彿戴上鍊铐，在荒涼的廢墟上進一步，退一步；老是打着古舊的圈子，即使有一點新奇，但變動也決不會過于急劇，即使透露出一線光明，但也只像隆冬想要鑽出雲層的太陽，老是忽隱忽現的，半溫半熱的，光芒決不會燦爛奪目。

如果這也算是一條路，那末只是一團黑漆的絕路，死路，試問青年人願意在這死路上毀滅自己，同時也葬送民族國家嗎？……

姑妄言之

(一) 號碼博士與鬥士

荷蘭 D. 望。諾單所著的「小約翰」中，有一個號碼博士，他只要一初結果在紙張上變成數目字，便感到滿足，便算是見了光明。

試一環顧我們的週遭，這種號碼博士型的人却是層出不窮的。不考察實際環境，不分析真正狀況，只要看到一些數目字的報告，一些數目字的統計，就覺得十分樂觀，彷彿不要努力和苦鬥，勝利也可指日而待了。

因此空虛的，誇張的，甚至無中生有的，連篇累牘的戰鬥報告，工作報告，成績報告，眩暈了人們的眼睛，衝昏了人們的頭腦，頭樹着人們的夢魂。

如果有人指出這些統計和數字只是抽象的號碼，它並沒有堅實的內容，那末他們一定會懷疑你，竊笑你，說你淺見，罵你動搖，怨你污蔑。

這些人是慣會愛人奉承，更容易自我陶醉的。

可是，我們的左右却也很多終清醒着的戰士，他們坦白地承認挫折，無畏地正視困難，他們決不以現狀爲滿，而不斷地作着堅毅勇敢的戰鬥。

新中國的希望，確是寄托在這些軀於戰鬥，繼續不斷進步的人們身上！

(二) 沒有埋死人一樣方便

死容易的，要好好的活下去却是很難。

記得馬雅可夫斯基在自殺前曾經說過和這類似的話。

這是真理。在平時如此，在戰時尤其如此，在一般人如此，在青年尤其如此。原因是戰時不容你活得糊塗，青年人更不願自己活得平庸。

要不糊塗不平庸，活得有意義有價值，原是怎樣艱難的事啊！

因此和「桃色的雲」中所寫自稱社會主義者的金兒一樣，有一部份青年同志，在開始的時候本來是生氣勃勃的，立志要奮鬥到底的，可是後來却仍難免喪失了勇氣和銳氣；表現出頹唐和懶散，甚至灰心絕望而喊着自殺，不願也不敢正視

崎嶇的道路和艱險的人生。

這實在是大可扼腕。

「舊社會正在死亡的時候，不能像一個人死了似的，你不能把它的屍體搬走，把它的屍體釘在棺材裏面，然後把它埋入墳墓中，它却依然留在我們中間。那屍體腐爛了就會毒害我們的，是呵，毒害我們的，它發着惡臭！」

抗戰固然在萬馬奔騰似的洪濤中蕩滌了很多瑕穢，淘汰了很多渣滓，沖倒了很多障礙，填平了很多漏洞，可是還不是順流，還沒有坦途。我們覺得更艱苦的跋涉。

所以，決不可錯認現在已經是萬事大吉，一帆風順，舊社會的惡勢力彷彿下等動物，斬了頭還有尾，斷了腳還有爪，那裏能望它死得瘟鷄一樣的快哩！

(三) 應當睜開眼睛看

看「水滸」，我不知是自己的成見還是事實的確如此，對於及時雨宋江，老是不敬佩，豈但不敬佩，簡直還十分的厭惡。我總覺得這是一個最好滑，最虛偽

最卑劣的人——不，實在只是一個奴才們的主子，而同時本身也是另一個大主子的奴才。

因爲李達老實不客氣的當衆揭破他——當然這不是有意識的，說他：「哥哥，你說做梁山泊主，便做個大宋皇帝你也肯」，所以常常挨他的罵，而這莽撞的「黑廝」，却也一再衝撞他，損害他的尊嚴。他念念不忘朝廷早降馮龍，赦免他，提拔他，重用他，所以一到聲勢相當濃厚，羽翼相當豐富，可以和朝廷討價還價的時候，他就提議請道家，大做好事，想洗身革心，受人招撫。這證明李達始終只是一個無氣節無遠見的「鄙猥小吏」，只配做一個卑躬屈膝的奴才。

在舊社會中，當慣奴才的人，沒有主人是不能生活的，去了一樣舊主人，他也得馬上再找一個新主人，或者找一個主人的主人，更高級的主人。宋江就是這種奴隸性的典型，他不願做蔡京高俅等等的奴才，却想再高攀一層，直接做大宋皇帝的奴才，什麼「盡忠報國」和「替天行道」等等鬼話，只是暫時麻醉人的「蒙汗藥」而已。

可是G·特里斯所描寫的羅賓漢，却有完全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氣概，這是一個反抗地主壓迫，反對貴族荒淫，有決心有主張的大盜，是一個英國農民叛亂的首領，是被壓迫者的真正代表。他那憤怒的言詞，沒有一句不是勞苦大眾的呼聲，他那悲壯的銀角，喚醒了成千成萬的奴才，前仆後繼的起來反抗統治和蹂躪他們的人：

「農奴制度必須消滅……取消苛捐雜稅！把土地歸還農奴，城市歸還工人！不要僱傭的穿著制服的劊子手，……不要僱傭，不要主教，不要皇帝！」

他痛恨着主人這一類寄生蟲，他認為最愚蠢而且可憐的是去了一個主人，而又想投靠和效忠另一個新主人的奴才——這是真正的賤骨頭。

當然，G·特里斯和施耐庵所生的時代和國度，都是大大不同的，我並不想不倫不類的把他們兩個人的著作來比較，他們有所責備和贊揚——那是毫無意識的舉動，我不過是同時讀了這兩本書以後，有所感觸罷了，因為，用不到諱言，不是一直到了現在，我們還可以時常看到這種富於奴才性的人嗎？這些人，甚

焉者索性一變而成漢奸和漢奸的走狗，或者在每天夢想嘗嘗當虎儀的滋味，次焉者雖則沒有胆量當虎狼的爪牙和盜賊的幫兇，却也很有做一生順民的志願。

應該睜起眼睛，注視這些或隱或現已顯未顯的奴才！

(四) 殿頭官遺風

在一直從前，清早五更皇帝陞殿臨朝的時候，在整整齊齊的文武百官中，看到天子一駕坐，往往就有一個面目猙獰的殿頭官聲色俱厲的大聲喝道：

「有事出班啓奏，無事捲簾退朝。」

我想在那麼肅穆的清晨，聽到這樣厲聲的吆喝，連發抖退縮都怕來不及了，除了寵幸的權臣和斗胆的忠烈以外，誰也不敢輕於出班啓奏的。

所以，在專制時代的朝廷裏，有幾人能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即使諫議大臣之類，除了準備死也那裏敢痛陳利害！

殿頭官實在是箝制言論的劊子手。

現在當然早已沒有殿頭官，但是不願用心聽取人家意見，不願人家盡情說話

的態度、我認爲仍然是這種死板着臉孔、圓睜着眼睛的殿頭官的遺風。
而遷於抗戰建國是絕對有害的。

(五) 買客賣客

有一位古羅馬的富翁伊台里厄斯雖很有錢，却缺少知識，因此，爲了和他有學識的食客談話而不致被人竊笑，他叫管家挑選出幾百個最聰明伶俐的奴隸熟讀「伊里雅德」和「阿特賽」等等名著，每人熟讀一本；要他們在高貴的來賓面前背誦被指定的某一章某一節，其餘的奴隸却靜靜地站着等待指定，彷彿一個歌隊的隊員，在等待着輪流到自己的獨唱。

這個「活的圖書館」替我們富翁增光不少，他的聰明和智慧，立刻得到羅馬全城的贊嘆。他自己的得意忘形，當然是不待言的。

可是這玩意兒終於露出破綻，顯出馬脚，因爲有一次他要一個就以「伊里雅德」命名的奴隸背誦這首長詩中的一節，那料這個奴隸却正在害着激烈的胃病，不能應命。

因此大大的丟臉，大大的掃興。

其實說，這種以「活的圖書館」來眩耀博學的辦法，是並不怎樣聰明的，這紙老虎容易揭破。現在的人却着實技巧得多，他們假裝冒充，買空賣空的手段，往往高明得使人吃驚。

大家不是都看得一清二楚嗎——現在凡是有地位的人都是博學多才，凡是有才智的人都具高位厚祿，不可一世的。這些人不論是怎樣無聊，是如何空虛，表面上看來却無不是令人畏敬，崇拜，視之如神明。

沽名盜譽至少要會偷功取巧，把人家的勞績據爲己有，更須要善於俯仰奉迎，曲意阿諛，工於吹牛，長於拍馬。這種令人咋舌的神通，當然不是相隔數千年，相距數萬里的古人所能夢想。

但歷史的巨輪，終於會把這些空存形骸的軀殼碾得粉碎的啊！

(六) 只往顧上看

在青年同志中，大約最使人憎厭的，就是那些不顧平輩和下輩，却只光着眼

睛往上看，伸開雙腿拼命往上爬的人。

這種人眼光如豆，凡事只看到他的主人，卑躬屈膝，曲意奉承，其卑劣之狀，其奸險之心，今古同慨。

有時，他們也講羣衆，也稱同志，也立信誓，也說革命，可是，革命宣誓只是招牌，羣衆同志只是墊腳凳。

有時，他們也講兄弟，也談姊妹，也尚信義，也崇豪俠，可是信義豪俠只是掩飾，稱兄道弟只是假面具。

當他責備你背信負義的時候，他已在陰謀偷襲；當他勸導你親愛團結的時候，他已在準備離間，甚至不惜多方毀謗之，排擠之。

所以如此，無非都是爲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壓低旁人的頭，騎在旁人……也即是兄弟，姊妹，同志的身上，揚揚馬鞭，雙眼一瞬不瞬的注視着自己的「恩人」，受寵若驚的飄飄然的扶搖直上。

古時歐洲有一種專門抄寫「聖薩巴斯丁傳」的修道士，他關在一間小房間里

不斷地寫着寫着，不敢有一點懈怠，因為他相信聖薩巴斯丁在天上監視着，計算着他已抄寫多少行，多少格，多少字，生怕少抄一個字或者抄錯一行而受罰，不能超度自己罪孽深重的靈魂，所以他的抄寫就是修行。

在目前一些專愛向上爬的人們中間，除了鑽營和奉承而外，偶爾也做一些所謂羣衆工作或抗戰工作，有時專求報銷，專裝門面，華而不實，有時却也做得居然不壞，但推其動機和目的，也無非和修道工們的抄寫相差不遠而已。

而這些人，却時常被認為前進份子和羣衆領袖，真是！

信徒。先知。救世主

閒坐無聊，忽然想起一些關於信徒們的瑣事。

首先我想起「托爾斯泰主義者」。

大家知道，雖則托爾斯泰是一個出身貴族和篤信基督教義的癡漢，是一個充

滿着矛盾的人物，雖則他那不抵抗主義的說教，對革命非常有害，可是他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却是無可否認的。

但自稱或被稱為「托爾斯泰主義者」的一些人物，却大都是貧弱空虛，庸俗無聊，懦弱而且自私，愚蠢而且自大，特別善於矯揉造作，沽名釣譽，簡直是些最無人格的騙子。高爾基曾經描繪過他們的嘴臉：

「這是奇妙的，看見萊翁。尼古拉維奇在所謂「托爾斯泰派」的中間。這彷彿是聳立着一座莊嚴的鐘樓，鐘聲不倦地震盪着全世界，而它的周圍，却奔竄着一羣纖弱的胆怯的狗，向着鐘狂吠，而且互相懷疑地怒目橫視，好像說：究竟「是誰吠得最好呀？」……這班「托爾斯泰的信徒」，和點流在俄國各個角落裏，把隨身攜帶的狗骨當作聖骨，出賣「埃及的黑暗」和「聖母的眼淚」的托鉢僧，頗有其相似之處……」

就是托爾斯泰自己也很明白這些人的價值。有一次，在一個所謂「信徒」也者的人當面恭維的時候，他就屈身向高爾基的耳邊輕聲的說：

「這流氓是時常說謊的，他不過用這些話來取悅我而已。」

當然，這些托爾斯泰的信徒，經不起時代巨輪的輾壓，已在無聲無臭中慢慢絕跡了，真正繼承托氏遺產的，倒是並非「信徒」的蘇聯公民。

可是，在我們中國，我却直到如今還看得見托爾斯泰主義信徒們的化身，這些人的特徵也是狡猾，懦弱，虛偽，卑鄙，阿諛奉迎，鑽營吹拍，儘管是滿口仁義道德，却不妨滿腹男盜女娼，舊俄的托鉢僧不過只能把狗骨當成聖骨，把假藥當成真藥，而我們目見耳聞的信徒們，却更其巧妙，他們只消弄到一張特許的護照，就可以到處橫衝直撞，不但是陰暗的角落裏和家鄉僻壤中，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和通都大邑，他們也可以用真誘，用威脅，用命令，用佈告，用傳單，用標語，使人家相信他所販賣的假貨就是真貨，毒藥就是仙藥，自己的狗骨就是什麼聖骨。

最使人吃驚和嘆服的，還是此輩的頑固專橫，這決非托爾斯泰主義者所能企及；如果允許我穿鑿附會，那末也許古代自稱為猶太教正統的法利賽人，或者達

可比擬于萬一，其實他們的故步自封，墨守成規，排斥異己，忘自尊大，就是那
些上帝特選的子民怕也望塵莫及，而不得不嘆爲「飛躍的進步」。

猶太教創立之初，本來是很單純的，崇奉者雖則原始，却大都一往情深，禮
儀亦至爲簡樸，摩西十誡中並且禁止雕刻偶像。可是後來獻祭越來越多，儀式越
來越繁，固有的宗教精神和宗教熱情，蕩然無存，教義也變成了教條，了無生氣
，自稱忠實的信徒們只知死守律法，互相欺詐，尤其是法利賽人，竟以爲只有他
們才能贖罪，只有他們才可以進天國，因此個個都是把上帝當作自己的背景，自
己的靠山，把傳教當作自己的法寶，自己的專利，真可謂氣餒萬丈，盛勢凌人。
但上帝也頗有「良知」，托爾斯泰稱自己的信徒爲騙子，同樣的，耶和華也憎惡
自己信徒的偽善與無賴。例如在「以賽亞書」中，他就借着先知以賽亞的口，說

過如下的一段話：

「爾守節期，又復爲惡，故我不悅，——爾曹殺人，雖舉手禱告弗輟，我心
不俯聞，而返棄爾……」

可見宗教的真精神也是在實踐，在言行一致，決不是掛了一塊金字招牌或者戴了一頂老虎帽子，就可以隨便吆喝，擅作威福，百無禁忌；其實，把教義當作教條，當成符咒，當成法寶，當成工具，當成萬靈藥膏和無可抗拒的金鋼箍，或者捧一個偶像，視同偶像，視同傀儡，視同菩薩，視同大成至聖和無攻不克的「坦克車」，都是最愚蠢的事。

只有經得起一再的試驗，才能稱為真正的信徒，光靠欺詐的法術和威迫的手段，縱然能得志于一時，却總有一天會被拆穿西洋境，看透紙老虎，露出真面目，顯出原形來。

因此，在說過法利賽的保守與專橫以後，請再聽我講一個可尊敬信徒——所謂彌賽亞（即基督）的故事。

原來在十六七世紀，猶太人正在水深火熱中過活，不是受壓迫，受裁判，受侮辱，就是被驅逐，被流放，甚至被強制着佩帶特別的證章，以便惡棍們的嘲弄侮辱，因此連走路上街也會成爲衆矢之的，沒有一點生命和自由的保障，甚至躲

在自己家里的地窖中也會觸從天來，隨時都有橫遭抄沒財產和被毆辱的危險。所以他們日夜夢想總有一天會見到光明，會再度見到彌賽亞的降臨。

於是大大小小的騙子就出現了。他們自稱爲聖子，爲先知，爲上帝的代表，爲惟一的真正的彌賽亞。這些巫師們大都是來去無蹤，神祕莫測，他們到處念符咒，玩魔術，耍把戲，談魔鬼，算命還，總之是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哄騙猶太人。其中有一個名曰薩巴泰的猶太青年，尤其特別，他裝出十足古怪的狂態，在衆面前輕視自己故意餓瘦了的身體，高聲的唱歌，口中不斷的念念有詞，一面散發着荒謬的傳單，一面宣講着他自己的福音。

猶太人盲目的信仰他，崇拜他，彷彿大家都着了迷似的。到處說着薩巴泰，到處寫着薩巴泰，到處歌頌着薩巴泰，在他們的心目中，薩巴泰就是救世主。可是，在這時候竟有另一個彌賽亞出來爭風奪寵了，于是他被告密而且立刻給帶到土耳其王的面前受審，因此，紙糊燈籠一下子戳破了，一切的真象都給揭穿了，這位自稱耶和華惟一和真正的信徒的薩巴泰，爲着保全自己的狗命，竟搖身一變

翻爲回教徒，若無所事的除去猶太人的頭巾，帶上了土耳其的包頭。

這一消息開始竟使全體猶太人大爲震駭，有的驚惶失措得無所適從，有的因爲發現自己的受愚而羞憤以死，有的却還執迷不悟，以爲薩巴泰改教只是一種奮鬥的特殊方法，仍然是上帝的意志，至多也不過是這位救世主一時的挫折，可是在事實證明他只是一個最無恥的騙子，只是一個最卑劣最無賴的俗物以後，人們終於紛紛的掉頭不顧，不再受他的欺騙了。

自稱再生的薩巴泰，而結果也和薩巴泰一樣無恥地變節的佛蘭克，也是如此。

其他不計其數的所謂彌賽亞，也莫不如此。

我們現在有沒有這種類似薩巴泰和佛蘭克的政治騙子呢？

有的，而且還多着。

已經叛變了的汪精衛，便是典型。

這種人手段是很「高妙」的，技巧是很靈活的，經驗是很豐富的，他生有一

雙鐵腕，一對賊眼，兩副嘴臉，兩種心肝，在某種時候，這裏開一張支票，那裏許一個大願，奔走，呼號，宣誓，演講，通電，廣播，他有的甜頭，有的是幌子；慷慨激昂的時候他會痛哭失聲，英武奮發的時候他會歡呼叱咤，因此很容易贏得一個什麼英雄的美名，所以汪精衛在未叛變以前，居然也受過人家的頌揚，崇拜，擁戴，青年們當然更其熱狂，幾乎視之若神明，尊之如父兄，個個都是趨之惟恐不及，消望在他的領導下有所報效，有所貢獻，有所犧牲。

不幸這一切都是騙局。

因爲，托爾斯泰所說這一類「爲自己而不是爲別人的苦行者」，當然是只顧自己超升的，所以，在必要的時候，爲着掃清一切自己飛黃騰達的障礙，這些英雄或好漢也會馬上放下笑臉，舉起屠刀，給你實地的「教訓」。

被欺的人們和青年，開始時也許會和古猶太人一樣的驚惶失措，一樣的失望苦悶，一樣的悲觀動搖，一樣的彷徨迷亂，可是這只是一時的困惑，不會長此的混沌下去。

枷鎖尙且可以粉碎，何況教條？上帝尙且可以搗毀，何況偶像？……

托爾斯泰主義者如今在那里呢？法利賽人又在那里呢？還有自稱救世主的彌賽亞們又在那里呢？汪精衛固然不必說了，就是他的徒子徒孫們的前途，又在那里呢？

繼承托爾斯泰的並不是他的信徒，而是蘇聯的公民，真正能夠發揚猶太精神（如果承認這種精神真個是偉大的愛）和指出建造地上樂園之路的，也不是法利賽人和真假的彌賽亞們，却是並不以什麼先知和信徒自命的卡爾；至於汪精衛們，却不但不能保國衛民，反而墮落到叛黨賣國，搖身而一變再變，終于變成狗彘不如的蟲豸。

這正是歷史的悲劇。

嗚呼

有一種人簡直想把女子捧到天上，說補天的是女子，救民養蠶的是女子，饑饉相救越滅吳的是女子，和親安漢的是女子，從軍救隨的是女子，賽金花是女子，秋瑾是女子，獻旗給八百壯士的也是女子，中國命運全繫在她們身上，真可謂讚美得無微不至。

却也有一種人要把女子壓到地下去，說亡商的是女子，亂周的是女子，叛漢篡唐的是女子，把宋徽宗鬧得昏頭昏腦的是女子，陳圓圓是女子，陳璧君也是女子，中國全亡在她們身上，真可謂攻擊得體無完膚。

這兩種人說法雖則不同，一是抑，一是揚，一是捧，一是罵，可是推根究底，用意却是一樣的：無非都是把女子當成奇貨，當成異類，當成特別的一種生物。

因此女子終於被擠出「人」的範疇，讚美的時候固然可以稱之為花瓶，點綴品，辱罵的時候却也很方便的，可以稱之為妖魔為禍水為迷人精。

花瓶自然應該陳列在雕梁畫棟的大廈中，點綴品自然應該裝飾在大人先生們

的公館里。

妖魔自然應該用名教的寶塔鎮壓，迷人精自然應該用倫常的鐵鍊枷鎖。

這是千古不移的金科玉律，不但完全國粹的孔老夫子和歷朝大儒，就是一世之雄的希特勒也會提倡三K主義，萬流欽仰的文豪托爾斯泰也會說過：『女人是男子的事業的障礙物……要不永遠受着障礙的惟一方法，便是結婚。』

而這結婚的內容，就是家庭廚房和生育，就是所謂『生物上的平等』和『生理上的平等』。聖經中不是明明說過女子只是男人一百骸中之一骨，全體中之一肉，夏娃不就是耶和華取亞當的脅骨造成的嗎？如今，文人學士們卻說男女在『生物上』和『生理上』是『平等』的，總算是開明得多了，爲着追求這種平等的幸福，爲着不但不妨礙男人的事業，而且完成他們的前途，最理想的方法，當然還是結婚以後就在家庭中養兒育女，煮飯燒菜，難道這樣淺顯的道理，還待喋喋不休的解說嗎？

可是，也許真是人心不古，世道衰微了吧，現在的女子卻偏不肯安居樂業，

偏要衝出廚房，離開家庭，踏上戰場，走進工廠，整天價迷戀於什麼工作事業，喧嚷着抗戰建國，要和男子一樣的工作，一樣的學習，一樣的戰鬥，還自稱什麼幹部；真是太不自量，太不知趣，太可惡！

更何況是婚後，甚至已經做了兒女的母親？

據說大周金輪皇帝武則天受命維新，求賢若渴，可是就是這位空前絕後的女皇帝，在她爲着遴選閨秀而開女試時所頒佈的「科條」中，也有一條特別的規定：「年十六歲以外，不准入考，其年在十六歲以內，業經入室者，亦不准與試」，足見結過婚的女子，要被淘汰確是「古已有之」的。現在自然更該讓出所有的職業，服服貼貼的回到廚房去，育兒養女，煮飯燒菜。

如果女子們再不覺悟，再不安分守己，痛改前非，趕快回家做小姐太太，賢妻良母，那其愚真不可及，其罪尤不可道，難怪文壇宿將和名教授們要搖頭太息，或者竟至羣起而攻之了。記得在「浮士德」中，格萊卿的阿哥華倫亭責備他自己的姊妹時，曾經有下面兩句：

「即令上帝給你認罪，

你在地上總不免永受非難！」

可見女人的命苦，在某些人看起來，即使上帝恕她的罪，也是要永被責難。其實我以為爲橫遭天譴和沉淪地獄都不可怕，可怕的倒是「人言」，倒是一些名人的非議，責備，污蔑和排擠。古人不是早已說過：「亂非降自天，生自婦人」，如果今之女子不勤於「治內」，倒妄想「治外」，那當然是大背於聖賢之道，更有違立國的精神，這簡直可以嚴刑正法，更何況只是區區的口誅筆伐呢？

嗚呼，中國的女子！

開門和關門

最近重讀易卜生的「大匠」，發現里面有些句很有意思的話：

「我知道——我覺得那日子漸漸地近了。總有一個人要說，給我一個機會！」

到那時候所有其餘的人都要跟在他後頭叫喊，磨拳擦掌的對我嚷道：讓開——讓開——讓開！你瞧着吧，不久那後輩就要來敲我的門了……他們來了怎麼樣？到那時候索爾奈斯哈爾佛特就要完了……我告訴你——我漸漸地在這里害怕起來

——怕極了那些後輩……

這位大匠——建築師索爾奈斯哈爾佛特的心理，正是目前一般害怕青年的人的心理。索爾奈斯那種胆怯，多疑，嫉忌，自私自利的個性，也正是目前一部份自命爲「前輩」或「先進」的人的個性。他們喜歡故步自封，不肯稍稍前進，彷彿索爾奈斯似的生怕看到打着新旗號來敲門的後輩，生怕在新的環境中自己的運氣也會跟着變壞，他們也日夜唯恐青年來妨礙自己的前途，奪取自己的地位，因此自己既不願前進，還要拉人家一同落伍，如果你偏要倔強，愛求進步，那末他們就會想盡方法來排擠你，壓倒你，把你踏在地上，永遠不得翻身——不但此也，除了硬幹以外，他們還會用點軟功夫，就是使你自己不信任自己，以爲自己真的永遠沒有獨立的能力，必須一生服服貼貼的依賴他們和服從他們。

只要稍稍留心一下，就可看到不論那一個機關，那一個團體，至今還有這種索爾奈斯型的人，他們的惟一手段和目的，就是剝奪別人的生命，養肥自己，遮斷別人的前程，保存自己，確是最頑固，最黑黯，最卑劣，最有害抗戰建國的廢料。他們的枝節，大半是超政治的，也確實厲害狠毒，非青年所能預防，所能招架，可是在這空前的偉大時代中，前進的依然前進，飛躍的依然飛躍，難道關上大門，造成防寨，真的就可以高枕無憂，萬世太平了嗎？

當然，這只是幻想。新環境需要新的改造，新工作需要新的人材，一個國家民族的新血液，尤其需要新的血球和急速的循環，陳腐的，破舊的，霉爛的，總歸要給毫不容情的淘汰，消滅，苟延殘喘挽回不了垂危的生命，迴光返照只是預告黑夜的到來，正同建築師索爾奈斯一樣，在新起的力量之前，總有一天要從半空中墜下，跌個粉碎。

如果不必青年來撞門，捶門，如果歡歡喜喜的出去替他開門，和和氣氣的引他進來，把自己的工作和成就很誠懇的傳授給他，把自己的經驗和教訓很詳細的

指點給他，把自己的缺點和弱點很虛心的告訴給他，好的勸他們學習，壞的幫他們避免，像父兄接待遠歸的子弟，像師友歡迎新添的成員，那末，那一羣青年會不敬仰你，愛護你？你又何用戰戰兢兢，搜腸括肚的設法來防止新人的崛起，保全自己的地位！……

現在決不是「老」與「少」對立的時代，而是「新」與「舊」鬥爭的時期，對於高齡而愛好進步愛好真理的人，只會受到特別的尊敬，因為他和青年始終是打成一片聯成一氣的，他根本用不到害怕後輩，用不到關心自己的門戶，青年也決不會瘋狂到無故磨擦擦擊，叫他讓路。而那些外幾年紀輕輕，內心却已老朽腐爛了的分子，却才真真值得大家唾之以口涎，餉之以老拳，罵得狼狽叫三聲：滾開！滾開！滾開！

不算奢望

說真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說真話而遭殃的人在中國固然很多，即在西洋也莫不如此，而最痛切地感到說話難的文人，往往有更深的感觸，例如弗祿貝爾就會沈痛地自白：

「我真爲自己的職業害羞！爲着不讓自己餓死，爲着獲得必須的一點很可憐的報酬，我祇說了我所想的一半或者四分之一……我這樣，我還是担心中每句句子都有使我吃官司的危險……」

在專制時代，「偶語」已足以「棄市」，如若着爲文字，自然更應該投獄或殺戮，因爲只有使人們不敢所有批評，有所指陳，有所不滿，專制者才能安於其位，就是以「博愛、平等、自由」做號召資本的右派資產社會，除了蓬勃向上的初期，也不容許一個作家正確地觀察分析和描寫，強迫作家歪曲或粉飾現實，不論是用軟功或硬功；弗祿貝爾的悲憤決不是一時的牢騷。

可是，現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完全不同，而且一個真情的作者是不怕任何阻難的，因爲這就是戰鬥。如果有黑幕不敢揭發，有正義不敢主持，却毫無痛癢

的寫些文章，而其目的只是在糊口和苟全，那倒不如乾脆擱筆的好。

不過，說真話首先要顧全大局，不可專門求痛快，換句話說，就是說真話也要有分寸，有含蓄，有原則。青年人看到缺點和不愉快的事情，聽到對抗戰國策有害的輿論，就不免心頭冒火振筆直書，連自己所處的是什麼環境，所負的是什麼責任，寫作是爲了什麼目的也都忘記了。大約喜歡痛快確是青年朋友寫作的大病，通病，我自己也常常犯，所以特別提出來和大家商討，倒並不是我最近忽然學到了什麼保身哲學，或者新得了什麼方巾氣，和大家板起臉孔來講中庸穩健，實在是因爲痛感到李逵式的東打一棍，西打一槍，於事情並無補益。魯迅先生說過：『要論作家的作品，必須兼想到周圍的情形，』論作品當須如此，寫作自然更無論了。

如果是諷刺，那更應該就平常普遍的現象着想和落筆，而且對於自己諷刺的對象，至少要有一些善意和熱情（已被認定是對於國家民族不利，急須迎頭痛擊的當然例外），勸誘他改進向上，決不是全般抹煞或者毫無原則的謾罵，更不是

惡意的攻擊。魯迅先生又說戰鬥也該講究技巧，講究戰略和戰術，千萬不可赤膊上陣，橫衝直撞，自己沒有看清敵人，倒先給敵人以射擊的目標；所以我們爲着更有把握的戰鬥，爲着更能發揮文藝的效用，也應該善於掩護，不冒失，不囁嚅，否則真話倒會變成廢話和昏話，祇是暴露了自己的無能和無知。

「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

這也是魯迅先生的話，是頗撲不破的史實和真理。現在已是抗戰的第五年度，黑暗的现象還在四處存着，對於這些障礙，就得忠實勇敢的作者大胆來說話，大膽指發，「晴」和「騙」祇會把國家民族帶入歧途，陷入絕境，所以一方面我很希望政府盡量的鼓勵作家多說實話，因爲只有這樣才能洞察隱微，集思廣益，同時更希望所有的作家能有更大的熱情，更大的勇氣，更好的方法來傾吐真情，表示意見，或以小說，或以戲劇，或以詩歌，或以短論，或以雜感和隨筆，總之是要能運用各種文藝形式，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坦白地傳達表現出來，而又能保證絕對有利於團結抗戰。

這也就是說：我希望一九四一年的文藝界比較一九四〇年更自由，更活潑，更富於生氣，更往前發展——這大約並不是奢望罷。

「新」「舊」談

中國人大約是最會打便宜算盤的，譬如過年罷，大都是只用塵帚在房屋的圍周和角落打掃一下，大門或邊門上貼上一付「爆竹一聲除舊歲，桃符萬象更新春」之類的紅對聯，就彷彿什麼事都已有了變化和改進，真的已是煥然一新了。

可是，社會上的積弊却決計不像是這麼容易就可革除，用掃帚固然不夠，就是到處貼滿符籙也何嘗有效。儘管門面裝得怪漂亮，心符咒唸得怪好聽，可是有目共睹的，却是抗戰三年後的元旦還是依然滿地的垃圾，滿街的污穢，漫天遍野的灰塵。

固然，在垃圾中也未始不可找到珍貴，在污穢中也未始不能看到皎潔，透過

混濁的塵埃，也不是絕對發現不出希望的光輝，燦爛如鏡的前途，但絕不能因此即無視垃圾，污穢，與障目的灰塵，而盲目的稱頌，謳歌，讚美，一味的自我陶醉。

掃清一切垃圾，排除一切污穢，打破一切障礙，擦開一切幻想，大踏步的前進——這是抗戰建國必勝必成的關鍵；所以，在一九四一年，我願大家真誠的用心用肉來「除舊佈新」，不再以爲昏昏暗暗的未來開弄一番，就真的可以便「萬象回春」！

絕路與生路

看：
好久沒有收到三妹的來信，忽然接到了，當然是很高興的，可是拆開來一

「大哥：儘管坐着發呆，還不如來告訴大哥；時局的變遷，是不能預測的。

這幾日來，浙東局勢驟趨緊張，諸暨，紹興，相繼淪入敵手，先鋒隊進抵排頭，一邊抵滄江，時局大為混亂，同學有哭的，終日差不多都在愁悶中過去。唉！大哥！處在如此的局勢中，真是難堪，只有活日算日，得過且過，可是一個青年，竟使如此的過去，實在太覺可惜了……依校長和先生們的報告，如安華一失守，學校就立刻搬家，先遷往永源，山盆，再慢慢移入松陽，啊！如此長途的流浪，我真不敢想像，以後又不知會飄泊何省？我希望這流浪的厄運永遠不要光臨到我的頭上來，永遠不聽見這刺耳的名字，不離開親愛的父母姊弟們！不過，這厄運是否會臨到我頭上來呢，那只有靠我的命運了。現在只有等待命運的轉變和決定……唉，大哥！這或許是妹妹的最後一封信了，想到這里，熱淚不禁奪眶而出，眼睛已看不清什麼，只得讓這封信在糢糊中結束了吧……」

徹骨的寒冷，使我喪失了再讀第二遍的勇氣，我感到難過，憂傷，憤慨。對於妹妹我固然是失望，同時更替她擔心，我料不到她竟會這樣慌亂，迷惑，悲觀，甚至委身於個人的命運。讀完她的信，我好像看見一個可憐的受難者，在等着

受末日的審判，又像聽見一頭軟弱的羔羊，在被屠戮前的悲哀的悲鳴。她原是我於抗戰開始那年帶往上海讀書的，但在自己匆促地離開以後，就把她委托給一個朋友照料，使她繼續在法租界的一間私立中學里求學，直至去年她才問道回到家鄉，在縣立初中畢業以後又進了高中。現在抗戰已經好幾年，她也是一個十多歲的中學生了，可是對抗戰的認識竟是這樣模糊，這樣錯誤，對戰局的變化竟是這樣的沒有把握，沒有一點自信與毅力，真正是出我意料之外。

而更使我驚奇的，還是素稱文化之邦的浙江，在抗戰幾年後竟還存在着這樣的中學，這樣的校長和教員，這樣經不起暴風雨侵襲的中學生！我不知道平日所高呼的抗戰教育到那里去了，平日所自豪的戰時訓練又到那里去了，我也不明白這樣的教育有什麼用，這樣的學校有什麼用，這樣的校長教員有什麼用，這樣的學生有什麼用？我更不懂得，這樣的教育和平時的教育有什麼差別？

這樣的教育只配點綴太平，只配歌功頌德，只能蒙蔽麻醉，只能逃難苟安，只是變相的亡國教育！

不用說，抗戰幾年來什麼都有進步，教育文化方面也是如此，可是多年來鬥奮鬥過程中還有一些倒退和停滯，黑暗和落後，教育文化方面自然也不能例外。因此我們要大聲疾呼，要真誠指摘，要亟圖改進！

直到現在還有人懷疑戰時教育的實施，不肯切實的在生活和工作中來鍛鍊兒童青年，否認一些兒童青年團體對於生活教育和集體教育的貢獻，對於新的教育內容和教育方式的貢獻，而仍然固執地迷信課堂和課本，迷信填鴨子式的注入教育，因而理論與實踐脫節，工作和學習分家，生活和技能對立，矛盾，混亂，空虛，懦弱，無知，愚昧，因而青年只得彷徨猶豫，張惶失措，苦悶悲觀，聽其自然，委之天命……

這實在是教育的絕路，國家的不幸，我們是求生，是要活，用不到裝璜門面，紛飾太平，因此我們所要求的也是活的，勤的，勤的教育，勤的教育，勤的教育，勤的教育，勤的教育！

隱身的帽子

大約一個人最怕人家說壞話，尤其是當面指出自己的缺點，自己的錯誤，因此掩飾成爲不但是中國的，而且也是全世界的傳統。

一些遺老遺少不必說了，他們的特長就是四面光，很圓滑的裝飾門面，就是在很多青年同志中，也難免這種毛病。譬如自我批評吧，很多人就不願意，互相檢討也不大歡喜，即勉強接受別人批評或者被迫自我檢討，總是閃閃爍爍，吞吞吐吐，猶猶怩怩，扭扭捏捏，不肯徹底，尤不能痛改，洗心做人。

可是，還有一些人却更壞，對於他們，我以爲下面這一段話最是恰當的寫照。

「波爾西斯（Persius）戴起一頂隱身的帽子，叫被追逐的魔鬼看不見自己。

我們德國人却把隱身的帽子，緊遮着耳目，說沒有魔鬼。」

這是『資本論』作者指摘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德國的話，他說當時的德國社會慣會欺瞞自己，掩飾缺點和弱點，揭露自己的黑幕，這和我們中國現在有些人的論調是完全一樣的：他們稱虛張聲勢爲堅定自信，罵指摘錯誤爲人身攻擊，暴露黑暗爲長敵人威風，滅自己志氣。他們愛歌功頌德，愛粉飾太平，愛敷衍而且，愛自欺欺人，打腫臉孔當胖子，搔到他的癢處就難受，打中他的要害就羞惱，……這真是無可救藥。

索性再抄一段書吧：

……伊里奇呻吟，打開他的眼蓋一點兒，他快樂的眼睛被痛苦籠罩着了，痛苦遮蓋了他的微笑。

「醫生……」他輕輕的喚着。

奧布克彎身向着他。

「我完了嗎？」

「那里，烏拉基米爾。依里奇，你怎麼會這樣想呢？」

依里奇看了他一眼，打斷了他的話。

「你是一個黨員，對嗎？」

「是的。」

「你得明白……假如完了的話……我必須知道……真正的情形……要給我時
間……有許多事情……給我時間……叫約瑟夫到這裡來……」

「烏拉基米爾·依里奇，你會活下去的！」

「你最好對我直說啊……」

「假如需要的話……我再告訴你好啦！」

「允許……」

「我可以對你發誓。睡覺吧，請你……」

這是蘇聯創造者依里奇受傷垂危時和醫生的對話，他要求醫生絕不隱瞞他的傷勢，把他的病狀直說，而他這樣要求醫生的時候，並不以普通人的資格，却是憑着黨員的名義和同志的關係，因為在依里奇看來，最重要的是確實地明瞭自己

的病狀，把振千鈞一髮的時機，來作必要的準備，不敢問自己的病狀，不敢聽自己的真實處境，只是懦弱與胆怯，而一個革命的黨員，却是不應該稍有隱瞞，用無益的安慰來貽誤必要的工作。

可是，偏偏在我們抗戰建國最艱苦的時期，有一部份人還是害怕正視現實，不願虛心檢討，力謀改進，而專想忌疾諱藥，坐待天命。

我以爲全國同胞對於抗戰幾年來尙未克服過來的缺點，既不必悲哀，灰心退却，也不可妄存樂觀，僥倖圖安，希望個個都能認清和承認艱難困苦，而不被艱難困苦所征服，不然，卽使戴隱身的帽子，緊遮着自己的耳目，裝聋作啞，實在沒有魔鬼追趕我們，可是魔鬼終於會追上我們，而把我們打倒，踏在牠的腳下，永遠不能翻身的。

多可愛的老頭

近來彷彿對托爾斯泰頗感興趣，因此寫雜文時老是想起這位老頭來，這並不是我同情他的說教，却是覺得他有一些話：直到如今還是十分警闢和值得人們反省。例如他說：

「我相信爲在「愛情」中獲得進步起見，我們祇有一個辦法：祈禱。不是在廟堂中的公共祈禱，這是爲基督所堅決擯斥的，而是如基督以身作則般的祈禱。」他這裏的所謂祈禱就是行動的實踐，言行的一致。這對於專門愛在公共場所背誦教條，愛在羣衆面前亂開支票的人們，難道不是絕好的教訓嗎？又如他說：

「今日最大的罪惡，是人類的空洞的愛，對於離得很遠的人們的愛……愛我們所不認識的永遠遇不到的人們，是多麼容易的事！我們用不到犧牲什麼，却很足以借此自滿自豪……不，應當愛你的近鄰……愛和你在一起生活而阻礙你的人……」

固然，要愛阻礙自己底事業和工作的人，是困難而且不必的事，有真的恨才

有眞的愛，敵友是要分明的，愛遠處固自己站在一條戰綫上的友人，自然更是應該的；不過，對於爲了個人的利益，而設法誘惑陷害和自己同甘共苦的同志在身邊的同志，封滿口空空洞洞的說些什麼拯救人類，維護和平，愛護民衆，造福世界的大言不慚者，托老頭子的這一段話，却是入骨三分的諷刺。

真正的一忠恕，當然是美德，是我們這老老民族的傳家寶，可是一到某些人的心目中，這兩個字就變成了敷衍塞責，自私自利的同義語，而托翁却是最反對自滿自大的。

——能夠對自己不滿是應當感謝上帝的。希望永遠能夠如此！生命和它的理想的不調和正是生的標識，是從渺小到偉大，從善到惡的向上的動作，……當一個入平安而且自滿的時候，便是一種罪惡了。

托翁更曾借他名著《活屍》中的愛狄亞的嘴巴，說過如下的話：

「我們前面有三條途徑，只有三條：做一個官僚，掙得錢來增加生活的卑污，這使我厭惡；也許是我不能做……第二條路，是和這卑下奮鬥，這必得是一個

英雄……剩下第三條，是忘却自己，喝酒，游蕩……」

在空氣日益沉悶的環境中，意志比較薄弱的朋友們，也許也會感到自己眼前只有這三條狹窄的苦悶，而感到失措，彷徨，絕望，而自甘暴棄，日夜沉湎於酒色歌舞，就是和喪魂野馬似的選擇了第三條消極的絕路，甚至比這更壞……也隨波逐流，慢慢的與貪污奸宄同化；買賣自己的靈魂，前途，生命……我們應該如何的戒慎恐懼！

的確，托爾斯泰式的懺悔，有時雖則是近於幻想的，可笑的，却始終是那末的真誠，那末的懇切，例如，如果是別人手下寫出來的南德蘭懺悔，也許只會使人感到貴族的虛偽吧，但「復活」中的這一主角却多少有點可愛，使人不自覺的寄與同情，這原因，無非是由於作者自己的真誠：

「我除了我所相信的以外，」他說，「就不能相信別的……我從來不責備人沒有宗教，最壞的是當人說謊時，假裝做信奉宗教……如果上帝假裝愛我們，這比恨我們更壞……」

對當時的俄國自由主義者，他尤致不滿：

「在輿論方面……對於禁止談論的事情，他們就謹守緘默，他們只奉命發表授意的文字；在尼古拉二世治下，他們也是如此。當這年輕的君主一無所知，無恥而且冒天地答覆民衆代表的時候，自由主義者會不會抗議？絕對不！……從種種方面，他們只向這年輕的君主表示卑鄙無恥的諂媚與恭維……」

假借輿論的權威，自由的名義，却無日不在奔走權貴，競事鑽營的人們。比之這位舊俄文豪所描繪的自由主義者們，又能高尚偉大到那里去呢？

托爾斯泰心目中的科學與藝術，科學家與藝術家，却更其可惜可憐，可悲可嘆：

「我們現在所稱為科學和藝術的實在只是一場大騙局，一種大迷信，只是一種我們逃出了教會的古舊迷信以後會墮入的新迷信。……要認清我們所應趨奔的前程，必得從新開始——必得把那使我們覺得溫暖却是遮掩我們視線的「風帽」推開……」

所有的假招牌，假面具，在這樣民族革命戰爭的偉大時代里：還是或隱或現的對在各種市場上面，一味昧着良心的大小販子們，不但在文化界；而且在其他各界的角落里暗中活躍；所以摘掉這些招牌，撕去這些面具——推開這些形形色色的遮風帽，確是我們目前的戰鬥任務！

托爾斯泰的真誠，使他成爲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人；他真誠地愛人，真誠地恨人，真誠地說話，真誠地做事。整整的一生之中，他都和自己的貴族生活，和自己的身世環境，和自己的思想情感鬥爭；而且是那末忠實地表現時代，竟使伊聖奇稱之爲一面反映舊俄社會的鏡子，它的確是照出了一切矛盾和衝突，一切苦痛和黑暗；而且顯示了（雖然是那末微弱那末模糊）未來的理想，光明的前途。就是在他彌留的時候，沙皇的鷹犬們和教會的騙子們重重包圍他，威迫他，勸誘他，要他答應取消以前對教會的攻擊和對統治者們的批評，作一最後的懺悔，結果也遭完全的失敗。

多可愛的老頭！

因執與成見

有一天，我正在看蘇聯的電影小說「一九一八年的伊里奇」，當翻到伊里奇搖着昏厥了的華西里的肩膀，而且吃驚地叫着「上帝啊！這是什麼事啊？」的時候，旁邊站着和我一同閱的一位朋友很不滿意地說：

「怎麼！伊里奇也叫上帝嗎？」

「爲什麼不呢？」我奇怪地反問。

「連你也這麼糊塗，伊里奇是一個最出名的無神論者啊！」

「無神論者就不准叫上帝嗎？小孩子痛苦的時候叫『媽媽』，你不是小孩子，但你在感受痛苦的時候，也會叫『媽媽』，難道你因此就成了小孩子嗎？鄉下人迷信，往往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叫『天』，你並不迷信，可是無可奈何的時候，你也會失聲叫『天』，難道就因此說你是迷信者嗎？……」

「你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他憤然地打斷我的話。

「我的意思不過是說伊里奇的叫『上帝』，也不過是和你叫『媽媽』和『天』同樣，只是自然的，感情的流露罷了，一個人說話，是不會也不能老是先規定一個不移的規則的，到處可以適用的說話公式似乎至今還沒有發現，可不是？」

「不同你詭辯，你這些都是胡說霸道，我相信無神論而兼革命家的伊里奇，就是殺了他的頭也不叫一聲『上帝』的，他不會這麼糊塗，一定是這書作者的捏撰，對伊里奇簡直是個天大的污辱！」

我再沒有和他分辯，因為這是徒勞的。在無言的沉默中，我不覺又聯想到另一次當我正查看『夏伯陽』的時候，也會和他有過激烈却很不愉快的爭論：

「你看，夏伯陽這樣英勇的人也那麼的怕流彈哩！」我掩上書說。

「我不懂你的話。」

我重新翻開書本，指着三百〇二頁上描寫夏伯陽一再躲在草墩背後，不敢一直線蹣跚到村上，却去繞了一個大灣，最後一個回到司令部，給費多爾嘲笑の幾行

把他看，可是他卻搖搖頭，很自信地說：

「不會有這種事，只是作者的造謠，他爲了要顯示自己的勇敢，居然開起夏伯陽的玩笑，捏造故事把夏伯陽壓低聲價。」

看了他那種堅信的神氣；聽了他那種武斷的口氣，我眞的大大地吃了一驚：

「你怎麼能夠這樣肯定的說呢？你難道親眼見過嗎？」

「沒有見過又怎麼？富曼諾夫無論如何是說謊，說謊，說謊，侮辱英雄！」

我絕望地搖着頭，知道和他爭論只是徒勞。更使我覺得驚異的，是像我這位固執機械的朋友一樣的人却竟不少，他們做什麼事都有一定的辦法，對什麼人都有一定的成見，寫什麼文章都有一定的格式，不長也不短，不方也不圓，不肥也不瘦，不輕也不重，缺一點不行，多一劃也不肯。他們和誰談話都是滔滔不絕地那麼一套，談起你所親目經歷過的事變或親自體驗過的心境，彷彿他比你自已還要懂得更多更確實——甚至你在和他談話的時候，他從不願意聽取一句；一方面「嗯嗯」的儘管點頭，一方面却在頭腦里製造公式，指導你的公式。如果這

類乎不美而是一個救亡工作的領導者，那麼正如伊士高所描寫：

「首先，他任何人的話都不肯聽，他只會說教，此外，他又確信他比任何人都精明，這是怎麼樣的領袖啊！」

如果不幸這是一位作家，那末他也逃不出「自八一三」的上海砲聲響徹了全國以後，……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云云的那一個公式。

頑固，成見，公式化，雖則程度上多少有些區別，可是却有相同的血緣，同樣是進步的障礙，是舊社會的遺毒，不能不希望青年同志們共同努力，互相勉勵，拚命來克服和剷除的，否則很危險，因為，這正如我們每個人多少都有點阿Q的精神一樣，我們的身上也不免都帶點這種輕于自信和死守定型的毛病。

介紹「鄧惜華」

——讀書隨記之一——

特萊訖爾夫 (G. Trester) 因為他的名劇「怒吼吧中國」一再在中國各處上演，已經成爲我們最熱識的蘇聯作家之一了。現在我想談談他的「鄧借華」，而且希望翻譯界有人馬上把它譯過來。

這是一本寫中國故事的長篇小說，主人公就是供給作者以題材的四川青年鄧借華。爲着寫這樣一本自傳體的創作，作者整整地化了半年光陰，每天都作數小時以至六小時的談話，而且加以很精密的分析和整理。關於他的創作方法可以參考「我怎樣寫鄧借華的」那篇譯文（見天馬叢書「蘇聯作家的創作經驗」）。這裏我想談的祇是它的內容和意義。

在這二十餘萬字的著作中，作者很技巧地寫出了一國中國知識分子經歷的過程。從他的叔伯寫起，一直寫到他自己的留俄回國爲止，除了很少地方彷彿和一般的事實不大符合，以及最後幾章寫得較爲散漫無力以外，都是相當精彩的。其中所描繪的四川景色，所鋪敘的人情風俗，是那樣的細膩真切，有些地方實在是超過了我們自己的作家。

全書分爲第一第二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敘鄧君的童年，第二部分却是接敘他的青年時期，不過其中當然是有連繫的。鄧君也可以說是典型的奮鬥子弟，他的伯父，叔父，和父親都是屬於知書明禮的士大夫階級。他的父親是個頗覆滿清的革命家，曾留學日本。他一從日本回來，就奉了孫中山先生的命令，從事革命的活動；他組織哥老會，訓練革命的武裝隊伍，時常冒着艱險在自己家裏舉行秘密會議，終於起兵趕走了道員，推翻了滿清在四川的統治。但是辛亥以後雖在表面上由龍旗改成了五色旗，由專制改成了共和，事實上却依舊是軍閥割據，戰亂相尋，袁世凱且承認二十一條，俯躬稱位，出賣中國。投機者紛紛做了大官，成了官僚，幫閒幫忙，行徑無異於舊日的妻妾。因此在這本自傳中當作一個革命者而出現的鄧裕甫——卽惜華父親，又過着監禁，逃亡，避匿的艱苦生活。他的個性是很倔強嚴峻的，對於家務，子女，以及他自己個人的幸福，都絲毫引不起他的興趣，他終生的事業只有革命。雖則他並非鐵石心腸，到後來尤其處處有意無意間流露出溫柔的父愛，可是他的熱情，主要地始終是向着革命方面。就是經過

了那麼多的艱苦和息難以後，他還是絕不動搖和灰心：

「將來你打算做點什麼事呢？」

「像過去做的一樣，」父親笑着回答：「四川的國民黨現在是在地下活動的。人們不時來看我。我並沒有跟外界隔絕，我鼓勵着他們，提醒他們我們決不會長此受着壓迫。我願意能夠會孫先生，因為我已這麼久沒有見到他老人家。但這是困難的：不但我們沒有錢，而且四面都是戰爭呢。」

於是他用那雙比前溫和得多了的眼睛看着我，這時他的鬚髮已經半白了。……」

當我讀到描寫這位老革命家的頑強與堅決之處，往往感動得很深。他不贊成他的兒子研究文學，以爲一個革命家應該學習理化；對於兒子往蘇聯去却是非常高興；因爲他同情於那兒的革命。

鄧惜華在他父親的影響之下成長起來，差不多從他父親回國以後起，他就直接間接的受着革命的薰陶，雖則鄧裕甫對他兒子的教育是不十分關心的。他的個

性也是很堅強，他的伯父對他雖則很親近，年輕時幾乎完全受着他的教育和保護，但這位未來的革命青年却並未受着什麼壞的影響，並不是也跟他的伯父自己一樣的盛天飲酒賦詩，咀咒革命，抱怨革命不但打破了他的科舉夢，而且憑空招來了許多災難。他的家裏時常在黑夜中突然出現「不速之客」，神密的；奇怪的，任何人也不知道他們來自何處，他們到時什麼人都已睡靜，只有報時的更夫還在遠遠地敲着他的銅鑼。從關於這種情形的引在後面的那段敘述中，可以見到鄧惜華是一開始就很注意的：

「……在像這樣的一個客人走了以後，母親就回到臥房裏來。生怕驚醒了我們，她把油燈很輕地放在檯子上面。注意到我是醒着，我的眼睛似乎像兩個問號，她會得向我俯下身來，用她倦了的手指，撫摩着我的蓋被：

「惜華，不要告訴任何人我們家裏來過客人！」

「……………」

每次他的父親和他的同志們開秘密會議，他都不願意走開，很撥俗地聽着？

因此很早他就模糊地懂得革命是什麼一回事，甚至在深夜——在更夫打過了三更以後，這在革命的意義上是早熟的小孩子竟會披衣起床，用着驚奇的眼睛隔窗偷窺那些響着然而鎮定的，在燭光搖曳中討論着國家大事的革命者們。

——他就在這種嚴厲和刺激的空氣中長大起來，中間經過了母親、曖昧的戀愛，父親的一再被逮和續絃，逃亡，出家，訂婚，「五四」的爆發，結婚，到北京求學，這北京大學的俄文系，熱中於克魯泡特金和托爾斯泰，開始向大眾作宣傳政治活動，在旗人中試辦平民教育，他父親的被迫出賣和他的離婚，「中法條約」之簽訂，在馮督辦幕下當俄文翻譯，「五卅」慘案，「三一八」慘案，留俄留俄之階段，終於更認清了應走的道路，像一枚針在井底似的，投入中國革命運動的深淵裏去了，他很痛心地眼看着很多機會主義者出賣革命，但對自己的父親却是始終信仰着的：

「假使有人告訴我我的父親出賣了革命，我一定提不起勇氣來跟他斷絕關係，我會得親自跑去見他，看他是不是真的出賣。」

可見如果他的父親真的出賣了生命，他也曾不得不和他斷絕關係，但他是一
個從小就被教育着變遷勞苦大眾的知識分子，如果以後不更進一步，有此勇氣和
決心與否還是很成問題的。

特察訖訶夫描寫人物的性格，可說是相當成功的，鄧惜華自己和他的父親不
必說，就是他的伯父和叔父，他的母親和繼母，都寫得有聲有色，其中敘述鄧
惜華因為父親所累，不得不逃入寺院做小和尚，以及因為不滿於舊式婚姻，與繼
母老嫗每天鬥氣，終至借着舅子和老婆串同出賣父親的口實，而歡天喜地提出離
婚等幾章，尤有使人讀得不忍釋卷的魅力。

所以，作者所標榜的第一個任務：「將中國人物被鍛鍊成的道德作出一幅細
膩而且嚴謹的圖畫，並且提供典型範疇所依據的材料和事件」，鄧惜華可說是
相當地完成的。雖則後半部等特被為組織（尤其是最後幾章，很像文藝性較重的
新聞記事），但從藝術來看，我們還是有介紹它的必要和意義。

苦夠了沒有

在目前的環境中，要生活過得舒服當然是困難的。只要不是投機操縱的奸商，舞獅營私的貪污，走私漏稅的敗類，凡是同胞很少不在米珠薪桂的生活重壓下喘息，感到切膚的痛苦，亟待解救。

可是，我們究竟苦夠了沒有？

我是認為還離得頗遠的，至少對於一般機關里的公務人員。

在蘇聯革命的時候，外受帝國主義的環攻，內遭一切反革命份子的搗亂，富農們在蔓延全國的飢荒中，却屯積居奇，壟斷操縱，伊里奇稱之為吸血的蜘蛛和吸血鬼，痛恨得切齒；在這樣殘酷的戰爭和無情的飢荒之中，却有一個小女孩向伊里奇和約瑟夫要求糖菓喫：

「娜托莎拉着伊里奇的衣袖。『伊里奇，給我糖菓！』」

「糖果？」依里奇可煩惱了。「可是那裏有糖果啊！」

娜托莎又對約瑟夫說：

「你有沒有？」

約瑟夫給窘住了。

「沒有……真是抱歉得很，沒有……烏拉基米爾。伊里奇，這就可以見得，我們兩個合起來也得不到一顆糖果哩。」

返觀我們自己，却無論怎樣還不致苦到這步田地，客到這個境界，當然，在敵人直接統治的敵後和一些接近淪陷區的勞苦大眾，他們不但更易受到屠戮，壓迫，與奴役；就是日常生活也的確已經到了相當苦的狀況，即在廣東，汕頭，浙江甯波一帶原來相當富裕的區域，也今非昔比，可是，我們却還沒有苦夠，除非能把敵寇即刻趕走和把所有的漢奸即刻肅清！

不但不應該垂頭嘆氣，而且要認清更艱苦的前途，咬著牙齒，立定腳跟，準備苦幹到底，從非人的痛苦中掙扎出一條血路；創造嶄新的幸福的人的生活。現

在，雖則已經抗戰了幾年，但我們公務人員以及一般的薪水生活者，終還能粗衣淡飯，過得日子的多。無須兩個人合股，就一個人也還買得起一顆糖果。至於有些身居高位的公務人員，更還可以化百金喫一頓西餐，終天酒食富遂，歌舞昇平。……愈嚴重，他們的生活愈豪華，積富愈容易，……當然，我這樣說也有一個例外，就是除了一部份的確在出生入死和冒險犯難的英勇戰士。

所以千萬不可隨便說：

「唉！唉！我們真是苦夠了，怎麼生活下去啊！……」

因為，聽到這樣垂頭喪氣的嘆息，誰也會猜想你的下文一定還有：

「還是不再抗戰了吧。」

新談狐說鬼

看完「厲窟」這本戲，我想大家都不免發生誤入「閻羅殿」的感覺，碰來碰

去都是牛鬼蛇神，兇鋒惡魔，那里像個人間世！

可是這豈非惡夢？却是毫釐不爽的現實：偽維持會會長李步雲，偽警察局副局長劉殿元，偽財政局長陳萬興，偽保安隊大隊長潘歧山，偽慰勞隊隊長孫大娘……這些窮兇極惡的流氓，匪徒，這些在白晝公然現形的魔鬼，實實在在是散佈在我國淪陷區的每個角落，的的確確是在所有敵後的頑道殘壁和屍骨枕藉的廢墟上花天酒地，狂歌酣舞；在他們無度的荒淫中，未死的同胞正在輾轉呻吟，槍聲呼號，誰還能充耳無聞！

魔王汪精衛和他屬下的鬼卒們，不久前已經在我們神聖的耶路撒冷建築起大規模的「新都城」，這是在我國境以內的最大魔窟，是普天之下最大的罪惡淵藪，着刀山劍樹的森嚴護衛下，汪精衛隱藏着他的血口和鐵爪，正在不用着賣淫婦的嬌聲和媚態，學着觀音的慈悲口吻，勸誘在他心目中的「愚夫愚婦」進入「和平」的彼岸。可是這三尺黃泉也明眸：他向鹽水實在裏轉轉，他的甘飴實在是鼎鑊，他的糖屎實在是絕境，試問誰情願給活活的打入十八層地獄？誰甘心

永遠不得超渡和翻身？

因此最危險，最要提心吊胆地提防着的，還是隱在我們中間，也許就在我們身邊的一些人。人不鬼不魔，或者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東西，這些東西在衆目昭彰之下，看起來也是滿臉堅毅，聽起來也是滿嘴忠孝，裝起來也是滿身勇敢，可是背地里却是鬼鬼祟祟，陰險險險，叛黨國，賣祖宗，無惡不做。大家一定要更警惕，更留心辨別他們的真假，毫不留情地剝開他們的假面具，同剝香蕉似的從表皮一直剝到內心，務使他們在照妖鏡前藏不了尾巴，躲不了手脚，掩不了猙獰，十足地現儘一個醜惡不堪的原形和本色！

我們不僅要揭發那些表面上裝得人樣的魔鬼，更要肅清一切在暗中做着鬼事的人妖，不但要搗毀那些有形的黑暗地獄，更要剷平一切無形或者變相的陷阱！

感

(一) 被壓抑的與被排擠的

非「湯顯祖的」牡丹亭」，我想最大的社會意義，是在於它婉轉曲折地寫出了在舊禮教的壓迫下，在父母的束縛下，杜麗娘生前既不得不與柳夢梅夢裏偷歡，即死後也不得不在提心帶胆的情景中與柳夢梅半夜幽會，起死回生以後，還是不得不屢遭壓折，受盡痛苦。

在目前的農村裏面，像杜麗娘一樣遭際一樣的命運的女子還是不少，像杜子充一樣頑固執板不近人情的父母，也還是多得不可勝計。

當然，隨着抗戰的巨浪，走出廚房家庭的婦女已經成爲一種不可侮的力量，她們的人數和英勇的事蹟都在一天天增加；但另一方面，我們却看到大批婦女在工作上被忽視，在職業上被排擠，在行動上被限制，在人格上被侮辱，在婚姻上被壓迫的開倒車的現象，就是現在已有工作崗位的，因爲一些守舊份子老早想以對男女關係的造謠污蔑，來作反對女子參加抗戰的藉口和遁辭，使婦女於去了一村枷鎖以後，又戴上另一付枷鎖，去了一重桎梏以後，又加上另一重桎梏，呻吟

聯息，無有已時，這實在是太不幸。

所以，婦女們在參加抗戰的一般工作以外，還得時刻不忘自己的解放，爭取爲人的條件。誰要是不注意自己的特殊使命，負起自己的雙重任務，那末，雖然時代環境有所不同，程度形式所差異，但還是在免不了重覆杜麗娘式的命運。

(二) 遺忘了的言語

據說鸚鵡原是一隻天堂鳥，但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竟被逐出了天堂，有一句神祕的話，如果它能記得起，就可以重回天堂，然而不願它重記得一乾二淨，離則它天天嘗試，再把它記起，可是卻終於證明只是徒勞。

鸚鵡詩太原是多情，詩人的生活原是美麗的，在戰國，他們都踴躍在詩歌的寶座上，深深閉在象牙的殿堂裏，再是無情的戰爭，殘酷的流血，却早把我們高貴的歌，手從天堂中掃了下來，這在他們看來無疑的是天大的不幸。

因此，我們的一部份詩人，也如被驅逐出天堂的鸚鵡一樣，也不斷地想恢復過

去的那種生活，總好像有一樣浪漫一樣幸福一樣快樂地吟詠，想沉溺在已往那種夢似的环境裏，也是終於像可憐的鴉鵝一樣，却證明只是無益的徒勞。

當然，大部分一生下來就在人間翻飛和秒速出天堂以爲就愛上了大地空氣的鴉鵝，却已經見慣了煙火，聞慣了血腥，而變成了真正存變成勇猛如火的大鷲和蒼鷹，在敵人圍攻中展開如雲的雙翅，高唱着戰鬥的自由之歌。

談戰地戲劇

戰地戲劇不但在宣傳上有很大的作用，即在藝術戲劇的開展上，也有不可忽視的價值；戰地工作的豐富經驗，軍隊和民間的考察，對於戰地戰鬥的親身參加，無窮的都可以大量地充實戲劇的內容，給新的戲劇藝術開闢了一個是廣大的天地。

中國藝術——連文學在內，最主要的一個毛病，就是內容的貧乏，所謂不通

俗化，不中國化，不戰鬥化，太公式，太抽象，太機械這些缺點，大部份是由於內容貧乏，很多參加戲劇的人沒有寫作，專門寫作的人又往往借助於天花板和空虛的頭腦，這一種脫節的現象，雖然抗戰已來過了幾年，却依然還是嚴重的存在着。

爲了全面展開戲劇運動，爲了整個的推廣戲劇藝術，取材自然是愈多方面愈好，我以為不但要寫前綫，也要寫後方，要寫新的，也要寫舊的，不但要寫戰壕和砲火流血和肉搏，衝鋒和陷阱，也要寫貪污和舞弊，走私和漏稅，強迫和箝制，黑暗和倒退，荒淫和無恥，不但要寫戰士和戰鬥兵，也要寫老爺和太太，公子和小姐，我們要寫抗戰營壘中的每一現象，要注意到每一個角落，揭露每一個陰私，我們要在戲本上和舞台上暴露實現，表現現實，我們不但叫讀者 and 觀衆認識，而且要推動他們起來改造，爭取各方面的進步。

關於這一些材料，在戰地真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可是因爲一些客觀上的困難，的障礙，因爲主觀上把握現實和再現實的能力還太缺乏，或者是由於流

動太多和沒有時間，在戰地的戲劇工作者，至今確還沒有寫出很有分量的，很適合戰地上演的劇本，對於戰地的演劇和教訓也還沒有很好的整理，戰地演劇應備的特別技巧，也似乎沒有盡可能的研究和介紹，因此有些在戰地甚至在接近火線的地方工作的戲劇團隊，至今還是儘向後方要劇本，要技術人材，要導演幹部，這實在是一個頗大的缺憾。

這就不免發生一個比較嚴重的結果，就是後方有些戲劇專家大大地不滿前方戲劇工作者，說這些藝術學徒太不行，太不長進，太不努力，甚至根本懷疑和輕視戰地戲劇工作，以爲做來做去還是那麼一套；同時少數不大堅定的戲劇工作者，也不免動搖和苦悶，以爲要在戲劇方面有所造就非到大都市住着參加什麼戲劇研究會，訓練班，或者和戲劇專家整天的混在一起不可，他們大喊戰地演劇工作的平庸和單調，瑣碎，渺小，要求呼吸更高的空氣，要求更深刻的埋頭研究技巧，要求更大規模的演劇，也可以說，要求更好的出路。當然我不反對專門化，我不忽視技巧的重要，實在我們最重視這些，可是我只承認戰地工作者在理論的研

覽上，技巧的講求上，劇本的創作上，在這一戲劇部門特殊經驗的發揮上，尤其是現實的認識和把握上，還是十二分不夠，還不夠深刻，不夠緊張，但從此卻斷然不能得出結論說：戰地戲劇已經不重要或者因此要改弦換轍，重起爐灶，都恰相反，我們更要集中力量來加強這一工作。

戰地工作的藝術源泉，實在是從不會枯竭的，問題只是在我們如何動員更多的人，培植更多的人來掘發這一寶藏。現在有很多讀者和觀眾（尤其是後方的）已經漸漸的厭着戰爭劇本了，他們說看來看去反正是差不多的材料，可是這不是戰爭劇本（尤其是範圍較廣的戰地劇本）已經再沒有新鮮的材料，而是作者沒有更靈敏的接觸現實，接近羣衆，去發現和搜集新鮮的材料，大部份都是一知半解隔靴搔癢的皮毛東西。夏伯陽有一段寫戰地劇團的話，我以為很值得我們參考：

……她有一次跑到火線上，那一旅人正在進攻，而跟這旅行劇團駐在相接近的一隊人也正在開拔前進，於是全班演員不由分說，只留一個人在每一部車輪上看守，大家掀起了來福槍，跟兵士們一同前進了——安娜·尼基塔奇娜是一巡

騎馬的，她就騎着去找師中的黨委，及至十分鐘之後，她、黨委、跟其他的一千把人，就出發去偵察工作了，那是一個驚人的時代，演員，組織者，政治工作者，宣傳家和煽動家，黨委——所有這一切的職務都混合成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戰士，而且紅軍戰士又特別喜愛師里的一班演員，因為他們覺得這班人是他們的同志——像他們自己一樣的戰士，跟他們一選在一起的，在必要的時候，也會跟他們一同去進攻……」

戰地戲劇工作者是藝術家，也是戰鬥員，都是像安娜·尼基帖啓娜一樣的勇士，是值得大家尊敬的，是有光明的前途的。我們應該人人有這種信心，不但是戰地戲劇工作者自己，還有這種自信。本來純粹的藝術是沒有的，最有羣衆性的戲劇活動更是如此；不論它的影響是大是小，作用是直接還是間接，總是和政治任務相配合，相一致。如果翻一翻中外歷史和文學典籍，那麼更可發現凡是愛好藝術和文學的人，都是熱愛其國家民族的戰士，普式庚曾經很熱情的說過：「我，當然，從頭到腳都是保護我的祖國的一切……無疑地都惹起了對於祖國的關心。」

對祖國的熱愛……」在幾年來的抗戰過程中，不論是藝術家，是藝術學徒，都已最顯著的、最熱烈的、最誠的、最勇敢的表示了自己對於祖國的愛情，創造了藝術的新生命，展開了藝術活動的新天地，顯示了藝術創造的偉大的前景。而在這些藝術戰士中，戲劇工作者總是站在最前哨的。

因此，一方面爲了增加對國家民族的貢獻，更密切地配合政治的任務，在藝術活動的領域來積極推動抗戰建國，另一方面也是爲了促進戲劇工作的更大開展，我想我們還得更深入戰地，更深刻而且多方面地觀察，分析，研究，體驗戰地生活，換句話說，也就是更應透澈地理解我們的祖國。

半風月談之一

不論古今中外，所謂土等人一向是輕視下等人的，從不把他們放在眼里，一開口，總是罵之爲「豬」，爲「狗」，爲「牛」，爲「馬」，爲「賤骨頭」，爲

「賊胚子」……驚之不夠，則拳足交加；痛施鞭撻，如果還不痛快，則更可腳鏢手鐐，擲之繩纜，把他慢慢的凌遲處死，而美其名曰維持秩序，安定社會。

可是一到秩序正真混亂，社稷真正頻於毀滅的緊急關頭，所謂上等人也者總是首先張惶，首先逃竄，首先「另覓生路」，而素被輕視與虐待的下等人，卻往往於危難時見其風骨，不貪生，不怕死，不搖尾拜受新銜，不覲顏侍奉新主，其凜然的正氣，往往長存於天地之間：人家如果看過「長生殿」的，總不禁感歎雷海清的「罵賊」，高漸離的「擊筑」；看過「桃花扇」的，總不禁歎羨蘇崑生的胆識，柳敬亭的義勇，而於明皇之荒淫，貴妃之縱佚，國忠之專橫，祿山之跋扈，力士之狡獪，弘光之昏庸，大賊之無恥，士英之奸佞，文廳之勢利，朝宗之懦弱，卻無不感到可恥可恨可憐可嘆可殺，尤其是那自稱名流，其實是最無人格的阮鬍子。

這阮鬍子會逢迎，會專權，會收買，會挑撥，會陰謀，會獻計，會摧殘忠良，會歷殺文運，在平日高官厚祿，享盡榮貴，在亂時更會卑躬屈膝，開門迎

敵

大賊：（向王英其語）北兵一到，還要迎敵嗎？

王英：不迎敵，還有何法？

大賊：只有兩法，（對王英其語）

王英：請教！

大賊：（作擲衣）跑！（又作跪地）降！

天下無恥的事，實在無過於此了，而這狗彘不食，豬犬不如的阮大賊，卻也自命爲士流，也列名彖，也是一上等人，他的「燕子箋」，直到如今還有人爲之入迷，其風流厚顏，和目前的叛逆權術，倒是可以先後輝映，互相媲美的。

三年來，尤其可以證明天下等人的忠烈，王英，堅決，強毅，不論是在農，在兵，都是確確實實的在前線敵後粉身碎骨，爲國家族盡忠盡孝，雖則他們大多數也是素被視爲愚賤果賤。

一個建立新的國家和社會，這真正是需要這些「賤骨頭」的，他們才是真正的英雄。

，真正的主臥臨陣，已經守新的覺悟和勇氣，試再向個人來表示愚忠，而且現在究竟不是唐朝和明朝的天下，要想在這空前偉大的浪潮中，利用「下等人」的虛弱來替自己建築名利的殿堂，而又忘恩負義的反過來加以奴役，剝奪他們的自由和生命，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嗎？

不要拋掉「資本」

在三年來中，先生曾經講過一個故事：一個香港苦力得了呂宋彩票的頭彩，歡喜過頭，竟把收贖彩票的竹槓投入海中，因此不但空歡喜一場，連本來藉以謀生的工具也丟掉了。這是大家都曉得的一個故事，也是大家所樂舉的一個例子。

在三年來每次戰鬥勝利的時候，我們總可以見到一些喜氣沖天得意忘形的英雄，共是二味的臨難退縮，歡呼歌頌，觥籌交加，彈冠相慶，終日只忙於開會慶祝，遊行喝采，而絕不想想沒有以往的犧牲，絕不會有目前的勝利，沒有繼續不

斷的奮鬥，更不能有最後的成功，因此萬事廢弛，反而給敵人以可乘之機——這可不是很像那一個苦力？

這次痛痛敵人撤退，我軍乘勢收復，一方面表示敵人的乏而疲，我們的堅和專，另一方面更可證明我們抗戰之必勝，意義重大是不必說的，值得高興和慶祝，更是不必說的。但我們千萬不可因此就放心大胆，高枕無憂，而鬆懈了鞏固團結和堅持抗戰的決心，因為這些就是我們勝利的「資本」，放棄了這些「資本」就等於那個苦力的拋掉竹槓，終於不免在莫明其妙的狂喜中斷送生命的。

而事實上，的確還有這樣一部份容易給勝利沖昏頭腦的人，只注意形式，只看重表面，只知道鋪張，只高興熱鬧，今天慶祝南甯收復，明天盼望廣州大捷，後天期待南昌凱旋，甚至勾結武漢，杭州，上海，南京……的敵人都會馬上自動撤退，我們軍隊也立刻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於是全國歡騰，舉世歌頌，而丟棄也從此太平大吉。

這樣一相情願的自我陶醉，實在是不折不扣地上了敵人的大當，中了敵人的

審計；我們應謹防受騙，牢牢記住「聞勝勿驕」的訓示，認定敵人於加緊南進聲中一定會打算另換花樣來製造「結束中國事件」的新的陰謀，驅除任何有害的幻惑，而更加嚴肅刻苦地努力奮鬥，準備全國的反攻。不然，即使敵人真的整個放棄華中和華南，也不過是「欲擒故縱」的圈套罷了，它那里甘心放鬆一步，立地放下屠刀呢？

關於士兵文藝

(一)

在不久以前，我們的一個勤務兵死了。他是死於無常識——因為電燈不亮，他竟用手指去擦燈插，以致觸電而死——是死於忠于職務，是死於愚昧與忠厚。因愚昧而死，使人惋惜，因忠誠而死，更引起人的敬佩，感激，與遺憾。同志們對於這位只有十九歲，天真活潑的勤務同志王文森之死，有的吞聲飲泣，有的甚

至慟洵大哭。我們不但替他開追悼會，親自抬着棺材送他上柩山安葬，募款捐助給他的家屬，而且還借一個日報的「戰時藝術」出特刊，這引起了勤務同志們的大大的興奮：「還要登報呢，真不得了！」於是他們熱情地寫作，有的寫「王文森小傳」，有的寫紀念「王文森同志」，有的寫「一個同志的死和我自己的悲痛」，他們日夜不安的盼望着報紙出版，搶着買報，但是當他們看到他們的文章只登出一篇的時候，他們又是何等的失望，疑惑，驚異啊！……從這件事實，就可以看出我們提倡和創作士兵文藝，決不應只着眼在戰鬥兵的身上，而應顧到那些卑微的，打雜的勤務，公役，伙子，同樣的鼓勵和教育他們，了解他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傾聽他們的意見，描寫他們的痛苦，愉快，悲憤和興奮，雕塑他們的活生生的形象。我們天天聽到說要尊敬每個參加抗戰的人，要提高每個參加抗戰者的地位，可是，事實上，却還有許多人被輕視，被摧殘，被壓迫。在軍隊里，一般戰鬥兵的地位已經相當提高了，可是勤務兵，馬夫，伙伙之類却還是被看做不重要或低能的「下賤份子」，甚或仍被看做以任一樣的僕役，因此也造成

了這些人自暴自棄的心理。其實這些人難道不是一樣的在做救國工作嗎？難道不是一樣的離鄉別井，出來爲國服務嗎？只要有適當的教育和機會，他們難道不會一樣顯示出無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做出驚天動地可歌可泣的「偉業」來嗎？記得陳誠先生說過，政工人員應該有伏伏一樣的勤勞，的確，如果大家都能像伏伏一樣的早起遲睡，從早忙到晚，如果大家都有這種刻苦耐勞和忠誠服務的精神，中國難道會亡嗎？……所以，我們文藝工作者應該替這些被埋沒了的人工作，應該把他們的優點和美德表揚給全國人看，喚起各部隊，各機關，各工作團隊的注意，要大家名副其實的尊敬公役，伏伏，馬伏和一切雜兵，我們自己更不應該只注意戰鬥兵，只寫「火藥氣」，而忽視了這批在埋頭苦幹的，沒沒無聞的人們，我們應該盡量從他們身上吸取創作的源泉！

(二)

士兵是大衆的一部份，他們所寫的東西，照理說起來應該極其通俗化的，可是事實上却不盡然，往往有些士兵愛寫似通非通的文言，或者即使是白話，也

是相當難解的作品；其中所有的內容與表現的手法 and 技巧，也都是「小資產階級性」的，並不能真正傳達他們自己的感情和思想，真正再現他們自己的生活經驗。

所以有這種類似矛盾的現象，原因是由於：一，士兵的成份非常複雜，但以從農民出身的爲多，他們的生活和社會性質，入伍以後當然有所改變，也許是巨大的變化，可是就是士兵本身也還是逃不了小資產階級性的限制；二，士兵的文化水準很低，即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也創造不出一種適合於這種內容的形式；三，漢字本身的缺點使得徹底的大衆化成爲不可能；四，應用機會的缺乏，封建思想的束縛，使士兵不敢或不能大胆的創造和採用新的通俗形式，使得他們只能採用章回小說（軍隊中至今還是流行着七俠五義、蕩寇志、包公傳、三國演義、水滸等舊小說）和現在新文藝的形式。

要補救這些缺點，使士兵所創作的東西成爲真正的大衆文藝，真正通俗化，至少應該：一，要使士兵從封建思想和日常生活的瑣碎感情中解放出來，積極培養他們的創造性；二，不但要鼓勵士兵寫作，很細心的替他們修改，尤其重要的

，是要指示他們以寫作的途徑和寫作的方法；三，文化人缺少的是實際的生活經驗，但士兵們缺少的剛剛相反，正是文化人最豐富的想像力，這應該設法好好的加以培養；四，應徹底了解士兵的生活，思想和感情，學習他們特有的口語如「吉打吉打」（流行于第四軍官兵中間，意為管他媽），打牙祭（加菜之意），打爹頭（揩油）打衝鋒（搶菜）等等，他們複雜的方言（據應彬同志統計，一連一百多人中即有十二省的籍貫）也應該用心學習；五，應多創作一些根據士兵心理，為他們所樂見喜聞的通俗讀物；六，最基本的當然是應該加強識字教育。

現在連隊的政治工作還沒有普遍的建立，還只很少的部隊中有指導員，但單有指導員一個人，要他用全部的精神來教士兵識字，鼓勵士兵寫作，也還是很困難的，最好能多設一個專作這一類工作的人。現在士兵中間確有不少的天才，只要在思想方面，在語文的統一方面，在文字技巧的培養方面，能有一個負責的人替他們設法，替他們解決，積極的幫助和指導他們，使他們對通俗化運動有自覺的認識，有自動的熱忱，那末士兵們能夠創造很優秀的「士兵文藝」，真正的

大衆文藝，是不成問題的。

堅韌的戰鬥

魯迅先生和青年是分不開的，和文化是分不開的，和革命也是分不開的。他的偉大就在不妥協，不屈服，不含糊，不苟且，不中途變節，不隨波逐浪，不阿諛權貴，不賣身求榮；就在他的猛鷲和深刻，堅韌和澈底，謹嚴和忠誠。

對於這一位「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的偉大作家，對於這一位勇敢的戰士，形式的紀念是多餘的，甚至是愚蠢的，我們應該來學習他的精神，完成他的遺志！

魯迅先生的全部生活，都是配合着革命運動，他的作品深刻的反映出了我國的各個革命的階段。從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慘案，北伐，一直到新的民族革命運動的成長，魯迅先生一直和根深蒂固的黑暗勢力搏鬥，他主張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主張毫不留情毫不讓步的制敵人于死地，『對於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又說：『在文藝戰綫上的，還要韌』。可見魯迅的歷時愈久，戰鬥力愈強，始終不懈的一直支持到底，決不是僥倖或者偶然。

人人都知道魯迅先生是很愛護青年的，不論是在他當教授的時候，或者在他專門寫作的時候，他都和青年站在一起。不論是怎樣不熟悉的青年，只要是誠心的去請教他，他無有不竭誠幫助，竭誠教導，有他自己的師長和父兄。在他的教育和影響之下造就出來的人才，不知有多少。他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這人肉的花宴現在還排着，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青年的使命！』因為他把最大的期望和熱情貫注在青年們身上，所以變成了青年的吸鐵石，走到隨便那里都有一羣純潔的青年，熱烈地包圍着他。

可是，魯迅先生也很知道青年們的缺點，他從不虛偽，因此對於青年們的缺點和弱點也往往加以指謫，加以批評，尤其是對於少數沒有氣節的青年：『今之

青年，似乎比我們青年時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爲了一點小利，而反噬構陷，真有大出於意料之外者，歷來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難盡，但我總如野獸一樣，受了傷，就回頭走入艸莽，拭掉血迹，至多也不過呻吟幾聲的。『的確，在險惡的還境當中，有些立場不堅，意志薄弱的青年，往往對先生構陷侮蔑，做出昧天良的事。可是他並不灰心，他曾說：『我不能因爲一個人做了賊，就疑心一切的人。』又說：『中國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祕不發表。』因此他一生始終是愛護着青年，領導着青年。他自己喫進去的是艸，可是他吐出來的却是鮮乳，却是鮮血，他就用這鮮血和鮮乳，慈母般來哺養他的後一代，來培植我們青年。他曾以最堅決同時最剴切的口吻勸告和鼓勵青年：『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黯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他告訴我們『革命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麼浪漫』，他告訴我們要從荊棘的地方開闢道路，告訴我們要直面滲澹的人

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告訴我們只有在鬥爭的過程中才可以充實自己的力量，舉一切有效的戰術，告訴我們不要苟活，不可奢侈，不可放縱，總而言之，他是一個青年的導師，他一生最大的快樂就是千方百計地培植「大羣的新的戰士」，「因為現在人手實在太少了。」他在很早的時候，就會以進化論的觀點來說明重視青年的必要，他以為「老的」和「舊的」應該讓「新的」和「少的」從用「死」填平的深淵上歡天喜地的走去，跨過「老」「舊」的屍身邁向光明的進步的前途！

以同樣的熱情和同樣的真摯，魯迅先生愛着自己的祖國。他學醫是因為看到日本維新與醫學的密切關係，函想由醫學入手，救治害着重症沉痾的垂危的祖國，他學文藝是爲了喚醒沉睡的老大民族，他愛護青年也是爲了挽救祖國的危亡，爲了發揚幾千年來的文化，爲了祖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共同的幸福。可是，他「冷酷」地評擊舊制度，舊社會，評擊吃人的禮教，反對提倡國粹的復古運動，憎恨和蔑視一無足取的誇大狂者。對於封建餘孽，他逼肖地替他們畫了各種各樣的臉譜，一絲不掛地暴露了他們那猙獰的面目，顯現了他們那醜惡的原形，因爲

他是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爲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他那潑辣，生動，遒勁，一針見血的筆鋒，的確是可以橫掃千軍的。

魯迅先生遺留給我們最豐富的遺產，遺留給我們最好的小說，最好的雜文，最好的小品，最好的翻譯，最好的輯佚，尤其是阿Q，從這一個我民族性的典型上，可以看出魯迅先生的「愛」與「憎」的交織，可以看出他的觀察是如何深刻，他的解剖是如何透澈，他的嘲笑是如何辛辣！不但他的創作如「吶喊」「彷徨」，他的雜文如「華風月談」，「南腔北調集」，「二心集」，「三閒集」，「偽自由書」，「花邊文藝」，「且介亭雜文集」，他的翻譯如「解放了的唐吉訶德」，「鍊」，「死魂靈」，「毀滅」，他的輯佚如「替康集」，「中國小說史略」，「唐宋傳奇集」，「後漢書」，「古小說鈞沉」，「小說叢刊鈔」等，都不知消耗了他若干精力，多少心血！單只一部「替康集」就校錄不下五六次，至死還不肯問世，這種治學的嚴謹和奮鬥的艱辛，是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的，我們應該仿效魯迅先生這種「廢寢忘食，銳意窮搜」的精神！

總則魯迅先生沒有親自參加這兩年來的民族革命戰爭，但他早就指出中國的一些敗類是「有背于爲人的道德，」早已指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力量都歡迎的。」「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他號召青年作家廣泛地描寫生活和鬥爭的各部門，嚴厲地指謫公式主義和尾巴主義，指謫過於狹窄和膚淺的批評；但同時他却又極力主張文藝的真實性和社會性，反對無力的空洞的叫喊，反對「爲藝術而藝術」的主張，在他看來，空疏的文藝作品是決不能成爲有力的鬥爭武器的。

還有一點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魯迅先生確是實幹苦幹的一個作家。他曾說：「關在屋子里，最容易說澈底的主義，然而也容易「右傾」」，又說：「現在的青年主要的是「行」，不是「言」，」可見他是如何注重實踐！例如他的扶助出版界，他的倡導木刻和提拔青年作家，都是以身教而不是光以言教的，他說：「青年多幾個像我一樣做的，中國就好得多，不是這樣了。」又說：「在唯利

是國的社會里，多幾個呆子是好的。」可是，魯迅先生並不是「呆子」，却實在是更可親的青年導師，他的忠誠服務實可比之耶穌之爲門徒洗腳和佛陀之代入地獄。

在紀念魯迅先生三週忌的今天，恰是我們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快轉入相持階段的緊要關頭，兩年來千百萬同胞以自己的血肉頭顱換來了若干進步，促進了全國的統一和團結，堅持着艱難困苦的抗戰，可是照目前的情形看來，不論從團結的程度，或從各方面的進步說都是萬分不夠的，目前抗戰正在走着「一條迂迴曲折艱險萬狀的路」。魯迅先生說的對：「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他之所以勸大家要韌，勸大家不可莽撞的「赤膊上陣」，「一敗就意氣消沉，更不可笑的太早，無條件的樂觀，是有特別的意義的。在這反守爲攻和轉敗爲勝的嚴重時機，在國際情勢變動萬千的時候，一般青年同志往往又會很容易陷入苦悶的泥潭，不能自拔，如果要克服苦悶，消滅苦悶，不爲苦悶所埋葬，那末，我們

更應學習魯迅先生的堅韌的戰鬥精神！

無可比擬的損失

在偉大的作家高爾基死後不久，我們又接連地失去了魯迅先生，這種損失的鉅大，真是無可比擬的。尤其是魯迅先生的逝世，這對於我們，簡直可以說是「如喪考妣」，我想誰也不能用簡單的言詞表示出自己的哀悼。

很多的報紙上，都登載着魯迅先生的亡故，是左翼文壇的一個損失，因為他是中國左翼文壇的一顆巨星。可是這是偏狹的，不完全的解說。究竟誰能否認魯迅先生不但是最大的左翼作家，而且是最偉大的中國作家，不但是最大的中國作家，而且是最偉大的中國文化人，不但是最偉大的中國文化人，而且是最偉大的中國人之一。他是屬於全中國的，並不限於文化界，更不限於小小的一個文藝部門——左翼文壇。凡是中國人，對於魯迅先生的死，都輪得到他的一份悲哀。

的確，魯迅先生是中國的偉人之一，他是一個能夠真正代表 國國民性的典
型。他刻苦了一生，彷徨了一生，吶喊了一生，戰鬥了一生，從十二歲的幼年
起，他便經歷着艱難無比的生活，體味着辛酸苦辣的滋味，而他就在那種坎坷顛沛
的過程中教養自己，鍛鍊自己，使自已成爲一個發揚民族優點，暴露和攻擊民族
缺點的戰鬥員，一個始終不屈不撓地，在文化界工作的民族英雄。

高爾基在蘇聯，他的偉大決不單單因爲他是一個卓越的文人，不單單因爲他
留下很多的傑作，而是因爲他也是和伊里奇約瑟夫並駕馳驅的，最偉大的革命
英雄之一。這在蘇聯領袖莫洛托夫以及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和紀德等等的演詞中或
哀悼文中，都可明白地看到。同樣地，魯迅先生所以寫作，所以和一切艱苦奮鬥
底目的，決計不是如一般時下的大小作家似的，只是想造成自己的地位，想使自
己留芳於後世。他一貫的精神，就是在爲中國同胞謀幸福，他一生的努力，也就
是爲的實現他所堅決抱定的主張。他留學日本，所以學醫的緣故，一方面固然是
因爲他的父親之死深深地刺激着他，一方面却特別是因爲他知道了日本維新是

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他想用醫學來救不幸的中國人，來救快要滅亡了的中國。

「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

這個醫藥救國的美夢，雖則因為自己的考試成績被曲解以及戰事畫片的刺激，毫不留情地粉碎了，可是他並不灰心，依然以滿腔的熱情，來繼續的奮鬥：

「……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從此一直到他生前最後的一刻，魯迅先生都是一直在文藝領域內鑽而不捨地勞動着，同時也是一直在為中華民族的解放絕不妥協地奮鬥着。他曾經籌劃出版雜誌「新生」，直接間接地參與各種反滿的革命運動；他不斷地奔走，呼籲，吃苦，受難，被迫，逃亡，無非想發已被悠久的傳統所腐蝕了的國民精神，無非想激勵已被萬惡的專制政體所束縛着的奴隸們起來反抗敵人，拯救自己。在他飽經

憂患的三十年間，以他個人的遭遇說。（例如怕蔣浙督的毒手而逃南京，因反對北洋軍閥和它御用的教育總長而離北京，在廈門大學的橫受毀謗和排擠，在「革命策源地」所受的患難和困苦，在五個青年作家被殺時的攜妻挈子倉皇出逃，以及以後所受的一切壓迫摧殘……）完全是一首英雄奮鬥的史詩；以他所經歷的時代而言，也是一個最偉大的可歌可泣的時代，國內的從推翻帝制，五四，五卅，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的大革命，一直到最近的民族存亡的最後關頭；國外的從世界大戰，蘇聯革命，意德的法西斯登台，一直到最近的和平與戰爭的最後關頭……）在這黑暗和光明激烈地鬥爭着的歷史舞台上，如果更評價得具體和公正一點，魯迅先生實在不但是中國的偉人，而且也是世界的偉人，因為他攻擊的舊社會和舊制度，他所揭穿的卑劣、懦弱、無恥、虛偽而又殘酷的劊子手和奴才們的假面具，無疑地是有助於中國的解放，進步，壯大，同時也有利於世界的和平和繁榮。這在他「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真正友人，以至於戰士」以後的努力中，尤其可以看出他的偉大不但是

民族性的，而且是國際性的。他是中國勞苦大眾以及一切愛國民衆的代表，也是全世界一切被侵略民族和被壓迫民衆的摯友，他一方面憎惡和痛恨人吃人的組織和虛偽的秩序，一方面却以最大的熱情愛護和援助新思想和新運動，他是今明之世的巨人，是露空中的一顆特別耀目的明星！

如今這顆巨星已是殞落了；這位中國新文學運動之父，這位最富於戰鬥性的中國人，除了滬西郊外萬國公墓中的一撮黃土以外，在這血腥的世界，已經不剩下一點痕迹。可是魯迅先生的精神和他的幾十種著作，將永遠的被繼承，永遠的被傳誦，我們以及我們的後代，將永遠的記到他，學習他，誰能說魯迅先生不是永遠活着？在他偉大而且艱苦的戰鬥過程中，魯迅先生無疑地犯了許多錯誤，可是他的錯誤也是出於赤誠和真摯的願望，是由於迫切的不容或緩的要求。高爾基和巴比塞都走過錯路和枉路，可是誰能否認他們的偉大的完整？魯迅先生一生都不忘文化，都不忘工作；即在彌留前也還記到本刻，記到新文字，記到大小未完的學業，直到最近還有人看到他所整理和出版的『海上述林』裏句話說，直到最

後他還在爲着人類的前途奮鬥着。法國前進作家安得烈·馬洛(André Malraux)曾經說過很深刻的一段話：「當有人告訴我們『我愛民衆』的時候，我們笑他而且是笑得對的。但在伊里奇死後，克魯柏師喀雅說：『伊里奇愛護民衆，』這些字眼就有一種全然不同的意義了，因爲已有伊里奇的一生。」這讚詞也可以移贈給魯迅先生，因爲他的輝煌的一生，鐵一般的證實了他的堅貞和偉大，千千萬萬的羣衆的崇拜決不是偶然的。

如果就在伊里奇死後，高爾基的死是個蘇聯的最大的哀痛，那末在孫中山先生死後，魯迅先生的棄世，在中國無疑的也可說是最大的損失——這決不是一些小報評論所侮蔑似的「捧場」或「過譽」。那些他在歷年戰鬥和劇烈轉變中所得的可寶貴的經驗，他在筆端流露出來的經過精鍊和融化的教訓，在這日本帝國主義者日益加緊進攻，民族生命已經不絕如續的今日，對於不願當亡國奴的我們，尤其值得學習和發揚光大。我們應該學習他的戰鬥精神，訓練自己的能耐，我們應該宣揚他的現實主義，反對無補實際的空談，我們更應該保持他那始終如一的

節操，決不因了私人的名利而出賣投降，背國叛民，更具體地說，我們應該犧牲一切來從事救亡工作，來建立更廣大更鞏固的聯合戰線，和章乃器先生所說似的，來展開一個大規模的全民族的魯迅運動！

否則，紀念和哀悼魯迅先生直是污辱了魯迅先生……

自由說話和自由寫作

在魯迅先生的一生中，戰鬥的方向固然不止一個，可是最主要的一面，還是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爭取，在北京的時候，他和一些封建軍閥鬥，和一些賣身求榮的無聊政客鬥；在上海的時候，他和一些賣辦官僚鬥，和一些混迹洋場的流氓惡少鬥；在廈門的時候，他和一些封建勢力鬥，和一些抱殘守缺的孤臣孽子鬥；就是在廣州的時候，他也不免和一些假的革命份子鬥，和一些得意忘形的當權新貴鬥。……

因爲魯迅先生不避斧鉞，不辭勞瘁，從幼少一直到臨終，都是爲自由說話和自由寫作而奮鬥，所以一些愛好自由的人——尤其是青年，都像鋼鐵似的被他所吸引，重新結，新教育，而那些成天想愚民防民害民的人，却就終生都把先生看成洪水猛獸，恨不得把他剿滅。

現在正是抗戰建國的時代，正須要人民大眾有知識，有胆量，在有利于國家民族的大前提下，有能力自由在文字上和口頭上發表意見，貢獻給賢明的政府採納；所謂集思廣益，團結人心的正確解釋，就是如此。可是目前仍然有少數人想防民之口，想限制輿論，我想不是沒有用心，也是愚昧和狂妄。

記得不久前，英國想組織「靜漢艦隊」，鎮壓民間議論，嚴厲箝制，可是結果唐寧街的總士們不得不屢次失敗，另想妙法，可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這句古話，是最正確的。但這是英國，是正在爲少數人利益驅使大眾進行帝國主義混戰的國家，正和我們的敵國相差不多，「命里註定」它不得不和英美對立，但我們却正在抵抗侵略，保衛和平正義，除了少數喪心病狂的漢奸敗類以外，四萬萬

五千萬人確是一條心的親愛團結，難道可以和老大的英國相提並論嗎？

所以，爲着真心的紀念魯迅先生，爲着開展新文化，同時也是爲着整個民族國家的利益，我誠懇希望賢明的政府當局，能給民衆以言論和出版自由——如果沒有這些起碼的自由，那麼集會結社的自由和四權的實行都會落空，憲政也無法實施；尤其希望在文化界工作的同志們，能夠不忘魯迅先生一生奮鬥的勞績，繼承他的遺志，努力到底！

創造新的典型

「對於人，最高的存在就是人自己，因此：使得人成爲屈服的，奴隸化的，被侮辱的一切關係，一切條件，都必須消滅。」

這一段話對於現階段文藝的工作者有極大的意義。因爲我認爲目前文藝以至整個文化工作的中心任務，就是在發揚民主精神，提高人的地位，改善人與人的

關係。

在過去，人與人的關係是很不公平的，很多人被埋沒在地下，在被迫過着陰慘的非人的生活。這些人，只感到自己前途的黑黯，只感到自己的渺小與可憐，對於周圍所發生的一切，他們是漠然無動於中的，「走肉行屍」，他們的確可以說是已被壓榨得失了靈魂。

自從抗戰開始了以後，人與人的關係逐漸改善了，對於人的觀點也逐漸糾正過來了，一些生活在地下的人：農民，士兵，工人，小職員，甚至妓女，都逐漸在抗戰中顯示出他們的力量，他們的熱情感動了一些本來倨傲地目空一切的人們。在前方，本來是卑微的人們也積極地參加了偵察，警戒，運輸，嚮導，慰勞的工作，他們紛紛地要求武裝起來，為國家為民族流盡他們的一滴血；在後方，他們的積極性尤其發揮到最高度，一個黃包車夫把所得的全部獻給政府，一個香港小販發起了轟動全國——甚至全世界的義賣運動。士兵在平時本是給人瞧不起的，任何人都可以漫罵攻擊，可是在抗戰中他們却忠誠勇敢，被人目為神聖的民族。

英雄，一向是愚昧無知的農民們，也天天地被尊重起來。這些都是衆所週知的事實，用不到詳細說明和舉例。

這些事實和進步，部份的被反映在文藝作品中，作家們描寫士兵的英勇，農民和工人的參戰，婦女的慰勞和救護，兒童的熱烈和團結，這些作品都可以說已經盡了部份的職責，但還是很不夠，很零碎，表現的方法大半也還是陳舊的，平板的，看不出生動活潑的，有血有肉的形象。可是現在已有大批大批的新人出現，抗戰的烽火已經煥煉出了大批新的英雄，所以我們文藝工作者一定要特別注意人的時間性，要認識人是不斷地活動着，被環境所改變，也改變着環境的，換句話說，也就是要認識在不斷地發展着的人，加以分析和研究，縱合和概括，一定要很忠實地寫出這些有名的和無名的人在抗戰中的作用，他們所居的地位，他們所有的貢獻，他們的優點和缺點，他們衝破環境的束縛和對封建思想的桎梏，積極地投身抗戰的英勇姿態和艱苦的過程，一定要忠實地寫出他們的希望思想和要求，他們的痛苦快樂和憤怒。

只有真正的獨立民主政治，真正把軍政和訓政很合理的配合起來，真正在抗戰建國過程中給民眾以民權的自由，尊重每個中國人（除了漢奸）的人格，才能真正爭取全國同胞的擁護的陣營中來，才能激發最優秀的民族國家思想和掩護熱情，同樣的，也只有文學作品中創造新的典型，我們民族英雄，真實的描寫一些下層的人物，描寫他們的解放和發揚他們的自動精神，才能真正的負起現階段的文藝任務。

「氛圍氣」的創造

自從淞滬抗戰開始以來，速寫和牆頭小說等就風行一時。我們知道這類短小精悍的文章，最重要的就是正確性。但如果沒有或者缺少藝術性，那末正確性就無以顯示，至少不能很好的顯示出來，因為單調呆板的文章，是很難畫出逼真的活生生的形象來的。「速寫並不單單是報告，而是更要對人物和必要的細目加以

生動的形象的描寫』，我想伊佐托夫這幾句話雖則平淡粗淺，却是最恰當最中肯的見解。

把握住人物和事件的特徵，對於某一特定人物和特定事件有關的環境給以新鮮而且活潑的描寫，就是所謂氛圍氣（*atmosphera*）的創造，是增加作品的藝術效果的最佳方法之一。英國已故左翼作家福克斯曾經說過：『如果作者想提高他的人物的現實性，想把那種為行動所必需的緊張性給與他的作品中的主要的契機，那末這是很難得的人。與環境的微妙關係，對於他是最重要的東西……在現代作家之中，福爾克納是創造氛圍氣的聖手，因此恐怖，瘋狂，或者驚駭的氛圍氣，有時竟完全支配着他的著作，幾乎掩沒了微的人物。如果他需要恐怖，那末恐怖的空氣馬上會襲人而來……』這種需要什麼場面或情景馬上就能創造出來的技巧，是我們最缺少也是最應該學習的。

目前無疑地是偉大的時代，作家隨時隨地都可聽到英勇的故事，看到英勇的人物，隨處都有動人的題材。這個偉大時代中所有的聲與光，血與淚，愛

興奮，都是水乳交融似地交織在一首雄壯而且和諧的交響曲中。可是在這渾然一片中，還是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場面，而氛圍氣的創造，是最能增加這種特殊性的顯示的。可是目前的一些速寫和牆頭小說，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是單調，灰澀，沈悶，少變化，少渲染，沒有一點生動耀目的光彩。譬如難民收容所和傷兵醫院的環境，是大大地不同的，如果要正確而且形象的地刻劃傷兵或難民，記錄傷兵或難民的生活和在他們中間發生的事件，那末對於他們的周圍應得很好的加以描寫，用不同人物對於不同氛圍氣的不同反應來加強作品的凸出性。可惜我們的作家都不講究這點，或者注意得還不充分。所以我很希望願意自己的作品更有藝術價值（同時也就是更富於煽動性和社會價值）的作家，學會創造使得作品生色的氛圍氣的本領。但我並不是說環境的描寫可以隨意插入一件作品裏面去，却正相反的我要特別強調地指出「恰如其分」四個字來，因為太多的描寫和過少的描寫一樣會破壞畫面的完整和真實，會像福克斯斯批評福爾克納似的，「很容易陷入浪漫主義的最危險的陷阱。」

「民族文藝」一解

目前文藝活動的最大任務，就是要在抗敵救亡的總目標之下從事創作，提供富於反抗精神和民族意識的作品。在目前，不論是寫的那一種文藝作品，不論是書的那一種表現方法，都以愈能表現民族危機和民生疾苦者爲愈可貴。「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都可以說是基於這個中心任務。名目雖則不同，意義却是一樣的。

現在在抗敵救亡的意義上說，「民族主義」是我們應得積極提倡的東西，因爲他和另一種意義上的民族主義——侵略主義是相對立的。可是有些人曲解了這個名詞，把他的意義狹窄化了，這些先生們絕對不承認民族主義的國際性，用種種巧妙的方法，或明或暗的反對外來的影響，企圖利用新的趨勢復活自己的落伍思想，不爲着掩飾自己的真面目，他們竟說思想是無所謂前進落伍的——閉關主義

所謂純民族的文藝，就是他們這種企圖的具體表現。

其實那裏有什麼純民族的文藝？不論什麼民族的文藝，多多少少總要受些外來的影響，這是無容多加說期的事實。譬如文藝復興時代的英國文學，因為受到希臘羅馬的影響而更加豐富，十八世紀也因為受到佛羅特爾和盧騷的激勵而發揚光大。從法國象徵派詩人那裏現代英國詩歌得到很多的啓發，二十世紀的美國作家對於現代英國小說的影響，也何嘗可以輕視？

在我們海禁未通以前，從歷朝的文學史上我想誰也找不出一個民族曾經單獨發展文學；在和歐美接觸了以後，我們的文學和整個的舊文化一樣，更不是眼覷它因為受到外來影響而一日千里的發達起來嗎？

這是極粗淺的道理，也是老話。可是文學上的古董迄今還未絕跡，妄自尊大的穢氣還是彌漫着整個文壇。他們口頭上喊着民族主義，其實是在替侵略者張目，因為他們玩的原是復古的把戲。他們目的是在阻礙民族的進步，壓殺真正的民族文化 and 民族文藝，他們誣稱『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等是

來路貨，是某部分作家受到『訓命』而提倡的口號，一方面否認它們是民族危機深刻化在文學上的反映，一方面抬出自己捏造的土產——所謂純民族文藝來以為對抗，用心真可謂毒辣之至！

國民文學乎？幫忙文學乎？

在歐美，所謂國民文學實際上就是市民文學的一種。所謂國民，實際上也就是市民的一部分。它的特點是強調偏頗的民族意識，鼓吹狹義的愛國思想（註一）。國民文學者一直都是利用民族和國家的大帽子，抹煞社會層的分裂，衝突，矛盾，掩飾不平等的社會制度。所以這種文學完全是歌頌市民的廟堂文學，對於大眾是毫無好處的。到了現在市民層日趨沒落的時候，跟着騷動和戰爭，深刻化，這種文學更變成侵略者的工具。它也是主張重分世界，犧牲弱小民族的利益，壓迫下層民衆的抗爭，反對保衛和平的國家。現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許多作家，

都是屬於這一類

因此我們可說國民文學的代表者，全是市民層所御用的代表。文學史上可以找到的偉大作家，如我們所熟知的巴爾扎克，左拉，馮斯等等，雖則他們出身並不一定在下層社會，而且或多或少與市民層有着關聯，却決不是我現在所指的國民文學者，因為他們都是不滿市民社會的腐敗，揭露市民生活的黑暗，跟鄧南遮，皮藍得婁，吉伯林之流，完全不同，如果他們生在現時，我想一定不會跟着莫索里尼，以侵略阿國爲快；反之，他們一定會反對侵略，捍衛和平，保衛文化。

可是國民文學者也決非老老實實，毫不掩飾地讓自己露出猙獰的面目，却是很乖巧，很聰明地使用着各種各樣的保護色。譬如意大利的國民文學者，有的裝神祕，有的學傷感，有的讚美古代的光榮，更有的顛倒於色情，無恥地寫些肉麻的文章。他們把戰爭神聖化和詩化，使它塗上了一層悅目的顏色，甚至胡說戰爭是補品，是熱情的爆發，羅曼羅蘭說和平對於希特勒是致命傷，對於現在的一

班國民文學者，我們也可以這樣說。

所以國民文學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說是幫忙文學，而且是積極的幫忙文學；這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尤其看得明顯。現在我就想在這點加以說明和舉例，因為我們自己也是半殖民地的一分子，對於這點自然是更關心的。

大家都很明白侵略者爲了滿足重分世界的慾望，一定要創造出民族優勝劣敗的理論（註二）。譬如德國的野心家，就利用久給遺忘了的尼采學說，以爲只有雅利安族才是最優秀的民族，才能統治和支配全世界。這種理論原是非常荒謬的，現在意大利侵略東非也是用的這個口實。他們以爲阿比西尼亞是劣等民族，實在野蠻和落後得很，非用飛機大砲坦克車，去促進他們的文化不可。說來也許頗爲奇怪，我們中國的國民文學者也竟有這種理論：

「然則吾人果不能辨認由人種之差異而起之精神的形質之差異耶？關於此問題，在某一程度範圍內，固有可能。特別在所謂原始民族，其精神的素質實較文化民族低劣，此爲極明顯之事實。若僅視作外的影響，則無論如何，亦難於釋明也。例如澳洲土人，

穢達人 (Veddā) 霍登脫人 (Hottentot) 及布斯曼人 (Bushmen) 等，就其骨格而論，皆屬原始的，同樣，就其精神形質而論亦屬劣等。在同樣風土上之他民族，在文化上有極大之進步。彼輩至今日仍不出太古石器時代文化一步，且其人口亦日見減少。此果何故耶？此種關係猶之精神低能者之處於腦力健全者之間，雖加以種種之調護，但終不能戰勝長期間之淘汰作用，而漸趨衰滅也。穢達族及布斯曼族即以此理由而漸趨衰滅者。究其原因，與其謂係文化設施之低下，毋寧謂彼輩之缺乏利用文化設施之觀念，較為妥當也，就中以節慾力之貧弱，深謀遠慮之缺乏，實為此等低級民族之共通性質。若就心理學上加以說明，則當稱之為想像力缺乏。即低級民族對於某一事件絕不慮及其結果。又每遇困難事情發生時，亦無能講求處置之方法，此等性情皆為原始民族所共通之精神的特質。其結果，某一民族以酒精 (Alcohol) 破壞其健康及遺傳質，亦有以花柳病以潰滅其身心者。又有某民族則全不知貯蓄以備不時之需。甚且有不識污穢，終年不加洗滌，即無清潔衛生之觀念者。北美之印第安人經數萬年之久，皆住於銅山之上，但不知所以利用此礦山。南洋土人，同樣曾經開闢長久之年代，但至今日，仍不能超出於古石器時代文化之上。吾人當以何種理由說明此等事例耶？無他，低級民族缺乏對於利用物

質之素質也。既滅亡之韃拉達族 (Dreveti) 亦然。即今日之織達民族，澳洲土人亦仍日奔馳於山野之間以求一日之糧，完全不用牧畜與農耕。例如澳洲土人，在某一地方，雖野宿於寒冷之空氣中，仍不知所以築築房屋或縫製衣服；即其用於狩獵之武器亦不能製造銳利者，而僅使用極原始的武器，文明人雖曾以農耕牧畜訓練此等土人，但終歸失敗。」（見「國民文學」二卷一期）

這論調簡直是和莫索里尼同一鼻孔出氣。其實有些民族之所以落後，所以還逗留在原始的狀態，就是因為受到所謂「優秀民族」的摧殘，掠奪，封鎖，使他們無法從事物質的建設，更無法促進文化。澳洲和南洋的土人，如果不是受着英荷等的壓迫，決不致仍然可憐地過着原始的生活。這些「優秀民族」所以要訓練土人，原是爲着便於剝削，增厚利潤，却決不願他們躋入文明之林，起來反抗和保衛自己的利益。而我們的國民文學者竟是這樣的歪曲事實，明明是在替侵略者幫忙說話。如果上面所引的論調是真實的話，那我們的遭受壓迫也是當然的事了，因爲我們目前的「貴賓」也以我們爲無可救藥的劣等民族呢！

給看成非常自私和劣等的民族，難怪我們要與非洲黑人，美洲打人，馬來土人並列了。而我們的國民文學者却正捨了這種餘唾，說什麼低級民族是無可救藥的，就是經過優秀民族或文明人的訓練改造，也「終歸失敗」，其武斷誠令人吃驚。如果這篇文章的作者並非出於無心，那我們說他是間接的幫侵略者說話，又有什麼冤枉呢？

所以我們的這些國民文學者也是幫忙文人，是無容諱言的。祇是他們並非直接替本國的統治者幫忙，而是間接為別國的侵略者服務。他們是依賴的，不能自己獨立，完全是半殖民地的典型，自然，為了完成這種「文學買辦」的使命，他們也需要「造謠言」崇拜英雄（自然大半也是侵略國的英雄），鼓吹戰爭（但不是弱小民族的戰爭），而且也要談色情，裝幌子。在這遍地水災的時候，農民們更是頭無路，而我們的國民文學者却告訴你農民生活是最可貴的，最適於衛生的生活。這跟意大利的國民文學者因為眼看著經濟恐慌，失業問題無法解決，叫大眾回農鄉去餐風飲露，而把這種飢寒交迫的生活美化起來是一樣的用意。

現在意大利的國民文學者，正在大事幫忙；鄧南遮和皮藍得裏的言行，是活體實例。可是我們這半殖民地國民文學者，却連幫忙的勇氣也似乎喪失了；不然威風凜凜的「國民文學」，為什麼現在竟是如此銷沉呢？

註一：最近有個保加利亞的哲學者說我們應得反對狹義的民族主義，但我們却決不承認民族，決不贊成「民族烏有論」(National Nihilism)，他自己在有人罵保加利亞為野蠻民族的時候，就加以反對過的。另一更著名的哲學者也曾以「俄羅斯自蒙」而且力說民族因素在大眾解放運動中的重要。我們也可以這樣來看愛國的思想：在目前，我們雖則極端支持愛國的思想，却還是不贊成狹義的國家主義。

註二：高爾基以為這是現代文化的主要特徵之一。

文藝界的「台墨哥割」

我一向少讀「文學概論」一類書，因為一翻開這一類書，往往就看到一些使

人頭痛的話頭，什麼自我表現呀，純形式的追求呀，靈感呀，天才呀等等，彷彿作家真是一個神祕的怪物，文學真是一件奧妙的法寶似的。

可是這些老式文學概論的作者，始終還存着三分天真。他們並沒有掩飾自己的面目，坦白地承認自己是澈頭澈尾的主觀論者，不像我在後面想說的蘇汶先生那麼圓滑。

近來文藝界時常出現漂漂亮亮的「台墨哥割」(Démagogie)。他們往往應用一些時髦的，響亮的，甚至激進底言詞，來欺騙理解不深的文藝羣衆。這批人說話非常動聽，但只是貌似前進的。

蘇汶先生就是這種人。在他最近的一篇文學解說中，有他關於文藝基本理論的「一家言」，十足表現了這種作用。

那篇文章是解說「作家的主觀和社會的客觀」，是這位批評家費了苦心思索出來的。可是他怎麼說的呢？

請看下面的幾段引文：

「作家的靈魂，那纔是使作品成爲藝術品的要素。」

「這作品之成爲藝術品，關鍵並不是在表現客觀這一件事。」

「我們所要求於文藝作家的表現的真實，主要的就是這一種主觀上的真實。」

「而且定要對自己的主觀非常的真實，他纔能免於說謊，免於把客觀來歪曲的，因爲在真實的主觀裏纔有真實的客觀。」

這寥寥的數行，已儘夠使讀者明白這位批評家是用怎樣的「角度」，來觀察社會的客觀和作家的主觀。他雖則時時應用「客觀」「真實」等等字眼，事實上却是極力主張在文藝作品中，所謂客觀的真實，是完全依存着作家的良心——即作家的靈魂。他企圖把因果的關係倒置過來，使社會的客觀附屬於作家的主觀。這和「意識決定存在」的諷言，是一樣的說法，不過翻新了花樣而已。照他的意見，社會的客觀和作家的主觀，先後是可以隨意參差的，換句話說，這二者的關係可用後面二表同樣的說明：

(一) 社會的客觀作家的主觀——作品

(二) 作家的主觀社會的客觀——作品

可是，據我們所知道，是社會的客觀決定作家的主觀，決不能倒這次序來說，作家的主觀也同樣的可以決定社會的客觀。社會客觀是獨立存在的，決不是從屬於作家的主觀。架空的作家只是無視現實，歪曲現實的幻想家，不能反映客觀真實的文藝作品，也只是諛語或者謾語。這是按之事實，以證明的，那裏得三個批評家「翻江倒海」？

蘇波先生又說：「文藝作品的讀者方面也是一樣：我們對作品也並不祇要求它報告一個事實，我們同時還要求着作者對這事實的理解，的分析，的感應，以及對於未來的啓示」，是對的。可是這並不能證明作家的主觀可以決定社會的客觀，却只是說明了作家不能機械地處理題材，不可誤解主觀積極性的創作方法上的問題，因為作者對於某種「事實」的理解以及分析等等，也必以那個客觀的「事實」為前提。而且讀者所根本要求的——只要他不戴上顏色眼鏡，也——作品對於客觀忠實的正確的反映，他術所希望的，決不是作家所虛構的海市蜃樓。

不用說王蘇浹先生也顧慮到這層，他提防底說：「因為作品的注視也是社會客觀的產物，所以作家本身就是真實，他的作品就一定是能表現客觀的，根本無須乎他關心。你看，這脆辯多少無聊！」

更甚者，是他根本否定了「本質」，說本質只是個人或宗派的成見；而且公開地提出所謂「作家協調」的主張，以為作家的主觀不是互相排斥的，想當然在文藝領域上呈現出來，矛盾和衝突，真不愧是無十足道地的「台學哥制」。這位批評家對於東縛文學自由的真正原因一字不提，他把文學不發達，責任推給正確的原理和理論家，其用意豈不是明如燭火嗎？

再說到文藝作品的頂點 (Climax) 問題，在這兒他也來了一個大大的謊話——他謊頂點往往總是作者加上最濃厚的主觀的渲染的部分。其實是不然的。因為頂點只是主題發展的結果，在這兒有最緊張的場面。表面上看起來，作者往往在這一層解釋着或說明着他自己的主見，但事實上，他所說明的也只是社會上某一階層的見解，決不能把它純粹看作個人底底。這是非常明白的事，那裏能用這個理

再來說大主觀的重要性呢？

話差不多已經說夠了。但臨末，我却又記起後面的兩句話：

「主觀是一件可怕的事，它暴露了作家的手和腳。」

這位批評家在他的說教中，不但暴露了自己的手和腳，而且已經揭開了面紗，暴露了自己的真相，我寫這篇短文的用意，無非要幫着他脫去衣衫，脫得精光的，使他完全顯現出原形。但如真像前幾天岑伯先生指給我看的樣子，我只是在白費力的「對牛彈琴」，却未免大有孤癡之感了。也許賢明的讀者，會解除我這孤癡之感的吧？

所謂「雜文問題」

一

在契珂夫投寄短篇小說的時候，據顧伯林（Kuprin）的「回憶錄」所載，一

些編輯先生往往向他說：「你說什麼？你以為這是一篇作品嗎？可是它比麻雀的鳥子還短呀！不，我們不需要這種鷄零狗碎的東西。」

林君篤君對待雜文的態度，大有這些編輯先生的氣概。他口口聲聲的攻擊雜文，把它看成「一枝一節」的，「不三不四」的小道，和所謂「偉大的作品」對立起來，其口氣之大，氣焰之高，真足使一些雜文家退避三舍的。

細讀林君的大作「雜文問題」，歸納起來，不外下列三點意見：

(一)文學社操縱文壇，魯迅包辦雜文；

(二)雜文是雕虫小技，站在文壇上的作家，應該製作雜文以外的作品；

(三)現在的雜文家能力不夠，即連「不三不四」的雜文，也應該讓另一種人

去寫。

好吧，就是不細細引證林君的高見，讀者怕也會明瞭林君的武斷，是如何荒謬好笑！

大家都知道所謂雜文，原是一種含有戰鬥意義的特殊文體。「急遽的劇烈的

社會衝突，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鑄鑄到創作裏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裏……」，這是這種特殊文體產生的社會原因。所以在目前這樣緊張和不安定的時候，雜文的變成一種潮流，風行全國，正是很自然的趨勢。在契珂夫的筆記中，曾經引用了郁德的話：「爲什麼你的歌曲這樣短呢？」一隻鳥兒有次被這樣質問，「可是因爲你短了氣嗎？」「我有很多的歌曲，我都想唱唱看呢。」雜文家可以比作一隻時代的鳥兒，它有很多的歌曲要唱：悲慘的，悲憤的，憂鬱的，歡樂的，戰鬥的……如果有誰嫌歌兒短，叫它不要再唱，而且迫令它沉默着製成偉大的交響曲，那無疑地是想根本箝制住它的歌喉，閉住它的嘴巴，使它在窒悶和痛苦的忍耐之中，任人宰割。林君把這種很自然的趨勢，指爲是文學社操縱和魯迅包辦的結果，那裏能圓其說？

而且雜文和非雜文，根本並非對立的，它並不能代替創作。譬如蘇聯現在小品文非常發達，但同時別的文藝作品也很進步。支持雜文者只是以爲雜文的特點，是比大規模的創作能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會上的日常事變，決不會優到如

此地，只承認雜文的社會價值，而抹殺其他各種文藝的功用。但林君却故意曲解偉大的作品的潛修時代」這句話，硬生生地把它和雜文的繁衍連在一塊，真是「不解」。其實社會的不安，作家出身的受限制，一般文化水準的落後，使我國迄今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是明明白白的事。就是在蘇聯內戰時期，也曾感到文學藝術的荒蕪。在前線的士兵，雖則幾乎瘋狂似地要求着文學著作，但結果往往都是失望。我想林君也當知道一部名著的構成，必得經過相當的時間，並非一朝一夕可以急就的。別說歌德托爾斯泰以及塞凡提斯等等的古典作家，卽近代新作家如士敏土的作者革拉特珂夫亦必須在擺脫了政治的重負以後，在比較清閑和安定的日子裏，才能從事於著作，而且寫作是很慢很慢的，他只以每月寫二千五百字的速度，從容地、慎重地寫完一部小說。可是我們備有這種順利的條件嗎？林君爲什麼不心靜氣地研究研究這些根本的問題，却閉着眼睛空喊偉大的作品，難道偉大的作品會從地底跳出來的嗎？

至於說到雜文作家的才力問題，我真不明白林君是以什麼根據和標準，來制

定現在雜文家的才能全是有限得很」？如果無所據而云然，那我實在替林君擔憂。會有「昏蛋」疑心林君「未始不因爲自己是雜文的製作手，而想藉此功成名立」，因爲故意「褒」「貶」原是一樣的巧妙。

希望當作雜文作家的林君不要自以爲「獨家經理，並無分設」，目空一切的排斥一切「同業」。我並不期待林君能成什麼托爾斯泰，能寫什麼「戰爭與和平」，倒情願林君放天目光，切切實實地寫幾篇比較像樣的雜文。阿彌陀佛！

一一

最近一期「星火」上申去疾先生的論所謂雜文問題，是篇洋洋數千言的大文。它是批評我在青光八月十二日發表的所謂雜文問題的。他一口咬定我是犯了排斥雜文以外的文藝作品，否認非雜文也含有戰鬥意義，提倡粗製濫造，以及驅使作家們向雜文的牛角尖里鑽去等等的罪狀。

因此我覺得我也有幾句話要說。

我的原文，斷沒有如申先生所說的那些意思。我並沒有說「中國文壇，自然不應產生偉大的作品」，更沒有武斷偉大的作品只能在和平時期創造出來。藉口沒有安靜日子來替自己短處辯護的作家，早給高爾基的作品證明是種說謊了。

我的用意只是想說明中國現在所以文化會如此落後，文壇會如此荒蕪，是有其社會的根據；雜文之所以會風行一時，也決不如林希雋先生所說那樣只是某派或某人包辦的結果，却也是有其客觀的淵源。

此外，我更想附加地說明中國目前的動亂，已經達到空前的程度，只有養尊處優的人才會隨着眼否認這個鐵一般的事實，歌頌現在正是一個「國泰民安」的昇平世界。在這偉大的暴風雨中，大多數人都捲入緊張的，艱苦的，日常的奮鬥中，有更重要的事業要做的人，無暇執筆也是應有的情理；而有機會寫作的所謂「作家」，却又浮在這個歷史大事變的表面，因此橫在他們眼前的雖有「空前的外侮，空前的災荒」，却也無法把握到這些題材的中心，作形象化的表現，甚至有心作第二托爾斯泰的「偉大作家」，也只能「降格」寫幾個短篇，甚至也來一

大批「不三不四」的雜文。

還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實，那就是現在作家們的命運已是非常艱苦。重負的束縛使得他們的自由失去了一大部分。雖有少數的作者，能夠衝破這些沉重的壓迫，毀去種種障礙或一節，但大多數作者却尚在可怕的痛苦中輾轉呻吟。森嚴的 *Анатолий* 是摧殘了很多作品的。試問是否事實呢？

沙皇時代俄國也產生了不少偉大的作品，是實在的情形，但尼古拉一世雖則專制，在果戈理的著名喜劇「巡按使」，由絲美諾伐夫人 (*Mudane Fennanova*) 拿去他看，讀給他聽的時候，這專制的魔王也居然放聲大笑，命令准它上演，並親自去看，非常興奮地喝彩，可憐在沙俄中國呢，連修談偉大作品的林先生們，也不能去注意那些不幸的作品。

總而言之，林希禹申去疾先生以及讀者應該明白一個嚴重的事實——一個長期的就是產生偉大作品的道路，是不能單獨抽象地說明的，它必得與一般的解放和改革密切地連繫起來。不管實際的情形，却空口「命令」偉大作品的出現。

彷彿「呼之即來」那麼容易似的，這種一掃情願的姿人，簡直是在抑殺偉大作品的萌芽，是在散布無恥的謊話。

軟性·硬性·刺激性

目前的文壇真是混亂極了，要理出一個頭緒來自然很是困難。如果要問它的動向如何，怕是很難回答的一個問題，會難倒很多的名流學者的吧？

但最近有二位先生在香對某記者的談話，却簡明地指出了出來：

「至於動向，近來讀者之口味，需要富有刺激性的作品。一個文學作者總希望成功的話，走這條路是很可靠的。」

這種足以代表最近文壇動向的「富有刺激性的作品」，究竟是怎樣的東西呢？據這位先生說，現今的一般讀者雖則需要刺激性讀物，但不一定要「硬性」的。那末所謂硬性的讀物又是什麼呢？這是很重要的一問，且聽這位先生回

答：

「現今有不少作家，是爲着某種主張而寫文學作品的，然這並非純文學。真正的文學作家，自己是沒有什麼主見，祇想怎麼能夠把文章弄到真美動人。」

這位先生隱隱地就以這種爲着某種主張而寫成的作品爲硬性文學，因爲它們都是「索然無味」的，並有人要讀，那末，照理說，是純文學的「軟性作品」總該風行一時了吧？但這位先生以爲這也是不然的，他說這些東西只在過去紅過一些日子，現在却早已零落了。硬性和軟性既都已過時，那末現在獨霸中國文壇的究竟是什麼怪物呢？

自然是富有刺激性的作品！

可是，這富有刺激性的作品却實在使我有點糊塗，摸不着頭腦。性慾小說是富有刺激性的，充滿着煙火氣的「國民文學」也是富有刺激性的，「甚至談性靈和幽默的小品也能夠刺入脾胃，刺得人「皆大歡喜」。這三種富有刺激性的東西，我想決不足以代表中國文壇的動向，因爲它們表面上雖則還在虛張聲勢，似乎

蓬蓬勃勃；但按之實際，却早已像某某大師所招供似的：「只有沒落，沒落，一百個沒落。」

因此，我想單提刺激性，而忽略了硬性，決不能說明目前正在中國文壇上佔優勢的作品。而寫這種富有刺激性作品的作家，更不是傀儡式的，自己毫無主見的文人。矛盾的「子夜」是有刺激性的，是受讀者歡迎的，但它可是軟性的作品嗎？丁玲的「水」也是富有刺激性和受讀者歡迎的，但它不也是硬性的東西嗎？再如魯迅的全部作品，如果只說它們是有刺激性的，却並非硬性而是軟性，怕是誰也不會承認這是真的吧？

所以凡是富有刺激性的，一定也是硬性的，軟弱的豆腐不能刺人，無刺的薔薇也不能刺人，寫這種文章的人，一定要有一個堅決不移的見解（也可以說是立場），否則他一定把握不到廣闊的中心，不能一針見膿的。現在有很多富有刺激性（的）硬性作品，因為作者大多還是脫離實踐和不是直接從勞苦羣中出來的人，頗有不中肯要，隔靴搔癢之感。但這是一時的現象，決不致長此下去。在這過渡的時

代，這些比較有進步性的作品，却無論如何是佔着首要的地位；除了毫無機會念書的文盲或者專讀幽默小品的太太小姐們以外，這些作品也始終是大多數讀者最歡迎的讀物。所謂純粹的文學，不論是怎樣精美細膩吧，也是會遭他們冷眼，以背相向的。

幼稚是難免的。美國的傑克·倫敦雖是出身於勞苦大眾，但他對於他們的看法，也有錯誤的時候。在他的名著「鐵踵」中，他把勞苦大眾寫成一羣可憐而且盲目的奴隸，他們沒有一點兒組織，却只是用着流血來宣言他們的存在。他描寫他們鬥爭的方法，與其說是寫實的，毋寧說是神祕的和浪漫的。所以有這種誤解，是因為它是一九〇七年的產物，剛在俄國第一次大騷動（一九〇五）失敗以後，那時他只看到美國資本主義的飛黃騰達，只看見「鐵踵」在他的國內叫囂跋扈。不用諱言，在我們的新作家中，雖則現在已同傑克·倫敦的時代相去很久，但除了藝術的修養還很欠缺以外，對於整個社會運動的了解模糊，或者錯誤的，也還是所在皆有，可是我們不能對他們要求過急，希望他們一下就變得很好；如果因

爲他們的作品還不能合於理想的「真美動人」，就否認它們是中國文壇上主要的勢力，主要的潮流，那簡直是昧於事實，閉着眼說話。當然，我得再三聲明的，我決不是掩飾這些比較進步的年輕作家的缺點，更不是想把他們的作品當作典範，做成一個機械的圈套，一個呆板的公式。我祇想說明他們的進步性，他們在中國目前文壇上所起的作用。他們的作品確是富有刺激性的，却同時也是硬性的。這位先生指出的「軟性刺激品」，怕祇有林大師的公館中所栽培的「薔薇」才當得起這種美稱。

總之，現在中國文壇的趨勢是一方面在勞苦大眾中生長出作家來（但在目前是很艱難的），一方面是比较進步的作家更接近勞苦大眾，更接近歷史的變動。這些新文學的接生婆，現在差不多都存着如下的理想和希望（也是引的傑克·倫敦）：

「我不願再向上爬了。莊嚴燦爛的社會上層建築，已使我厭倦。能够使我感到興味的祇是它的底層。在那兒我滿意地手里擎着鐵錘，同智識分子，理想主義者，覺悟了的

勞苦大眾肩並肩地工作着。不久以後，當我們得到更多人手和鐵鏈來工作的時候，我們會使它顛覆的，連同它所有的腐敗的生活，暴露的屍骸之可怕的自私，以及浸淫甚深的實利主義。然後我們要打掃地窖，爲人類建造一座嶄新的殿堂……」

他們也是這樣熱烈地希望着，而且在文壇上艱辛地做着「去舊迎新」的工作。雖則他們的努力還嫌不夠，他們的作品還嫌幼稚與粗糙，但在這個混亂的，過渡的時候，他們始終是支浩蕩的人馬，是個主要的力量。談中國文壇的動向，却疏忽了這點，只含糊糊的說了一大堆廢話，是很可惋惜的。

作品與生活

作品與生活的關係，是很密切的，這幾乎是大家都承認的事實。但前幾天有魯迅先生却提出三點意見，表示反對，立論很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因此我

也簡單地寫出幾點來就正於周先生。第一點，周先生提出『想像』的重要。他說『由想像構成文學的實體，而發揮出熱烈的感情——通過某種思想的感情』。又說『想像只有深刻圓滑和浮淺惡劣的分別，決沒有生活充實不充實的分別』。可見周先生是反對生活須要充實，和生活充實對於想像的影響。如果照這個說法，那末一個作家只要有強烈的想像力，就儘可坐在『亭子間或大洋樓里』寫作了，因為想像會發揮出熱烈的感情，而文學又是『終究是以感情為中心的一種學科』，這豈不是方便得很嗎？可是事實上是不是這樣簡單？不論是想像力怎樣豐富的作家吧，如果沒有一點實生活的體驗，那末他那空空洞洞的腦袋里，能夠憑空地想像出什麼花樣？周先生一面說『不過想像也不能離開了真實的一般的生活』，一面却又否認生活充實不充實與想像深刻不深刻的密切關係，真教人不解。荷馬的詩，托爾斯泰的小說，只是他們想像的結晶，還是他們那時代的社會生活的反映，是可以徵諸現實的。至於周先生以為『到了近代的進步的文學出現，才在文學中加入了思想的要素』，彷彿以前所有的作品，都只是一團混沌的感情，抽象

而不着邊際的東西，這究竟是不是事實？所謂『近代』以前的作家，是不是只是
一些毫無所爲的，簡簡單單的，只知喜怒哀樂，只知揩鼻涕流眼淚的小娃娃？

在第二段中，周先生舉中外很多作家。他說茅盾葉紹鈞諸家的作品，並不全是私生活的記錄。這是很對的。可是周先生有時把『實際生活』只解爲狹義的『私生活』，有時却又機械地分開，是不正確的看法。因爲人是社會的動物，他的社會關係是很複雜的，除了他本身直接所受的經驗，還有更廣泛的，範圍更大的『一般生活』。所謂『體驗生活』，並不一定就是『親自生活』來的私生活，所謂『充實生活』，却正是要求一個作家要有各方面的生活智識，澈底完備的生活智識。一個作家必定要從偏僻的私生活的圈子裏解放出來，放大眼光。他得善於觀察，分析和概括各色各樣的生活，而且對於他所選擇的題材，要有一點不含糊的了解。機械的去了解『直接生活的經驗』，是容易使、誤會的，其實什麼事情都要直接的親身經過，是不可能的。但曾經親身經驗過的生活，更能夠寫得親切動人，却始終是真理。就是我所說的『觀察』，也決不是抽象的方法。

周先生不從這些地方去理解，却拋開了作家所處的社會環境，所有的社會關係，而且不根據歷史的觀點，而要求不是『現代』的巴爾札克和不是『美國』的高爾基，『發揮着高強的想像的藝術能力去描寫別種故事，好像辛克萊的描寫一個煤油大王的毀滅，描寫炭坑和屠場的慘苦』，這誠如周先生自己所說的一樣：『恐怕是不合理的要求吧？』

至於第三點，周先生着重指出的還是『想像』。不過他自己也說：『……這得在亭子間裏大洋樓裏去想像社會的事情，想像力強的人本可寫出一點若有其事的作品來，想像力幼稚的便只能愚笨地說狂，作品完全失去真實性了』，可見『想像』的不可靠，一個作家如要加強他的『想想』，不使他的『想像』變成虛無縹緲的『幻想』，使作品只能達到『若有其事』的境地，或竟至完全失去真實性，那必得——又是借用周先生自己的話——不能離開真實的一般的生活，換句話說：就是他要勇敢地積極地『參加生活』，『體驗生活』，『充實生活』。所以周先生這段『異議』並沒有能夠取消『充實生活』對於『思想深刻』的重要，却

反而加強了意義。但在下結論的時候，周先生却又很奇怪地一轉，抽象地提出「作家的能力問題」，說是作品的成功與否，完全要看作家的能力如何。我並不反對作家的「能力」，但能力並不是什麼神祕的法寶，決不能這樣憑空的提出來講，更不能倒果爲因，加它以絕對的決定的意義。周先生似乎也反對那些專寫身邊瑣事的，近視的作家，說他們的寫作方法是「取巧」，也是不錯的，但我早已說過，我們決不能以爲零碎抓一點斷片經驗——個人的生活，就算是什麼「充實」和「體驗」，我們不能混淆了「體驗」和「經驗」的區別。

總之，我認爲「作家能力論」是不成立的，如果脫離了實際生活而談什麼抽象的玄祕的「能力」，那不免是空談。

國難教育我見

一 國難教育的意義和它的重要性

自從「九一八」「一二八」一直到現在，因着日本帝國主義的積極侵略和大漢奸的出賣投降，中華民族已經到了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頭。在這四五年間，我們失去了東北，熱河，長城一帶，冀察，綏遠，以至整個華北和內蒙，日本帝國主義取得了直接的統治，同時在華南和華中的侵略也更加強化。漢奸們變價出賣了不可計算的民族利益，使日本帝國主義不費一箭不折一兵地囊括了半個中國。因此現在展開在中國民衆面前的前途，乾乾脆脆的只是兩條：不是屈辱投降。就是獨立自由。這兩條道路的鬥爭，在去年「五二九」的華北問題發生以後，是更加明顯了。這一個時期的特點，表現在這樣的三方面：

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由單純軍事的奪取東北四省轉變為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四大武器的同時並用。

乙、漢奸賣國的辦法和方式最近都有了一個轉變；這一轉變的特點，第一是由單獨的賣國轉變為合作的賣國；第二，除了這樣以分贓收買的辦法互相拉攏以外，漢奸們加緊想出種種似是而非的說法，實行新的欺騙和麻醉。

丙、中國的大衆和革命民衆，在侵略和出賣的民族危機日益深化的情勢當中，已經認清了只有澈底地建立大規模的民族戰綫和進行廣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才是解放整個民族國家和自身痛苦的唯一出路。

爲着推進和擴大這一民族戰綫的運動，保證和鞏固這一運動的持續和繼續，鼓舞和刺激廣大民衆對於這一運動的熱情，指導和支持這一運動的正確路綫，總之，爲着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保衛中華民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特殊的非常時期教育是必要的，『國難教育』就是適應這種非常時期的特殊教育。它完全是民族解放統一戰綫的實際運用，與反動的『亡國教育』或『奴隸教育』針鋒相對，決沒有互相妥協的餘地。這是『國難教育』最主要的意義，也是它所以在目前成爲特別重要的緣故。

二 國難教育方案的特點

由陶行知先生所擬，經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在一月六日正式通過的『國難教育

方案，」是實現國難教育，救亡圖存的一個很有價值的計劃。它所包含的特點，可以分爲幾點來說：

甲、它是真正的中國民衆抗敵反漢奸的民族戰綫的具體應用。它所指出的教育對象，主要的就是廣大的民衆。它所包括的範圍很大，凡是不願當亡國奴，有一點救國救亡的熱誠，願盡一點救國救亡的義務的人，不問是什麼人，不論是從事什麼職業，是下層或上層，都得參加「國難教育」的活動，都可以受教或被教，而且都可以參加國難教育的組織，享受救國的權利，盡救國的義務。

乙、它是一個自下而上的真正羣衆化的教育方案，這個特點最明顯，因爲「國難教育」的目標第一項就是推進大衆文化，而這「大衆」，看以後的幾條（尤其是「國難教育」的文字工具），無疑地是最受壓迫的勞苦大衆。因爲歷史和目前的事實證明，只有佔全國人口大多數的勞苦大衆才是民族抗戰中的主力，不發動這個主力而且以爲骨幹，或者使上層組織和它隔離開來，民族抗戰的勝利是不能獲得的。在葉山先生的學生救國運動的意義和任務一篇文章中，（「大衆生

浩（一卷十期）提出救亡禦侮運動應該深入工人、農民、和軍隊的號召，是完全正確的。

丙、它是一個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教育方案。這個方案並不是紛然雜陳，五光十色的文件，而是一個有組織的工作綱領。它裏面包含有目標、對象、教師、課程、組織、文字、工具、方法、以及最主要的幾個原則。因此它並不空洞，却是富於實踐性的；換句話說，它是理論和行動一致的，因此也是有戰鬥性的教育大綱。

所以，陶行知先生所擬的這個方案，跟只掛着『國難教育』或『國防教育』的招牌，而事實上却是企圖取消或歪曲民族武裝自衛的什麼什麼計劃，沒有絲毫共同之點。

三 怎樣來實現這一方案

要討論這一問題是相當繁雜的，我祇是就我所能見到的貢獻出來：

甲、『國難教育方案』的實現的問題，主要的是組織問題，如果只是擬出很完備的方案，而沒有健全的組織，那是一定要成爲紙上談兵，無補實際的。

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以後，還不會有更擴大的行動。它沒有和其他各地如北平、南京、廣州、武漢等地的文化界取得聯合，建立分會，有步驟的有組織的擴大到全國去。和一般羣衆運動的聯繫也不夠密切。這種組織上的缺點，很明顯的要妨礙到『國難教育』的進行和推廣。因此，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必須充分吸收文化界的愛國分子，擴大組織，健全組織，使它成爲『國難教育』的最有力的執行者和組織者。

『國難教育』的執行和組織工作，最基本的是開辦民衆學校，組織工農讀書班、讀報班、時事討論會、和加強原有的各種教育機關，使它們在『國難教育』的任務上活躍起來。

乙、加緊進行宣傳、解釋、和指示的工作，澈底揭露漢奸的欺騙和麻醉，從各方面展開思想上的鬥爭。民族解放的鬥爭不僅需要克服一切漢奸的欺騙和麻醉

，而且要在大眾中建立抗敵反漢奸的思想。對於徒有其名的『知識救國』『科學救國』『生產救國』啊，『三三亡國論』『五十年抗敵論』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唯武器論』啊等等一切欺騙麻醉和武斷宣傳，都要給以無情的打擊，把民族解放鬥爭的正確理論，擴展到大眾的意識里去，把大眾的意識『武裝』起來，把大眾引到實踐的鬥爭上去。在這方面，文化界擔負着特別重大的任務，也是『國難教育』在現階段最主要的內容。如果把『國難教育方案』中的方法和『幾點認識』加以具體的解釋和更進一步的補充，那末就成爲『面的幾點』：（一）要盡力統一救國宣傳，除各報章雜誌外，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應該出一種教育刊物來指導、討論、批評、報告『國難教育』的實施。（二）邀集專家，舉行各種討論會、座談會、交換救亡圖存的意見，對一切欺騙麻醉的理論和一切正確的理論都提出結論，作爲宣傳和教育的根據。（三）出版各種小冊子或救國小叢書，它們的內容要簡單明瞭，要富於鼓動性和實踐性，要應用故事、詩歌、音樂、雕刻、圖畫、對話和簡短的戲劇，來進行宣傳的任務。（四）要舉行，廣泛的

舉行各種含有『國難教育』意義的集會和行動，如講演會，戲劇公演，宣傳隊，組織死難烈士的憑吊，以及遊行示威等。（五）反對改變教育方針（平時教育），要求在學校中停止一切非常時期不必要的課程，實行抗敵反漢奸的非常教育。

丙、現在我要指出實現『國難教育』的方法上的基本問題：第一是『國難教育』的實現必須要跟大衆的生活緊密的聯繫起來，從大衆的生活上去教育他們。『國難教育』不是懸空的，它只有利用大衆的日常生活和各種國恥紀念日，對大衆灌輸愛國的思想，鼓舞愛國的熱情，才能收到實效，也只有在這一個堅固的基礎上才能發動積極的廣大的愛國運動。『愛誰的國？』『替誰愛國？』『愛國和自身的關係是什麼？』『要愛國，什麼是唯一的有效的方法？』這些都是根本的問題。例如在『一二八』紀念或其他國恥紀念的前夜，大衆受帝國主義和漢奸們壓迫得透不得氣，在生活上最感威脅的情形之下，正是實行『國難教育』最重要的時候，即是『國難教育』在實施上發生效力最偉大的時候。第二，『國難教育』的實現和徹底爭取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的自由，和爭取愛國行動的自由，有不

可分割的關係。言論和出版的不自由，是使敵人的凶殘的進攻和漢奸的無恥的出賣投降，以及正確的激發大眾的輿論和指導大眾的理論，永遠和大眾隔絕；使大眾永遠殘存鼓裏，等到殖民地奴隸的帽子戴在頭上還不知道。結社、集會、和愛國行動的不自由，大眾不能取得組織的、行動的力量，不能從組織上、行動上獲得教育的效能，即是不能從組織上、行動上、來更廣大的展開救亡圖存的運動。

最後，我本來還想講一講其他細節，因為這種問題是該非常具體的；只因爲時間和篇幅的關係，不得不留待後來再說。不過最重要的差不多都已提到，尤其是最基本的組織問題。我希望參加「國難教育」活動的同志們，都能深切的注意到這點，否則整個的方案都會變成廢話！

關於國防文學

在這個時候提出國防文學來，無疑地是有極大的意義，但有人竟懷疑到國防文學的建立，說「可憐」我們只有「國難文學」，不能不認為「海外奇聞」。

這是毫無理由的悲觀，不是愚昧就是惡意的歪曲。這種悲觀主義就是政治上的失敗主義，也就是無力抵抗主義。自從一九三一年秋天的事變以後，這般別有用心的野心家就製造出「中國今日特有的民族哲學」，說中國積弱已久，任何力量都不能與人比較，所以只能「暫且埋頭，屈以待伸」。

可是殘酷的現實，早已打破了這種可恥的欺騙。在步步退讓之下，敵人的進攻已使得我們就連「暫且埋頭」也不可能，但在另一方面，一九三一年春天的抗戰却已顯示出我們真正的力量，使他們永遠記到本中華民族之不可輕侮。

真的，誰說我們沒有防衛自己的能力？我們有這樣大的土地，這樣豐富的出產，這樣多的人民和資財，這樣久經內戰的陸軍……只要我們立下決心，掃除光一切障礙，我們不但有國防，而且這種國防一定是個堅強無比的力量。

我們沒有一年沒有國難，已是婦孺皆知的事實，所以目前的問題，並不在單

單使人認識國難，而是在如何雪恥，如何實行自衛。

實行自衛是目前最主要的任務，這個嚴重的責任要求每一個人分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的宣言中已經明白表示這點，在跟政治任務息息相關的文學領域積極地提出這個問題，是誰也不能加以漠視的。

但竟有些文學上的敗類，無視於我們廣大同胞的力量，忘了他們迭次的犧牲與英勇的抗戰，居然說我們不夠資格提倡國防文學，却只能提倡痛哭流涕的國難文學！

誰都知道國難文學和國防文學，並不是對立的，把「國難」與「國防」勉強地分開，像有些人把「愛國」和「救國」分開一樣，單提「國難」而怕提「國防」，無疑地只是消極的，懦怯的，奴隸的，屈辱的掩飾，在這民族危難迫在眉睫的生死關頭，每個有遠見有決心的知識份子都主張武裝自衛，難道一個作家獨獨應該例外嗎？如果說我國太弱，一定要經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後才言抵抗，才實行自衛，才夠資格談國防和國防文學，以爲要像蘇聯那樣強大才能有對

馬 (Tsunehime) 那樣的作品，才能提倡那樣的文學，難道不是很明顯的取消論調嗎？

就如這次悲壯熱烈的學生運動，雖則不是在戰場上的直接抗戰，像東北角的那些民族英雄一樣，但這轟轟烈烈的救國運動無疑地也是民族自衛的一部分，它反對在外人操縱和國內漢奸出賣之下的獨立，主張一致對外。那些「戰場上的大學生」在「大刀，竹棒，冷水，手槍，」等武器之下奮不顧身地忍受摧殘，而不稍動搖，不稍畏縮，這種由「國難」而起的自衛和抗爭，誰能說不是最現實的，最可歌可泣的，最偉大的畫卷之一？以這類真正英勇的歷史事件為題材的文學，誰能說不是國防文學的一種？

「以土事敵，士不盡，敵不壓」，這是真理。現在的確已到了生死存亡間不容髮的關頭，這次學生運動不論它的成敗如何，都不容抹煞它的偉大的意義。不提別的文化人，即章太炎先生也說：「學生請願，事出公誠……」那些以為我們「只有國難文學」的人們，根本不信我們有力量自衛，當然更不相信國防文學的

任務和它的前途，讓他們提倡不可憐的「國難文學」——不，可愛的「奴隸文學」去。他們儘可以卑躬屈膝，逆來順受的描寫他們心目中的所謂「國難」，可是——班稍有血性和天良的人卻是要求自衛，要求國防。他們並不像伊特勤共和國的勒蘭台男爵以及他轄下的那些「混蛋」一樣，專為逢迎他們的保護者歐品登將軍才來假造國防，藉其為保護民族，國家，和他們的家庭財產。他們決不會輕易受騙，決不致陷不知恥的在敵人面前投降稱臣。

一一

國防文學的基礎問題，是很重要的，我早已想寫這樣一篇文章；在看了徐行先生的文章以後，我尤其覺得不能不對這個問題有所闡明。

徐先生是反對國防文學的。他根本否認了國防文學的建立，可是最嚴重的問題，還是他根本否認了廣泛的「全民」戰線。

張曉濤先生那篇登在「火炬」上的原文，我沒有看見，因此我也不能說說得

「不買辦性」這句話，顯然是有很大的語病的。因為帝國主義者對於「買辦性」不但不會表示不滿，而且很歡迎，他們所不滿意的是「民族性」。

我的着眼點却在徐先生這種機械的，甚至可以說是犯了取消錯誤的論調，他這種論調，照我的理解，不但是文學本身的問題，而且是民族解放運動中的政治意識的問題。

徐先生所持的最大理由，是中國的民族有薩亞因為買辦性非常濃厚，他們的利害是和帝國主義者完全相一致的。這實在是一個錯誤，因為民族有薩亞的利害，雖則和帝國主義者有其共同點，却決不是完全一致。目前的事實，尤其很清楚地指明政治形勢的特點，是一個對於我們有特殊利害關係（存亡關係）的帝國主義，想用種種方法（最主要的當然是傀儡政權），把我們整個民族獨佔，把它從半殖民地轉到完全殖民地。因此其他各帝國主義對於這個帝國主義的利害衝突，也一天天的緊張和尖銳起來。

中國的買辦們，是代表各帝國主義集團的不同利益的，因此他們無疑地也有相互間的矛盾。在目前這樣危急的關頭，別說「民族性」較為顯著的民族工業家，就是不是代表這個特殊帝國主義的利益，而且跟它利害剛剛相反的買辦們，即不直接的或公開的參加救亡運動，至少也會採取贊成，同情，中立，或者不積極地表示反對的態度。雖則這種參加或擁護是個別的，暫時的，不誠意的，動搖的，可是却不能完全抹殺這些部分的影响和作用。甚至在某種特殊的場合，軍閥，官僚，地主（尤其是中小地主），富農，也有這種可能性，至於小布爾喬亞，進步的知識分子，以及下層的士兵等等，當然更是民族抗戰中的最可靠的同盟者了。

我們決不否認主要的和領導的救國力量，是出賣勞力的大眾（彷彿徐先生連農民也不承認是基本的救國力量），可是單靠這一力量，却是不夠的。我們一定要聯合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中國人」（除了賣國賊漢奸）共同起來組織抗敵救國的「全民」陣線，換句話說，我們一定要設法實現「工農商學兵」的聯合陣線

，才能完成這個歷史的任務。

徐先生並不會了解這一特點，却很肯定武斷說：「我們決不幻想『階層的目前利益和全中國民族的利益恰恰是一樣的』」，這簡直是根本反對「不問派別，階層，團體，個人，宗教，信仰，祇要贊成和擁護救亡運動的，都可以而且應該聯合起來」——這個正確的號召。

我認爲國防文學的主要內容，就是抗敵和反漢奸，凡是和這有關係的，都可以說是它的題材。因此它的範圍很廣泛。它的社會基礎就是每個「中國人」都要參加的，「全民」的救國運動。它表現每一件值得表現的救國運動，描寫每一個值得描寫的民族戰士（當然不是脫離羣衆的英雄）。如果稱這種文學爲「全中國民族的文學」，難道有什麼錯誤嗎？難道因爲張尙斌先生犯了一點語病，我們就可以根本否認廣大民衆的戰線，根本反對適應現階段的政治號召的國防文學，而且竟隨便加入以一頂「民族資產者的辯護士」的帽子嗎？……

救國何勞遠征

過去我很少讀林語堂先生的文章，因為我的生活和思想，都跟林先生距離得很遠。但近幾天却一再讀到林先生的作品，而且都有所感觸。關於他答高爾德（Gould）的一封信，我已在青光上發表過一點見解（附後），現在再表示一點讀他近作「我願往阿比西尼亞」（見英文密勒氏評論報）以後的感想，因為限於時間和篇幅，我只是一面介紹，一面隨便談談而已。

這篇文章很引起我的興趣，在這裡，作為幽默作家的林語堂，是相當地發揮了他的才能的。他一開頭就說：「我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是沒有東渡留過學。」因為他不是一個留東學生，所以沒有機會替國家服務。

「現在可說我們的統治機關里已經全留東學生壟據了。我的意思是說，現在不論誰願為國家服務，就是做極小的事，也得很精通和文，可是和文是這樣的難學……現

在我祇有兩條路好走：一條是東渡，如果我希望服務中華，一條却是到阿比西尼亞去。

這段話可說是又酸又辣，使人啼笑皆非；接着林先生說他如果東渡，有三種可能，就是：（一）進短期的補習學校；（二）進普通的小學；（三）進專為成人而設的大學專修科。可是他連和文的 A B C 也不懂得，已經上了中年的人又不容易學會外國字，自然很不願意進補習學校；進普通小學又使他害羞，一個四十歲的人要每天早晨提書包上學，跟孩子們坐在一條小橙上，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最後一個辦法也是「此路不通」的，因為他已有在大學里講學的十五年歷史，現在忽然要辦要他坐在講台下聽人家教訓，怎麼行？

他說目前的事實非常明顯：要替國家服務就得先懂得所謂「和平精神」，要體這精神就得先了解大種民族的愛憎，而要了解大種民族，却是非先學會和文不可的。他說他雖受過西洋教育，和一般歐美留學生一模一樣，但事實上這類教養却是同我們的「和平精神」相齟齬，而且使他無從理會究竟什麼才是「友邦」。

車閥所指的，那一個就連華盛頓唐寧街也不能了然的，所謂「遠東的現狀」。這種那樣既然都不行，那末究竟應該怎樣呢？

很有趣的，林先生又想到組織而且領導一個包含大學教授，教育專家，新聞記者的代表團東渡考察，目標當然是爲着研究和「友邦」政治合作，東洋和平，甚至於也是有關「世界和平」的文字和辦法，這樣標榜自然是最堂皇的，不是去年夏間已經有兩個銀行家做過榜樣嗎？他們到那邊去兜了一個圈子，回來就顯赫地進了「New Cabinet」。固然教育部長之類是只是一個的，但各省市的位置，却是多着呀！

可是這也需要懂和文，需要畢業證明書或者和我們「友邦」打通交道的經驗。沒有特別關係的人要妄想東渡考察，也許「友邦」領事館根本不願意簽發護照，就是願意，也難保一定可以被允許在「友邦」上岸。因此這「好夢」的幻滅，使得林先生不禁感慨繫之地說：

「因此我想我根本不能爲國服務，我願往阿比西尼亞。……自然那兒氣候是可怕的

，而且還有蚊子和瘧疾，但我已經愛上了那些鬍鬚的黑人。當我在影片中看到這些黑人釋放他們的步槍或者使用更簡單的武器，使人油然而想起中世紀的時候，我承認我是深深地贊美這些黑人！看到銀幕上的阿皇海爾·賽拉西（Haile Selassie），我覺得似乎自己是跪在地上向他膜拜。我的意思並不是指他的儀容，他騎在他的白馬上看去倒有點好笑，因為他的裝束是很奇怪的，但無論如何，我終於向自己說：「這才算是一個人！」是的，這才算是一個人，這才算是一個國家——它的人民富有自尊心，不善於叩頭的藝術，不論他們文化是多少落後，却獲得我最大的尊敬，我願意加入阿比西尼亞國籍，我知道我如果當作一個阿人到歐美去，以祖國為羞的心情會少得多哩！」

這篇文章雖然是發表在中國評論週刊的「小評論」一欄，却並非一篇論文，只是一篇隨筆一類的小品，因此我也並不想下什麼嚴正的批評。但除佩服林先生很技巧地諷刺當事者的無能，屈辱，仰人鼻息的醜態以外，我還願意極誠懇地指出其中一個容易使人誤解的地方：第一、林先生彷彿說替國家服務一定要參加政府，否則就無從為國效力。可是過去的事實却恰恰相反，真正存心挽救民族，國

家的人無不趨嚮地跟人民站在一起。第二、因爲這篇文章的情調，還是消極的，模糊的，很容易使人誤會林先生爲逃避現實，爲高蹈。以往誰都知道林先生最喜歡娛樂個人的趣味，所謂「閒適」、「調節」、「張弛」、「性靈」等等說法，是最明白的表現。看他所主編的論語，宇宙風，人間世，多多少少總使人感到那些作者都在「吟風弄月」和「玩物喪志」。他們大多以爲進步的世界觀和思想會壓殺「性靈」，不大願意接受善意的批評或討論，尤其是一種成見。我希望林先生第一要認識進步的世界觀在救國運動中的重要，第二要使自己的言行都積極起來，雖不一定做到伊爾夫（I. I.）和彼得羅夫（Petrov）那樣的諷刺作家，（事實上，任務各不相同，所諷刺的對象自然也是互異，因爲他們是在蘇聯，林先生却在中國），像高爾德所希望似的。但他（高爾德）說中國現在正處在一個動亂和悲慘的黑暗時代，需要作家掘發和暴露的黑暗是太多了，這樣的時代和這樣的民族要求林先生披上甲冑，衝入戰鬥的漩渦，完全拋開自己的嗜好和意味，却是萬分的正確。他又說處在現時代的中國作家，不但要聰敏，而且更需要勇敢，單爲了愛

犧牲自己的皮肉，個人的安全和舒適，而放棄了起碼的任務，無論如何不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拜倫而且爲了希臘的獨立拼命，作爲一個中國作家的林先生自然更應該積極，更不含糊的宣傳真理和正義。最後還有一點要附帶說到的，那就是林先生雖然自以爲身在中國，和並不能怎樣了解中國民衆力量的偉大——幾乎根本看不到民衆，因此他雖則談「一二九學生運動」，但字里行間却非常顯明地流露出悲觀感傷的調子，彷彿中國人太不爭氣。最近一期宇宙風封面上引用的幾句話：「今日時勢，比之五月，十倍艱難。五月旣苦無君，今日幾苦無民；不獨無民，且苦無國。」（王道周與王東岩相國書）更可見林先生不但只看到上層，看不到下層，即上層分子在目前民族危難深刻化中的奮鬥，林先生也是看不透徹的，這樣消極地估計羣衆力量，看輕羣衆力量，只是因了政客的出賣投降而嘆息悲憤，是極錯誤的。豐子愷先生的漫畫（見同期宇宙風）似乎也有同樣的缺陷，譬如他只看見軍警用水龍頭冲散學生，却看不見學生羣衆英勇的反抗和勝利地擊退軍警，從軍警手里奪得水龍頭，因此他那枝畫筆下的學生是無力的，可憐的，渺

的人羣。如果在民族解放運動這樣蓬勃的時候，林先生們還是不能或者不欲了解現在中國決非『無民』，實在使我們覺得遺憾。不過這主要的幾個缺點，雖然多少阻礙林先生更快地，更積極地參加民族解放鬥爭的聯合陣綫，但我堅信林先生以及像林先生一樣有才學的人，一定會翻然改圖。去年有很多自由主義作家（如赫胥黎等）參加巴黎保衛文化和反法反戰的大會，且不必說，就是不久以前舉行的倫敦英蘇和平交誼會（London Congress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with USSR）中也廣泛地包含着各色各樣的人物，即一直到最近還是法西斯蒂支持者的愛倫勳爵（Lord Allen of Hartwood）和伯明漢（Birmingham）的大主教也竭力贊助這個會議，歡迎蘇聯的和平政策和它對於世界和平的貢獻。在這個交誼會上，代表一百五十萬倫敦人的——從職工會一直到基督教團體的代表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信仰。所以不論林先生如何固執於自己的成見，固執於自己的趣味（如最近還在津津有味地談着睡在床上聽鳥聲和馬蹄聲的趣味，說到工廠生活之苦和工人之受壓迫還抱着輕視的態度等等），但他最後終於會更爽直地更真摯地爲他的國家服

務，是可以預想的吧？

「著作家們，本着各自的文化領域，用各種方式，激發大眾的意識，建立正確的理論領導，」我希望林先生不要發什麼「癡想」到阿比西尼亞去（我深信他的話只是諷刺），却切切實實地負起救中華民國和中華民族的任務。雖然不懂得和文，不能了解和奉迎「友邦」的軍財二閥，不能進「New Cabinet」，但是却有服務國家的必要和可能，廣大的民衆是歡迎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參加救亡運動，決沒有人包辦，更沒有人可以阻止。阿比西尼亞的皇帝目前雖可算是抗敵的民族英雄，但如果違反民衆的意志和願望，決不能如此，因此我們應注意到羣衆，不應盲目的崇拜個人。更不該有什麼「好人政府」或「賢人政府」之類的幻想。

在目前中國，如果還有人站在民族解放運動的圈外，或袖手旁觀，或逍遙自在，那末他是一定要受唾棄的。作家們如果離開了偉大的鬥爭，也鮮能苟延殘喘，不管他在過去會有何等的光榮，——所謂「文壇先輩」之類的博士，就是最好的榜樣。

附一讀林語堂的一封公開信

本來只願談「蒼蠅之微」的林語堂先生，近來却時常暢論國家大事。例如他在字宙風，論語，立報等等刊物上所發表的文章，他的筆鋒顯然都是針對着「人民之冤家」。這轉變並非偶然的，因為正像大公報副刊文藝上有位貝貝先生所說：『對於高蹈的文人，目前慘狀是個大打擊。』

我雖然不大熟悉林先生的身世，却約略知道他在過去是位文化界的鬥士。這種使人眷戀的過去，林先生在他一封答上海大美晚報記者高爾德先生（Margaret Gold）的公開信（見最近一期中國評論）里也曾說到：

「我在段祺瑞或者曹錕當權時代的北京，並沒有寫過這種文章，因為那時候我能夠毫無顧忌的在報紙上評論政府。」

從這一段話中，可見現在說話的不自由，實在遠過於從前。他以為在這沉重

的高壓下面，一切事情都已悲慘到如此地步，使我們不得不強爲歡笑，否則一定會窒悶而死。這種可怕的環境，據林先生的意思，是使他愛寫幽默文章的最大原因，就是論語的風行一時和一班幽默作家的得到成功，也是由於這個緣故。

的確，現在就連發表諷刺的文章也是非常艱難了，別說公開的批評。林先生告訴那位高爾德先生，說在目前出版什麼諷刺小說，是很危險的。他說立在杭州西湖旁邊的秦檜鐵像，已有一千年光景給人小便的歷史；這位漢奸不用說凡是中國人都恨之切齒，但就是其他奸臣和宦官，也在中國的文學上遺臭萬年。他舉出三部反映中國人民報復壓迫者的小說，即儒林外史，老殘遊記，以及描寫二三十年前官場黑幕的官場現形記。可是在目前，就是要出版像這一類的小說，也決不是怎樣輕便的事。

「我想描畫我們這些古怪的，荒誕的，不能相信的，活着的和已經死去的近代中國軍人尊容的許多速寫，一定可以成爲一部很有趣味的書。」

是那許多軍人呢？死去的如袁世凱，張作霖，張宗昌，活着的如……在這些

死將軍中，林先生以爲最「那個」的，自然是狗肉將軍張宗昌，當他橫死在濟南車站的時候，他曾寫過一篇很有趣的詩文。

最後林先生還說至三個幽默的故事。第一個是敘述一位約在三月以前到南京來的將軍，聽到行刺的鎗聲竟駭得跌倒；以後他想理髮，因爲害怕陌生的理髮師，不但要求鋪保，而且在理髮時又在自己的周圍密佈着重警衛護。第二個是說這位將軍有次在山東附近大啖敗仗，因爲那天一場大雨淋得他的兵士們不能插鴉片，再沒有勇氣作戰。最後是諷刺一個將軍並弄由於「New Life Movement」或者爲了復興道德，却只是因爲一位姨太太拒絕付賭賬而戒絕了他那一省的麻將。

好了，我差不多已將林語堂先生的公開信寫盡。其中自然有我不能同意的地方，例如他說「幽默風行中國的原因是跟在蘇聯的一樣」那一句。因爲在一方面幽默是大衆生活改善的產物，是真誠的笑，一方面却是生活和環境惡化的反映，完全是悲慘的笑。這其間的距離很長，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至於比幽默更尖銳，更危險，更能致人死命的諷刺，在蘇聯也是大衆自我批判的武器，跟它在中國是

專門評論和攻擊「人民之冤家」的任務，那里可以相提並論呢？但這也許只是林先生一時的疏忽，並不是什麼成見。我希望林先生發揮特殊的才能，由比較溫和的幽默公進一步走上更爲辛辣的諷刺的道路，恢復五四時代的精神，評擊侵略者的野心和揭破統治者的欺騙，積極地爲垂危的民族和受難的同胞盡一分義務——這是目前一切作家和文人共同的責任！

鑑評

讀「劉海粟歐遊報告」

海粟先生在歐兩年，據說現已鬻譽而歸了。在他回國以後，就有一長數千言的報告發表。從那個報告中，可以知道劉先生在各國主持畫展，足跡所至，是無不「轟動一時，歡迎若狂」的。劉先生告訴我們這是一件光芒的事蹟，而且迄今照耀於歐陸，連德人也稱爲近代歐洲藝壇最大的盛況，足見劉先生此行對於歐人「影響之大，震撼之深」。

劉先生的主要成功，據那個報告，是改變歐洲學者的錯覺和增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據他說歐人以前都有「中國現代無文化」的謬論，但經過這次發展以後，不但使歐人認識了劉先生個人的藝術天才，推許他的畫法足與近代歐洲諸大師並駕，而且使得他們對於中國藝術羣相嘆服，且引為師法。這種「推許」和「嘆服」，無疑地增高了中國在國際間的地位。

可是事實是不是如劉先生所說似的樂觀呢？

不，決不是的。這只要看劉先生所舉的倫敦泰晤士報社論，就可明白。該社論有一段說：

「……此種文化明顯之表現，或可提醒世人知中國問題之解決，非僅貿易，關稅，租界，投資等等所賴，實以此文化自身之前途所賴也。……西方援助中國之努力，除非對於中國文化與其富庶有同樣之認識，勢難成功……」

這明明是在暗示着，歐洲各帝國主義者如果要分肥中國，那末除了政治和經濟的侵略，還須注意到文化，否則一定會非常困難。像德國前途報的記者同樣，

這位秦晤士報記者雖則也不贊成向這「神聖尊嚴之文化之邦」飛擲炸彈，單純地加以焚毀，却是更聰明更狡猾地鼓動侵略。看了後面的一段，尤其可以認識這位記者的用心。

「……吾人若爲此種愚笨念頭所苦，則一觀展覽會中之佛像，當受益不淺。蓋於此種英武清靜之寫照中，吾人可見一種爲佛教柔化之氣與力，而中國藝術固脫胎佛教者也。試思中國人己以其大智慧，將其原有的武士精神，善爲利用，僅施之於詩，於藝，於人生，今若一旦突破藩籬，轉而競尙軍國主義，則其結果爲何如？此實不獨予吾人以一種暗示，且予吾人以一警告也……」

這難道還不明瞭嗎？這位記者對其帝國主義的秣馬厲兵，積極備戰，威脅整個文化前途的罪惡，一言不提，却隱憂着處在弱小民族地位的中國會「一旦突破藩籬」，以爲這不但是種暗示，而且是個警告。帝國主義代言人唯恐弱小民族獨立自由（卽他之所謂「突破藩籬」）的心裡，躍然紙上。他之所以要大聲疾呼，叫人注意而且利用這種脫胎佛教的，精緻華麗深含詩意的中國藝術，使中國民衆

新原有的「衝突鬥爭」的力量，柔化成仁愛溫雅，其用意也爲非想效法傳教師的欺騙吧了。

如果劉先生竟以這種刻毒陰險的言論，當作高等歐人尊重中國民族，提高中國國際地位的代表，那我簡直是無話可說。劉先生這次到歐洲各國去「播揚文化」，本來我們是期望甚殷的。可是劉先生化去民衆的三萬馬克，所得的代價却只是幾聲空洞的甚至惡意的喝采。譬如德報雖則稱中國民族爲智慧的民族，稱中國爲文化之邦，稱中國民衆爲「具有無上和諧聰明的人」，可是這個智慧的民族，稱中國文化之邦却天天在風雨飄搖之中，這些和諧聰明的人也無時不受飢寒貧病死亡的交迫，不但不能「很幸福地存在着」，而且竟不能「依然活着」。劉先生從海外帶回來的殊榮，於他們何有？我以爲劉先生不做真正的美術家則已，否則一定要了解現在中國民族和中國民衆所需要的，決不是「上繪桃花盛開或五光十色之陶器」，也非「聊聊數筆，輕淡異常之繪畫」，更非「鉅重之銅器」，而是爭取自由獨立和豐衣足食的鬥爭——這是目下中國最偉大最高超的藝術！

談「寓教於樂」

「我記得舊俄有則傳說，是關於一個名叫 Nikita Soljaninovich 的巨人的。他有驚人的臂力，却苦於找不到一個「滑輪」。

「如果我能夠找到一個滑輪，」他說，「我簡直能夠舉起整個地球。」

這話可見就是這樣了不起的一個大力士，如果沒有一個滑輪，沒有一條槓杆，也是無法舉起整個地球的。這傳說可以比喻一切問題的解決，滑輪就如解決問題的「先決條件」，沒有這種先決條件，那解決問題就不可能。

關於「寓教於樂」這個問題，我們也應作如是觀。因為「寓教於樂」的本身，也跟其他的文化運動一樣，是無可非議的事。可是成問題的，是在這種民窮財盡，根本無樂可言的時候，如何能夠使人「歡欣鼓舞」呢？

主 大家都知道西歐社會主義發達的初期，有聖西門，傅利葉，歐文輩的烏托邦

主義。就是在最近，還有脫克諾克拉西 (Technocracy) 這樣空洞的思想。這種空洞的主義和思想，最大的缺點，是在於只看到「現象」，而不研究它們的「本質」。他們不會企圖明白指出實現新社會的方法，因此所說的，盡屬空談。現在我國所提倡的許多文化運動，其缺點也在「不會指出」或「不願指出」實踐的方法，就連病根也從沒有分析清楚過。

我們中國的社會，是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相依為命的統治之下，民族工業和農村經濟都已整個兒的破產，勞工和農民（小資產階級也是如此）都在啼飢號寒的水火之中挨着日子，不要說「兇年不免於死亡」，即「樂歲」也是終年受苦，沒有比較快活的一天。孟子所說的：「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於死亡，此唯教死而忍不瞻，奚暇治禮義哉？」在這種「現狀」之下，如果有人要餓着肚子的大眾「興高彩烈，歡樂若狂」，那簡直是在開玩笑。而那「想由一個愉快的節和一首快樂之歌，將那些違背時代精神的風俗，逐漸轉移過來」的幻想，尤其是過

於樂觀的「美夢」！

生活方式與社會的進步自然很有關係，不容分開來說，可是這兩者的因果關係不容倒置。社會的進步可以改進生活的方式。惡劣的社會才有不良的風俗，違背時代精神的風俗都有牠們的社會根據。只有在社會的經濟基礎變動以後，生活方式才可望徹底改進，也只有這種時候才能剷除一切開倒車的風習。所以「我們」要改造人民的生活，又不能不先剷除一切不良的違背時代精神的風俗，實在是因果倒置的見解。例如求神問卜、迎神賽會、燒肉香、發天餉這些無意識的舉動，都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在沒有動搖封建社會以前，單靠「革心」的抽象辦法，是無論如何不能奏效的。這決不是簡簡單單的一個問題。至於每個人沒有一天高興，沒有一天不愁眉不展，就連「過新年」和「國慶」也是無心「同樂」的奇怪現象，更用不到解說。在這民族危機天天深刻化，日常生活天天貧窮化的緊急關頭，試問誰能「強顏歡笑」呢！各國雖有狂歡節（carnival）以及別的節日，但歡樂的也只少數，大多數人都還是向隅的。就如這次英國慶祝喬治五世登極二十

五週紀念(1910—1936)一個節日而言，照理說總該舉國若狂了，可是事實上却有人發出警告：「飢餓·失業·戰爭的光榮時代」！

總之，像其他文化運動一樣，「寓教於樂」也是整個社會問題的一部分，決不是做些浮面的工作所能奏效。為政者應該仔細想想怎樣才能使中國脫離奴隸的地位，怎樣才能使千百萬勞苦大眾擠上自由平等富裕之域——我們堅信只有一般大眾生活的向上，文化才有繁榮滋長的可能，我們要求的是實踐，不是空話。

後記

讀完一個並有所感觸。大約總想「發洩發洩」的，而且大半也並不只是尋求痛快，而是有更正大的目的。想藉此喚醒注意，提高警惕，不致大家都麻木下去，新思有所奮起和改革。

在我們這一時代里，光明固然已在漸漸的透露出來，可是黑暗却也還很濃重。看到太刺眼的怪事，聽到太逆耳的醜聞，人非木石，大約總難免表示一點憎恨和厭惡。

固固然沉默有時勝於雄辯，可是在死一般的冷靜中，偶爾聽得到一點聲音，縱然這聲音是如何的微弱，也許更足以使人鼓舞，使人感奮，「空谷足音」，不是更足安慰孤寂的旅人的心嗎？

嘉萊爾在「英雄與英雄崇拜」中，說過幾句很有意義的話：

「受熬煎的人只應該「吞嚥他自己的煙」，你若沒有把這煙變成火，吐出出來有什麼用處——其實，在比喻的意義上說，一切煙都能變成火的。」

「一切煙是否都能變成火，很難說；不過這並不重要，我以為重要的是：即使不能變成巨火，大放光明，單是吐吐煙也是好的，因為這至少表示世界上還沒有斷了火種，還沒有儘管冷下去，冷下去，……至於變成死灰，現在所冒的雖是白煙，閃爍的只是火燄，可是將來一定會有燦爛奪目的火炬照耀着人類的罷。」

因此我自己在含垢忍辱，傷痛悲憤的時候，絕不願意把要冒出來的煙吞嚥下去，總要吐它出來；明知它不但照不亮青年朋友的前程，而且也燒不熱冷酷的心，可是如果能把有些得意忘形的人薰得頭痛眼花，感到渾身不舒服，不能很順利地為所欲為，也就很可以自慰了。

有個朋友來信說：「我的家鄉通常說「發怒」為「冒火」，有人也就戲改為「你冒了火，還冒煙不？」現在令人「冒煙」的事也的確太多……當然也還有一種解釋——巨大的正義的地火，正在冒白煙呢，……不過這都是我的揣想，你也

許另有深意。」

「可是，我並沒有其他的深意。他的解釋，實在比我自己原來的說明還要明白，確切，生動，至少是很好的補充。」

寫雜文，我記得是開始於六七年以前，那時一位朋友正主持着上海「大美晚報」的副刊，我經常以各種筆名替他寫「七日談」，以後就繼續在「生活知識」「自由談」「每週文學」和「大眾生活」等刊物上面寫過一點，不過都是爲着需要急就的，數量也很少。現在附在這里的最後幾篇，大半就是那一時期的產品。時間似乎已經隔得相當的久了，事過境遷，或者讀者難免有一點隔膜，但我所指譏的一些現象却還變態的存在着，有的甚至是變本加厲，只是掛的新招牌，玩的新花樣，一時不容易想起它們的舊面目罷了，所以我自己決不以爲是明日黃花。不過在不斷的奔波中，大部份舊稿都已散失，僅有這幾篇，也是倖存的「糟粕」，如果讀者以爲是經過挑選的「精華」，那是要上當和失望的。至於這幾年在江浙、鄂、贛、湘、粵、桂工作的期間，也會在地方報紙和雜誌上拉雜地寫過一

些東西，也編過幾種期刊，但都沒有好好的保存，這並不是怕看自己過去「出風頭，啣手指的照相」，却大半是由於行軍的頻繁和自己的疏懶。

很多朋友很奇怪或者責備我很久沒有寫小說，這的確使自己惶愧，但這決不是因為自己「做了官」，「發了財」，其實我還是不斷地在寫着的，不過寫的是宣言，傳單，壁報，時文，工作報告，和抗戰有關的言論吧了。這些零星的或者應時的寫作，實在支付了自己抗戰四年以來的大半時間和精力。當然朋友們的督責是對的，朋友們的勸告是可感謝的，我的崗位還是應該放在刻苦的不斷的文藝寫作上面；我當加倍的自勉。

不過這並不是否認雜文的意義，我還是要繼續的寫，決不放棄這一利器，我要不斷的針砭自己和社會。當然，雜文實在也是不容易寫得好的，我自己的毛病自己也很清楚——不善諷刺，不夠含蓄，譴責的口吻往往重於幽默的意味。記不清是在那一篇關於文藝的短文中，科學社會主義的倡始者似乎曾經說我們中國人是最露骨的民族，說話，寫作，行動，全是赤裸裸的毫無掩飾，使人如見肺腑，

這自然是一個缺點，至少是一個弱點。我自己大約犯這缺點是很大的，因此：羨慕和欽佩能夠寫出三言兩語一針見血的雜文來的朋友。但有一點，我想是足以自慰和告無罪於讀者的，就是自己的雜文還不至於墮落到不關一點痛癢，專門寫些「今天天氣哈哈」之類的風涼話，用以讚揚盛世，歌頌昇平的地步。

抗戰的確是文化的源泉，在這三年多的苦鬥中，不知已有多少新人成長和壯大起來，雖然戰時一切條件都太差，還不能希望馬上有紀念碑性的傑作出現，但文藝界的進步確已令人驚嘆，令人充滿了樂觀和希望。可惜現在這進步彷彿暫時停滯了，一個新的文化危機正在醞釀着，文藝界以至整個文化界都是烏煙瘴氣：謾罵代替了理論，恐嚇代替了戰鬥，謠言代替了報導，玩笑代替了嚴肅，一些根本與文藝無緣的人居然把持了文壇，許多優秀的作家保持沉默，許多進步的刊物無疾而終，渴望着光與熱的青年，因此而感到絕大的苦悶，寂寞，彷徨，疑慮和不安。

我本來不打算把這些雜文結集成冊，另外還有十多萬字的兩個集子——抗戰

前後所寫的散文和小說（「迎樞記」和「晚間的來客」），也還是依然流連在四川的萬縣，但這沉鬱的空氣，却終日像巨石似的壓迫着我的心胸，使我不能喘氣，因此決定不能吶喊就呻吟，不能吐火就冒煙，「有聲的發聲，有光的發光」，這先哲的遺言，使我得到了絕大的勇氣，而把這些不成材的東西捧獻給正在和我自己同樣苦悶掙扎的青年同志。此外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這些雜文雖然淺薄，幼稚，却都是在相當艱苦和特別緊張的情況下急就而成，其中有幾篇還是去年被炸蟄居岩洞時所寫，回想起在那黝黑潮濕的深洞中，在那嘈雜喧鬧的環境里伏案疾書，孤憤抑鬱的心情，實在禁不住感慨萬千。

最使自己感到遺憾的是：本已十分貧弱的這些雜文中，因環境限制和篇幅關係，還不得不有所割棄，有所取捨，再加以散失，殘缺，剩下來的實在只是一撮皮骨罷了。目前，不是正有一些正人君子想用各種方法來掃清文壇嗎？可是作家並不都是儒夫，縱然被吮吸到只剩下一張皮骨，也還是要支撐和戰鬥到底的，有時赤身的「骷髏」，也還是勝過裹着華袞的走肉行屍，因為被遺棄於曠野荒漠中

的骷髏，還可以使人仰見死者戰鬥的遺風，而走肉行屍却只配蟻螻的嘲弄。

「獨戰到底，還是終於向大家伸出和睦之手來呢？這問題，是在戰鬥一生之後，才能發生，也才能解答。」

可是，偉大的時代已經教會我們集體戰鬥和堅持戰鬥，決不致向文化敵人伸出乞和之手來——雖然大家的戰鬥經驗，都還是淺薄的。

一九四一年六月四日記于柳州之龍盤山下

校訖再記

在校完清樣以後，彷彿還有幾句話不得不說一下，因為不加這一簡單的說明，怕有讀者仍然會誤會：

第一我想告訴讀者的，是我這次編集這本雜文，時間的先後並不很注意，例如同是紀念魯迅先生的三篇文章，如果照時間來說，「無可比擬的損失」倒是應

該放在「堅韌的戰鬥」之前的，可是我却覺得在目前來說，「堅韌的戰鬥」却似乎更爲重要，因此就把時間的次序倒置了。也許這種「雜編」的辦法並不很對，不過因爲印刷上的不方便，只得以後有機會時再改了。

第二，在上海寫的幾篇短文中，因爲那時環境的關係，對於我們的敵人，是不能稱爲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強盜，或者日寇，却只能稱爲「友邦」，「某帝國主義」，「東方帝國主義」，「東洋強盜」，或者「××帝國主義」的。因爲怕讀者奇怪或不明白，有的地方我已經改了，如「國難教育我見」中的某帝國主義，我就把「某」字改成「日本」，但也有不會改的，如「救國何勞遠征」中的「友邦」，我就不會改，存其本來面目，以便讀者窺見當時究竟是怎樣一個情形。

現在，上海和香港等地的報章雜誌，對於我們的敵人又不能不用比較體面的稱呼了——例如只能用「日軍」等等字眼，當然這也是不得已的，因爲上海香港不是在日寇掌握之中，就是在其他友邦勢力之下，新聞記者和作家，實在是被迫採用這些屈辱的稱呼，他們的「委曲求全」和「飲泣吞聲」，情形雖然和五年前不同

，所受的壓迫和磨難，性質和程度也互異，可是文化工作者的艱苦奮鬥，却是完全一致——大家都是要求自由，獨立，和進步！

爲了不願受敵奸利用，堅守心防，在淪陷區以及半淪陷區奮鬥不懈，或在飛機大砲的轟炸下英勇犧牲了的文化界同人，可說是指不勝屈，據不完全的統計，殉職而有姓名可稽的已有幾百。因此，在校完自己的拙作以後，確是深深感到這些先烈們的偉大和悲壯，充滿着敬慕和沈痛的心情，更深深地感到抗戰幾年來自己的文化工作做得實在太少，而不勝慚愧和不安。

這個集子實在是不成樣的東西，內容是這樣的貧弱，技巧是這樣的幼稚；但我也想謹以十二萬分的誠意，獻給最初率領我們到戰地服務，積勞而死的錢亦石先生和所有在這幾年中殉難了的文化戰士。

九月八日校誌再記。

文獻出版社總經理

兩大定期雜誌

<p>世界知識</p>	<p>文藝生活</p>
<p>零售每冊 國幣一元 半年十一元五角 三個月五元八角</p>	<p>零售每冊 一元四角 半年八元二角 全年十六元</p>
<p>注重報告事實。分析時事，使讀者明瞭國際大勢及中國的國際地位。文字精警，插圖豐富，是歷史最悠久的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的半月刊。</p>	<p>刊登名家創作，發表文學理論，批評新舊書報，譯載現代名著，並有潑刺的雜感，論文，是洋溢着時代感的文藝月刊。</p>

敝社爲供應大衆知識荒之需求起見，除出版各種叢書，選刊各家文學名著外，並發行「文藝生活」「世界知識」兩大什誌。內容豐富，形式美觀。實爲灌輸時代知識，介紹學術思想之最好讀物。當作業餘課外之補充讀物，尤爲相宜。各什誌內容及定價等，詳列如左。歡迎惠訂與批銷。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0954201

野草叢書之七

冒烟集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印	總	發	發	著
刷	經	行	行	者
者	售	者	人	

國	科	文	夏	何
光	學	獻	雲	家
印	書	出	清	槐
刷	店	版		
廠		社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桂林八桂路十四號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書第七九三號

